

邵燕祥 著

# 奥斯维辛之后



火烈鸟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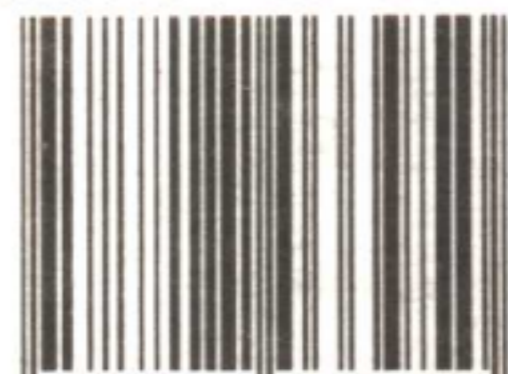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火烈鸟文丛

火烈鸟，又名焰鹤，其羽色粉红或朱红，闪烁升腾如火焰；颈足俱长，善步行，游涉与飞翔。以它的名字为一部文丛命名，除借以寄托作者和编者对于燃烧效应和辽阔空间的向往，别无深意。

ISBN 978-7-227-03395-0



9 787227 033950 >

定价

RMB 20.00 元

# 奥斯维辛之后

邵燕祥 著

群言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维辛之后 / 邵燕祥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1

(火烈鸟文丛 / 罗飞, 张新荣主编)

ISBN 978-7-227-03395-0

I. 奥... II. 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012 号

火烈鸟文丛

奥斯维辛之后

邵燕祥 著

选题策划 张新荣

责任编辑 张新荣

特邀编审 罗飞

封面设计 晨皓

责任印制 来学军

版式设计 清心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http://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mailto: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5 千

印数 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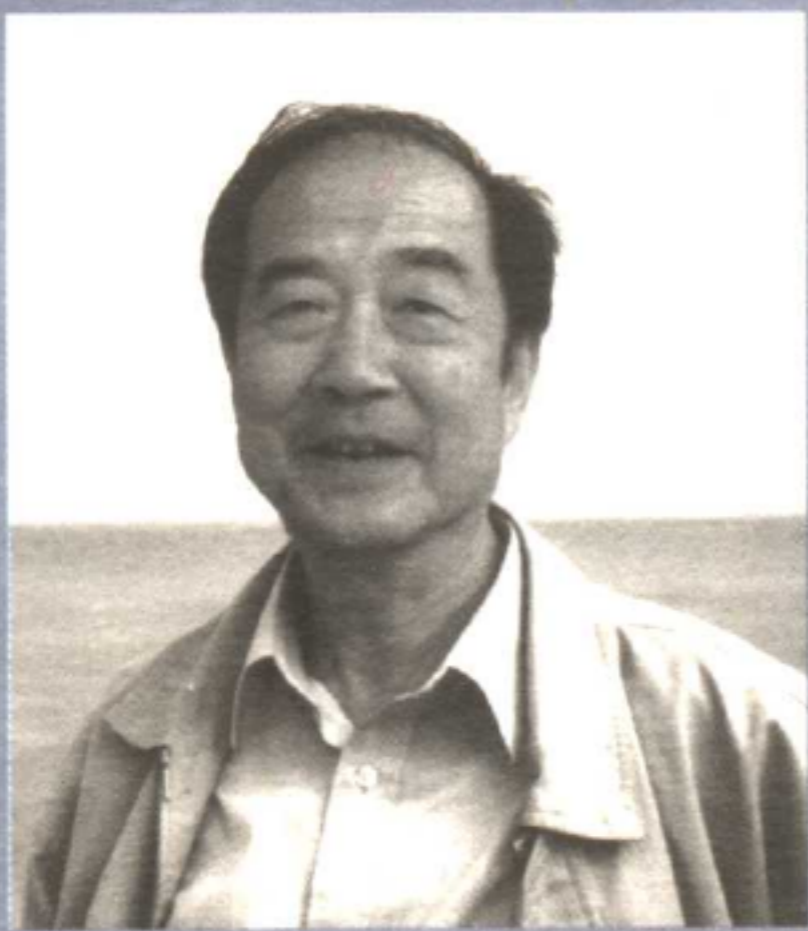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395-0/I·863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邵燕祥

浙江萧山人，1933年生于北平。1948年入北平中法大学，1949年即中断学业。曾任新闻广播和诗刊编辑，其间1958年~1979年因右派问题，从事体力劳动、半体力劳动及打杂。50年代上半叶出版诗集《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80年代出版《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80年代至今出版随笔杂文集《大题小做集》（上海文艺版）《热话冷说集》（宁夏人民版）《邵燕祥文抄》（三卷本，作家版）等；另有《沉船》（上海远东版）《人生败笔》（河南人民版）《找灵魂》（广西师大版）及《邵燕祥自述》（大象版）等实录面世。



《奥斯维辛之后》

作者：邵燕祥  
定价：20.00元



《半九别集》

作者：绿原  
定价：20.00元



《后虬江路文辑》

作者：阿垅 编者：罗飞  
定价：20.00元



《三五成群集》

作者：何满子  
定价：20.00元



《文途沧桑》

作者：罗飞  
定价：20.00元

## 自序

大家知道，奥斯维辛是纳粹希特勒所设的集中营——死亡营中很有名的一个。2005年，纪念过它被“解放”60周年。我在解放两字上加了引号，因为被解放的是当时侥幸还活在该营里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无辜的平民，而集中营这个罪恶的机构，应该用我们常说的“砸烂”了，不同于我们这里习见的“砸烂”者，它还保存了遗址，让世世代代人民永记不忘。

那么，我这本书名借用的“奥斯维辛之后”，应该就是指的人类一次重大灾难之后了。

我从许多人的文章里，见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语多次引用，也听说出于阿多诺之口，但一直不得其详，故曾向唐晓渡请教，他在回信中告诉我：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系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语，出于其写于1949年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1951年发表，1955年收入文集《棱

镜》。我见过《文化批判与社会》的中译，但手头没有；文集则似未被译成中文出版。此语有多种中译，如“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是不道德的”等等。我对德文一无所知，但觉就中文而言，还是以您信中所引的那个译法为佳。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曾经极大地震撼了我，尽管我在此后还没有完全放弃写诗，但不免时常自问：奥斯维辛之后，除了写诗，更应该做些什么才是？

可是，我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

不过，我的视野倒是从诗扩展到诗外，甚至从中国扩展到中国以外了。

据说自有人类以来，在这个地球上存活过的已有 3000 亿人，真是恒河沙数啊。茫茫宇宙间，“我亦等轻尘”，却也正合“以天地之心为心”，不免时生悲悯，时生义愤，并且留下不少的疑窦。陆续写了下来，其中即有所谓“国际题材”的随笔杂文，曾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一小册，题为《远在天边》（“大象漫步书系”，大象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现在这里所收，是其后所写，也都是“涉外”之作。

此书选了前书中《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反法西斯》、《又见卍字》等四篇置于卷首，并将前书的前言作为代序。零思断想，见诸各篇，这里，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006 年 9 月 9 日



## 《远在天边·前言》(代序)

这本小书，选辑了几十篇议论“天下大事”的短文，除开头结尾几篇外，多写于1990年代前期。

在这之前，所谓“涉外”的事情，是只有外交部才有发言权的，除了国家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以外，就只有政府的声明和公报可读。当然也有“表态”的机会，那就是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游行集会。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热衷于支援“亚非拉”(借来代指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美反霸斗争)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参加过所在单位的队伍，去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游行，喊口号，包括抗议对马丁·路德·金的暗杀，抗议艾森豪威尔访日，反对土耳其的曼德勒斯，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只是我所参加的队伍仅到了西华门一带，并未躬逢“火烧”之盛罢了。

1980年代以后，实行对外开放，出国访问的人多了，有关国外、境外的诗文渐多，自然还是所谓“风光+友谊”的为主。这比1950年代一提国际题材就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漫画、

宣传画的情况，表明我们已经多少摆脱了认为世界上还有 2/3 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的认知模式。

但那时候还有一种框框，就是多年形成的泛政治倾向，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总是过高地估计一篇文章、一个观点的影响，生怕哪个人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给政府找来什么麻烦。——其实这不限于有关国际问题的言论，据说某个出版社的领导在审查一本关于闻一多的评传时，居然害怕书稿里提到闻一多被国民党所暗杀，会不利于“第三次国共和作”！于是这本书当时就压下来了！——国内问题如此，涉及国外更不得了，好像如果在文章中议论到国外或外国的什么问题，有关国家便会认为全都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似的！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人家的国度里，什么人都可以写文章谈论中国，谈论与中国的关系，以至批评中国，不管批评得对不对，跟他们政府的政策一致也好，不一致也好，咱们都得听着，他们的政府并不为每一篇报刊言论负责；而相形之下，我们倒是过分地善于“自律”了，对别国的一些消极现象固然噤声失语，即使对来自国外的某种不友好的表示，顶多是在“必要时”由政府去表个态，国际公众不容易听到中国普通人的舆论。

我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我所表达的只是普通人对国外事情的一点声音，这也多是进入 1990 年代以后，才有了发表的可能。从书中的写作年月可以看出，这方面的舆论空间毕竟有所扩大了。

我的关注更多是在国内，而且限于咨询不足，我不可能对任何国际事件都写文章——那也不是我的任务，严格说来那是国际评论员的职责所在。所以那些年我也只写了这么一些。需

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收到的 1995 年初为止的短文，差不多都曾编入三卷本的《邵燕祥文抄》(作家出版社出版)，有那套书的读者就不必再破费了。

说“小小寰球”，如果排除了民族自大的成分，确实也一点不错。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世界显得越来越小了。这半球的蝴蝶扇动翅膀，也许就能在那半球掀起一阵飓风。茫茫大洋，转瞬可渡，更不用说什么一衣带水了。人们过去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现在又可以得到新的诠释。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古代哲人的遗言。

我们现在懂得了，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要紧。然而，不应该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关起门来做皇帝”，不但要听国际上的风声雨声，也会切身沐浴着“欧风美雨”(还有“亚非拉”的)，我们难免像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样关心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别人的经验教训当作自己的一样来汲取呢？

我写这些短文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1999 年 5 月 25 日

# Contents 目录

- 自序 / 1  
《远在天边·前言》(代序) / 3
-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 1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 4  
反法西斯 / 8  
又见乐字 / 11  
暴行不须假设 / 13  
“杀手无罪”论 / 16  
又见打手 / 18  
五十年前“孽债” / 21  
一幅画前的两种爱国心 / 23  
——夜读抄
- 遗嘱·遗产·后遗症 / 26  
读书读报利弊论 / 28  
从“俳句事件”说起 / 32  
——夜读抄

儿女情累 / 40
弥天小谎 / 42
推荐一篇国际题材杂文 / 45
葛云飞之墓和沙皇之骸骨 / 47
我们的教科书问题 / 50
小朱加什维利 / 53
以苏为镜 / 56
逸事与丑闻 / 60
谁管谁 / 64
何必改词 / 67
说起《祖国进行曲》 / 71
《跋涉者的足迹》序 / 78
关于《人权宣言》 / 81
——为《青年小百科》作
看大片有感 / 84
政治色彩 / 87
回答和不回答 / 89
搞不懂啦，希特勒 / 93
看阿莲，说卖座 / 97
也谈格瓦拉 / 100

# Contents 目录

- 不安的灵魂归宿何处 / 103  
——读高莽《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
- 老皮真逗 / 107
- 不仅是美国的事情 / 109
- 历史的感叹 / 114
- 拟外国故事 / 118
- 何必讳言“统治” / 120
- 三月五日 / 124
- 三月五日断想 / 132
- 《爱因斯坦语录》 / 137
- 评点一篇“异域走笔” / 140
- 阳光下的黑夜 / 143
- 读报札记 / 149
- 小议“跟屁虫” / 152
- “小田岳夫”是谁 / 155
- 《闲逛美国》序 / 156

为自由而闪耀 / 159

——读《自由星辉——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续集》

斯大林格勒站 / 165

国会大厦 / 169

示众台 / 172

一样的广场 / 175

诺曼底海滩 / 179

独夫心态 / 186

——夜读抄

“国际耻辱” / 190

伯利恒之星 / 192

重过莫斯科 / 195

新春漫笔 / 226

你爱唱《国际歌》吗 / 228

无题有感 / 231

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 / 233

那遥远的磨坊 / 240

遥望诺曼底 / 244

从“购买奥运会”说起 / 247

##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今年5月，是战胜希特勒法西斯40周年。但是据说在某些“慕尼黑啤酒馆”式的角落里，还有把战胜法西斯的节日看作哀悼日的人。

人的是非、爱憎、哀乐，其不同，有如是！

原来遗老遗少并不是我们独有的“国粹”；纳粹的第三帝国也自有它的余孽。

今天的孩子们，也许已经不知道52年前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广场上有过一个火光冲天的焚书之夜；也许只是从影片《王中王》看过有关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轶事奇闻；也许完全不能想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灭迹和克拉古耶瓦茨的血洗屠杀；也许对英格利·褒曼自述她1938年在柏林不肯举手高呼“万岁，希特勒”，只不过付诸一笑；甚至就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0岁以上的人，也把那些逝去的岁月仅仅当作过眼云烟了。然而，却不知世上至今仍有人哀纳粹之败亡，痛狂澜于既倒，不胜怀旧，时唱挽歌呢！



德国作家沃尔夫在希特勒上台不久后的 1935 年写的剧本《马门教授》，很早就曾介绍到我国来，由金山同志主演过。剧中的犹太医生马门教授在受到迫害以后痛悔自己原先对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漠不关心，留下这样的警句：“在应该斗争的时候放弃斗争，就是犯罪！”面对十年动乱中封建法西斯的猖狂肆虐，每念及此，多少人曾经心弦震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是否还会麻木迟钝，以致贻悔于将来呢？

德国纳粹化不过 12 年，而 40 年后还有遗老遗少为纳粹招魂。那么林彪、江青等前后为害 10 年，以野蛮的暴力和蒙昧的个人迷信，摧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影响至深且钜，如火延烧，如水渗透，能轻易地说余毒业已肃清了吗？

况且，“文革”的流毒中又缠裹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左”的影响，还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包括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余，并没有廓清无遗。历史的渣滓一时借助于“左”的载体，一时又作为对“左”的惩罚，多方面侵扰着社会政治生活，毒害党风，销蚀民气！每个朝代，每一种被推翻的社会势力，都有自己的遗老遗少。重要的在于我们要使今天的“七斤”和“六斤”们腰杆挺直，彻底否定文革，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开放和改革，不为一切的“风波”所动。

为此，必须让今天和明天担当改革主力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文革中适应篡改历史和培育一代愚民的需要，中小学的历史课都废除了。不知“古”也必然昧于知“今”；一定要懂得历史发展的趋势，懂得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明敏地辨别新歌和旧曲，“左”调和正声。这也是一件百年大计。在这方面，文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者有不可忽视的责任。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对青少年来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对教育者来说也一样: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1985年4月1日

##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1933年5月10日接近午夜的时候，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广场上火光冲天，大约2万册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付之一炬。

曾经沧海的今日读者，也许以为2万册书微不足道。把别的城市同样景象里烧的书加上，就不止2万册了。

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引用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焚书现场说的话：“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次焚书发生在希特勒当总理后约4个半月，它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

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国会纵火案，第二天希特勒就利用此事，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规定为了预防“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可以“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

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等等。所谓“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是指希特勒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其实真也冤枉了共产党；当时德共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曾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主要政敌，形成对纳粹党的实际支持。

1933年3月23日，德国议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拱手把立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这项法律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可以不同于宪法”。从这一天起，希特勒成为全国“合法的”大独裁者。

接着，在纳粹的大事记上，就是以焚书为标志的文化纳粹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德国文化纳入纳粹的控制之下，不得越雷池一步。1933年9月22日，设立由戈培尔掌管的统一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电影七个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协会，服从管理。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开除出会或拒绝入会的人，生计也就被剥夺了。“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谁是“国家”呢？当然首先是希特勒、戈培尔，然后是他们的“文化”爪牙们。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戈培尔掌管的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原来是一批仇视文化的“文化”官员。

每天早晨，柏林各报编辑和地方报纸记者齐集宣传部，由

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在 1934 年内有一个时期，戈培尔和阿曼（纳粹的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都要求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埃姆·韦尔克把这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干巴巴。他的《格鲁恩邮报》立即被勒令停刊 3 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了。

戈培尔亲自主持的焚书大典是得到过狂热的学生们的合作的。德国从小学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被奉为“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所有教师都得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在科学方面，有个亚琛技术学院的威廉·缪勒教授在《犹太人和科学》文中把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当作“头号恶棍”。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莱纳德教授则说“这个犹太人”的“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于是他们大搞其“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了。

1934 年 8 月，兴登堡去世，军队支持希特勒把总理、总统、三军统帅集于一身，第三帝国进入全盛时期。这时德国经济复苏，失业减少，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 90% 的人表示接受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

希特勒从 1933 年焚书到 1945 年焚尸——据《简明布列颠百科全书》，希特勒和情妇自杀前“两人遗嘱死后均火焚”——不过 12 年。从 1945 年至今，又是 4 个 12 年过去了。虽于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我们毕竟经历了很多，相隔 60 年的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时间和千万里的空间，回首希特勒焚书的前前后后，多少看得会清楚些。希特勒者，固一世之枭雄也，而今安在哉！

1983年5月3日

缺页

因此，以希特勒的思想主张为代表，法西斯不仅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而且意味着专制独裁，思想禁锢，意味着屠杀、战争、毁灭和死亡。希特勒这样说了，也这样干了。

希伯莱文版《我的奋斗》是76岁的以色列人达尼·亚龙翻译的，这位有心人认为要让年轻一代了解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行，这本书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材料”。希特勒留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则是他统治全世界的蓝图和样板。1945年这个位居波兰的集中营解放时，堆积着的死囚头发竟有7000公斤，有一些已经经过纺织，加工成背心和披肩。这个集中营里毒死焚尸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政治犯和苏军战俘，各国抵抗组织成员和爱国者，不少于110多万。发生毒气的罐装粒状含氰化学产品，是德国Degesch公司1941~1944年间出厂的；仅1942~1943年，奥斯维辛的两个集中营就使用了20吨，而据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豪森后来供认，它所产生的毒气每5~7公斤就可以毒死1500人！

不久以前，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的毒气案件中，使用了“沙林”即学名甲氟磷异丙酯的化学制剂，是一种高毒性气体，有一毫克滴在皮肤上就能致命。它是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发明的，曾经被纳粹德军用作化学武器。20世纪40年代~90年代，纳粹-奥姆真理教：是这样一脉相承的。

当我们听说去年春夏卢旺达持续3个多月的内战和部族仇杀导致50万人死亡（一说为100万人）、上百万人逃亡的时候，当我们听说目前布隆迪也发生种族屠杀，目前已经有400多人主要是妇孺被政府军杀死的时候，当我们听说4月4日菲律宾南部的伊佩尔小镇，惨遭200名全副武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洗劫焚烧，至少有100多无辜平民死于血腥屠杀的时候，当我



们听说包括许多靠诈骗、抢劫、走私毒品军火、操纵卖淫业和洗黑钱而暴富者在内的俄国黑势力正如章鱼触角一样伸向法国、意大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为形形色色种族主义、宗教和邪教狂热、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感到震惊：各式各样非理性的喧嚷和暴力行为的阴影之下，所庇荫的不正是法西斯的土壤、衣钵或变种么？

世界并不安宁。假如我们在本世纪末不能清醒地面对导致法西斯或重演法西斯的灾难性因素，人类的命运就没有免除威胁，未来的 21 世纪就绝不会多么美妙。

安理会就卢旺达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作出决议，在全世界范围捉拿凶犯，交付审判。这代表了人类的良知。我们中国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我们有成千万的军民死难，单是死于南京大屠杀的就达 30 万人。50 多年过去，他们在天之灵还未曾安息，法西斯死灰复燃的危险一天没有消除，他们是一天不会安息的。

反法西斯：不但是我们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口号，也是我们下一代的口号。

1995 年 4 月 17 日

## 又见卐字

大家都知道纳粹党党旗和纳粹分子臂章上有个卐字。它成为凶暴、残酷、屠杀和灭绝人性的标志。

读萧乾老人在《深圳风采》上的一篇文章，说卐字本身是无辜的，它出自梵文，据说在12世纪由一些印度人带到中欧，后来常用来作器皿上的图案。1889年，波兰一个图书馆员办的一次展览，300多种展品上有卐字作装饰，有的还刻在武器上。

到本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人硬把它当作亚利安人的标记，印上他们的党旗和臂章。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其中有几百万犹太人就是在卐字下惨遭杀害。

字虽无辜，纳粹歹徒们却让它浸满了血迹。这个卐字也随着纳粹一伙为人类唾弃了——萧乾这样说。

但就在我读过老人这篇文章后不久，发现这个被人唾弃的卐字又出现在中国，在北京，在一个叫作“菁华公司”(?)的橱窗和货柜上；而且这种带有卐字符号的徽章、饰物、制服等

等，据说“货源充足”！

这是在电视中曝光的；另据广播揭露还有一家餐馆里张挂着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的肖像。

怎么法西斯的幽灵又游荡到我们的首都来了？

这一切发生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后不久，能不令人深思？

这个卐字显然不是一个由梵文演化出的无辜的图案，而是一种极端思想、一种暴力倾向、一种恶势力的象征。

卐字不仅仅是个卐字。

卐字是看得见的，带着卐字的衣物、“纪念品”都是摸得着的，卐字的商标取缔并不难，可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改了装、半改装或全未改装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精神遗产在寻找着传人？

1996年2月16日

## 暴行不须假设

全世界纪念二战胜利 50 周年的日子里，日本广岛也在纪念被原子弹轰炸五十周年，这时候，两位参与向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人出来接见记者了。

一位是现年 79 岁的美国退休将军蒂兹贝，另一位是现年 70 岁的前美国空军少校汤姆·费尔比。前者是当年陆军航空大队上校大队长、“509”（特种突袭队）的指挥官，又是以他母亲的名字“埃诺拉·盖伊”命名的 B-29 轰炸机的机长；1945 年 8 月 6 日这架“超级空中堡垒”奉命载着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飞往广岛，就是他在上午 8 点 15 分，按下了投弹的电钮。

这一弹促成日本投降，蒂兹贝成了新闻人物。然而几年后人们呼吁保卫和平的同时，诅咒杀伤力大的原子弹，一度有人骂他是“刽子手”，虽说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不久归于沉寂，而蒂兹贝却一直保持沉默，这也许就是谣传他精神崩溃甚至说他悔恨自杀的因由。当年只有 20 岁，驾机执行这个重大

任务的费尔比说得好：“我对于有那么多人因这颗炸弹而死感到遗憾，我想我们不应再让这样的事发生。”但是，费尔比强调，“我从未因执行那项任务感到后悔。”

中国人对于向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有些什么看法呢？

作家张扬说，假如是他驾机向广岛投了原子弹，他会引为终身的光荣，因为他为加速结束这场战争尽了自己的力量。

诗人刘祖慈引述了最近关于日本战时已经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说，如果没有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假以时日，让日本的原子弹出来，那第一个投弹目标恐怕就在中国——我想，该是人口密集超过广岛的重庆吧。

刘祖慈的话发人深省。他的立论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然而，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何须假设？

日本投降 50 年了，但是侵华日军投降前在中国采用投入河里或埋入地下的方法秘密处理的毒气弹还在威胁中国人：至今在中国已发现但未进行化学处理的化学炮弹有 200 万发左右，毒剂有 100 吨；在吉林敦化，黑龙江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江苏南京，河北石家庄，江西上高，广东广州，浙江杭州等地都发现过日军遗留的毒气弹、毒气罐；据不完全统计，战后我国受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的人数超过 2000 人。

这里且不说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至少在中国实施化学武器 2000 次以上，造成了 10 万人的伤亡（这个数字将近广岛因原子弹爆炸至去年累计死亡 24 万多人的一半）；单是遗留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化学武器，就已经并正在对中国人构成可能致死和可致糜烂的严重威胁，而且遗留的时间越久，泄漏的危险越大，危害性也越大。在这个意义上，日军的侵略暴行不是还在延续吗？

《羊城晚报》报道，日前在哈尔滨举行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上，日本青年学者斋藤尔一晴说，最近，由于奥姆真理教制造和使用毒气，在日本引起轰动，但其规模，远远无法与50年前日本在国家的旗帜下制造和使用毒气、细菌武器的罪行相比。

会上披露，日本陆军从1927年起在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建立了毒气工厂，日本在战争中生产的7376吨化学毒剂，绝大多数是这里出品；这些毒气装入炮弹和炸弹，或直接装入大型毒剂罐以后，运到中国战场上使用。驻在齐齐哈尔市的日本关东军化学部（即“516”部队），是日军化学部队，曾经与“731”部队勾结用活人进行毒气试验。

用不着假设日本搞成原子弹会造成多大危害，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实际发生了的暴行已经罄竹难书。日本在战后为了逃避对其战争罪行的清算，据说曾把个别从事军工生产的岛屿从地图上抹去，但像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大概是抹不去的吧？广岛原子弹爆炸时，不知道这个岛上的毒气工厂是否受到破坏；至少，因广岛遭到原子弹，日本投降，这里生产的毒气不再运往中国屠杀我的同胞了。

我的中国同胞，50年前听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曾经奔走相告，额手称庆，认为虽然也殃及池鱼，但重要的是重重地惩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正义的行动，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认识，不是极其自然，合情合理的吗？

1995年8月22日

## “杀手无罪”论

50年来，至少是我，没有认真回顾过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遗留问题的处理。颇有点前事已忘的样子。忙着我们自家的事，自顾不暇了。

近读《北京青年报》，才知道大批日本战犯未受应有惩罚：

早在1946年11月，日本天皇裕仁就经同盟国允许，对所有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日军士兵实行了大赦。所谓同盟国允许，当然首先和主要是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而在天皇裕仁，大约是为了“保护积极分子”吧。

1951年，盟军远东最高司令部司令麦克阿瑟批准释放所有被判十年以下徒刑的日本战犯。而到1956年4月前，连所有被判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都已经假释出狱了。

于是，杀害了中国和亚洲成千万人和众多英美战俘侨民的日本军国主义，最后“杀人偿命”的仅有被判死刑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他们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既代表了在别国国土上滥杀无辜、无恶不作的大小杀手，也代表了实际上

的第一号战犯、第一号杀手天皇裕仁。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那些佩戴各级军衔的，杀红了眼的杀手们，他们只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他们负不了什么责任云云。

最高的决策者是裕仁吧，他若没有东条英机（还有先已死掉的近卫文麿等）以下的各级杀手，纵有三头六臂，能够杀得了成千万的中国和其他各国军民吗？能够杀得那么各各独出心裁、淋漓尽致吗？

然而裕仁尚且逍遥法外，众杀手更勿论矣。有这个天皇在，他倒没有忘怀故旧，不断替关着的战犯谋求释放，他给已死的官兵的遗属共发了 38 万亿日元的抚恤金（相当于日本向受害国给付赔偿费总数的 57 倍），并且把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的灵牌供进靖国神社，享受祭奠。

这就是“杀手无罪论”的根源。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就不但安慰了已死杀手们的亡魂，而且鼓励了活着的，以及未来的打手和杀手们。

1995 年 9 月 5 日



## 又见打手

《新民晚报》报道：奥丽斯化妆品(珠海)有限公司一位负责质量检验的人员，因为反对把一批不合格产品强行推向市场，被罚被撤不算，夜晚在家被三名不速之客纠缠，拳打脚踢，直到次日凌晨。

我读这篇报道，第一直感是：打手又来了。

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幸灾乐祸，说这类案件的产生是由于搞了市场经济。

翻翻老皇历，早在极其封闭的自然经济时代，财主豪绅都有“家院”，就是看家护院的打手。这种打手，受雇于私家，为主人效劳。

那时社会上的流氓，有奶就是娘，谁给好处，给谁出力，不但许以驱驰，甚至可以卖命。不过，遇到愿出更大价码的，或许就倒戈相向。其中有的会两套拳脚，也有的只是咋咋唬唬，像《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属之，但也不可小觑，在无拳无勇的老实人面前，他已足可作威作福了。

打手的主子结交官府，有的打手也夤缘时会成了官家的人。有的打手自己成了二主子，手下又养了一批小打手。如黄天霸之流，虽也是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却已非混吃混喝的可比了。

有官家当凭靠的，就不但打人不受追究，有的杀人也无须偿命，叫作执行公务，“合法杀人”。

三联书店出过一本编译的书，书名《合法杀人家族》，讲的是法国一个家族，世袭职业刽子手。刽子手杀人，不承担个人责任。他们以国家法律名义杀人，在特殊时期也以特殊的名义杀人。在大革命的1789~1793年间，他们既杀过国王、王后，保皇党，也杀过各派革命党人。

通过电影认识世界，始知西方国家早有职业杀手。同样是杀人，却不同于刽子手。

其实，不让外国专美于前，从我们的国粹里总能找着大同小异的行当。远的不说，民国以来，从行刺宋教仁开其端，行刺廖仲恺继其后，许多政治性绑架、暗杀都是借助或假手黑道干出来的。

杀手自然高于打手，风险大，价码高，要求武艺高强，包括手脚利落，“杀人如草不闻声”，“事如春梦了无痕”。打手则不必，有时正须招摇过市，意在恫吓，只求先声夺人，然打红了眼，打顺了手，也会打出人命。

“文革”期间，所谓文斗一朝转入武斗，在批斗、抄家、私设公堂以至大规模开仗等场合，人命案子多半是这么闹出来的。作案者仓促上阵，未经训练，多数只达到业余水平。

今天看到奥丽斯一案，窃以为可说是“文革”遗风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打手不知是专业还是业余，是公司人员还是外

雇，但从报道来看，已近于黑社会或“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之所为。尽管没出人命案，是否因此便可宽贷呢？此风一开，本来就已是经常发生的拳脚相见，更将蔓延成风，——业余的变成专业的，自发的变成有组织的，分散的变成团伙承办，打手升级为杀手，再加上有关方面所力戒力防的“警匪合谋”、“警干合流”，可就人人自危，非练就一身过硬的功夫无以防身了：倘真到这一天，朗朗乾坤，成何世界？

1996年11月12日

## 五十年前“孽债”

《讽刺与幽默》刊出华君武漫画，题词说：

据北京(市)电台广播：西单一小饭店公开悬挂法西斯战犯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头像。中央电视台新闻：北京宽街一店公开出售旧德国纳粹党旗、徽章、勋章等。

此画作于刚庆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后一年。

按：严格地说，为时尚不满一年。又，上述西单小饭店张挂的肖像，闻尚有隆美尔、山本五十六云。

而《二战孽债今日算，法一前部长面临审判》，则报道了一些纳粹受害者家属2月6日要求法国波尔多一上诉法庭以反人类罪的指控审判一名维希傀儡政府时期与纳粹合作的法国前部长。

波尔多上诉法院将决定是否审判 85 岁的莫里斯·帕蓬。他在 1942~1944 年任波尔多地方官期间驱逐了 1690 名犹太人，其中包括 223 名儿童。大多数被他驱逐的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

如果帕蓬出庭受审，这将是法国有关参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法国人的司法调查的最后一案。在维希政府时期，帕蓬担任波尔多所在的吉伦特省秘书长。战后帕蓬官运依旧，1978~1981 年期间，他担任法国预算部长。

这些情况表明：一、时隔五十年，法国有关参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法国人的司法调查才进行到“最后一案”，拖的时间够长的。二、像帕蓬这样的罪犯活动能量之大，“人还在心不死”，并不满足于苟活，还要问政从官，自然有其在上在下的“根子”，这大概也就是使有关的司法调查要拖到半个世纪的原因。三、尽管如此，法国的纳粹受害者绝不健忘，坚忍持久地追究，也已奉陪半个世纪，或许有些当事人已不在，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在“继续挖山不止”吧，可敬可佩！他们岂止是为自己所受的迫害要求补偿，他们是在为所有的死者索还血债，他们是在为人类申张正义，他们是在为历史书写公平。

1996 年 3 月 8 日

## 一幅画前的两种爱国心

——夜读抄

列宾青年时代的名画《伏尔加纤夫》(1871~1873),是我最早倾心的不朽杰作之一。就是这幅画激发我在1947年写了长诗《给伏尔加船夫》。后来每次面对这幅画的哪怕是很小的照片复印件,也仍然感到一种震撼:在如此宏伟壮丽的大自然里,人们本来应该过美好得多的生活啊!

早年学画后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孙越生在随笔《读列宾〈纤夫〉一画偶得》中,引用了列宾《抚今追昔》关于此画构思过程的自述,作了深刻的评论,兹从略。

孙越生说这幅画“哀而不伤的大手笔即使不能点燃良知熊熊的怒火,亦将引起心灵默默的同情”,又说这幅画“为想象和理智留出了多么宽广的活动余地,充满了多少悲歌的含蓄,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说中了我的感受。

而他说到有关《纤夫》一画的命运的插曲则是我不知道的。

他说,《纤夫》留传至今,已经没有人再来否认这是列宾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的巨大光荣了。但是,当时他却受到形形色色

的非难。在一个封建专制官僚帝国里，这种非难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幅名画及其作者，却受到一位俄国的爱国将军、塞瓦斯托波尔尔保卫战的参加者、国家公产部部长节列诺依·亚历山大·阿列克赛维奇(1819~1880)的反对。这位将军看过这幅画后，他的爱国心和主人翁态度使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就在巴黎负责管理俄国留学生的鲍戈柳包夫教授的画室里，当着主人的面盛气凌人地训斥留学生列宾道：

是什么魔鬼支使你画这幅荒唐透顶的画的？你准是波兰人吧？……你怎么不害臊，你原来是俄国人！岂不知我正在着手取消这种原始野蛮的运输方式，要不了多久，准保没有人会想到它。可是你却画这种画，还拿它到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去炫耀。我想，你这是打算找糊涂的富翁，希望他能买下这些大猩猩——我们穿树皮鞋的乡巴佬吧？亚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哪怕您多开导开导我们这些公费生先生也好，叫他们想想，他们既由政府供养，就应该多表现一点爱国心，不要把破烂的包脚布抖落出来送到万国博览会上对欧洲去宣扬。

孙越生在讲完这段故事以后，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已经对这位爱国将军的爱国心和主人翁态度，和由这幅伟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杰作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心和主人翁态度作了谁是谁非的判决。”最后，他问：《纤夫》的命运及其教训，难道不值得读画和评画者深思吗？

此文作于1981年6月，距今已15年了。收在《历史的踌躇》（“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

一书中。

抄书至此，忽然想起我们的诗人蔡其矫 1958 年春发表的《川江号子》一诗，写的也正是川江上的船工，紧接着就遭到批判，批判文章引用了如下六句：

你那碎裂人心的呼号，  
来自万丈断岩下，  
来自火箭般的船上；  
你悲歌的回声在震荡，  
从悬岩到悬岩，  
从漩涡到漩涡。

批判文章在“碎裂人心”和“悲歌”下加了着重号。那些强词夺理的批判，看来只有人人以罪之心，恐怕与上个世纪那位俄国将军式的“爱国心和主人翁态度”都是不相干的了，从略。

1996 年 4 月 1 日



## 遗嘱·遗产·后遗症

亨利公爵死了，他的姊妹、甥女，儿、媳、女、婿济济一堂，等着听律师宣读遗嘱，遗嘱偏偏把全部遗产都给甥女芭芭拉一人继承；接着这座宅邸里连续发生了几起非正常死亡。最后查明真凶就是芭芭拉；她在公爵弥留时，迫使他废弃了第一份遗嘱，改立了把全部遗产留给她的第二份遗嘱，并且依次杀害了目击此事的仆役长和可能有意无意导致真相暴露的几个人。

有钱的钜公，有钱兼有势的人，尸骨未寒而家族内讧的故事，早就是小说和影视的轻车熟路，很难翻出新花样来。《亨利家族》一片只是借助于几条命案的侦破才增添了一些悬念。

唯其是老套，虽不能说家家如此，却也是大体皆然。那些等候着瓜分遗产的合法准合法继承人，一个个对遗产眼巴巴，彼此则是乌眼鸡也似的；他们之争夺攘取、互不相让是必然的，不一定来自曾经贩卖黑奴、伤天害理的老亨利生理上的遗传基因，但可以说是这个家族中耳濡目染、浹骨浸肌的社会性

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跟这份遗产不可分，正如权力导致争权夺利，巨金必然导致撕破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纱幕。

亨利公爵留下有形的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无形的后遗症，即使当时不出脓，迟早也会由慢性转急性发作的。

当然，这里的遗产指的是重货宝器，物质的动产不动产。

至于在清高以至崇高的精神界，比如一个学派的创始者，一代宗师，他们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是不是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后遗症呢？

大而言之，截至我们的这一代人，将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又将会留下一些什么后遗症？

倘若没有遗产而只有后遗症，或者说后遗症是唯一的遗产，就太可怕了。这样的先人还不应该诅咒么？

好在就全人类说还不至这样悲观吧。

我们在清点每一笔遗产的时候，要慎之又慎，别把该继承的遗产撇在一边，单把后遗症给发扬光大了。

1996年6月10日

## 读书读报利弊论

蓝英年先生说，五年前苏联刚解体，他应邀到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当时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整天看报看电视，被各个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弄得眼花撩乱，两年间竟没读过一部文学作品。回想起来觉得白白浪费许多时光。去年他又去俄国讲学，决意不看报、不看电视，课余只读文学作品。这样我们现在才看到他许多由苏联文学作品说到斯大林时代作家命运的文章，为我们揭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像我们这一代比较多读苏俄文学的人，看到了书后面的人，有时悚然而惊，有时扼腕叹息，也符合“知人论世”的古训。

三年前至五年前，蓝先生除了教学整天看报看电视，当然也没错。他是把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好传统带出了国门。我们身居茅屋的时候尚且心忧天下，何况亲到了“红旗落地”的地方，能不关心国际共运的兴衰么？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早已大大觉醒，不过在人家的国度里，要恪守不干涉人家内政的原则，自然只能是不动手也不动口，只是整天看报看

电视了。

蓝先生后悔白白浪费了时光，从他后来竟不看报不看电视，专事读书，便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来看，不无道理。看来，做学问的人最好多看书，少看报；至于电视，王朔早就说过那是办给白痴看的，我有些海内外学人朋友就硬是从来不看电视，甚至压根儿没买电视机。——王朔说的是电视节目整体还是仅限于电视剧，我也记不清了，好在王朔的话不是首长的批示，未必他一说，大家怕变成白痴，或怕被当成白痴卖了，就砸掉电视机。办电视的都是聪明人，也不会追究这些俏皮话儿。

不过，问题似乎出在蓝先生那一阵子“整天”看报看电视。如果半天看报看电视，匀出半天读书，做学问，或许能两全其美，既关心了天下大事，又不致太耽误工夫。蓝先生必定干什么都特别地投入，要么就整天看报，要么就整天读书；在这样的学者身上，才产生了读书读报利弊的问题。这个问题，拿我们用惯了的公式说成“读书读报两不误”，似乎解决不了。

近日迹近趋向走红的清末民初学者辜鸿铭老先生，把读书和读报是划作高下两档的。他说：“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他是把读书跟“懂得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番言论乃针对欧洲而发，也许自有他的根据，移用于国内，我猜他的看法也差不多，他应是主张多读古典，而排斥当时改良派和革命派所办的报纸的。在他，自然不仅是出于珍惜时间的考虑。

与辜鸿铭基本上同时代的列宁，读书写书都够上五车，他又极看重报纸。仅是他论报刊的有关文字，译成中文的就达十

五六万言。他重视报刊在宣传党的纲领、批驳论敌和组织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他提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的思想，这在大半个世纪里成为各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指针。读列宁传记或联共党史的，都会把列宁的名字跟《火星报》联系起来。而非党的报纸，则是列宁领导革命离不开的信息源，在影片《列宁在十月》里，列宁一早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披衣浏览刚刚买来的大批当日日报。这个影片在俄罗斯已因伪造历史而被禁演，但我相信列宁看报的这个细节是真实的。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报纸就因反映社会政治生活动态而成为关心国事者每天必读的读物。共产党执政后，报纸更成为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和揭露、批判、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组织订阅，以至组织讨论，对于读不到“红头文件”的人们，报上文章就等于“红头文件”！

一直到“文革”，没听有人说过读报是浪费时光。大家作此慨叹，则是在那以后，就如蓝英年上次从俄罗斯返国，回首两年光是整天看报看电视，这才悟以往之专注，惘然若失。一个学者的看书，多指的做学问，而一个学者的看报，就是指的关心时事政治了。做学问的必看书，看书的未必都是做学问，未必都能做学问，所看书不同，书也有不同的看法；关心政治的人必定要看报(或看电视听广播)，但看报的人未必都关心政治，更不用说像党所要求的那样参与政治，因为今天的报纸上，已经不光是政治新闻了。

书与书不一样，报与报也不一样，读书读报的，人各不同，目的更不一样，却硬扯到一块儿论其利弊，其实是个假问题。把假问题提出来，像煞有介事地说三道四，坦白地说，寻

开心耳。意识其流，下笔其随，杂文随笔，可以是所谓游戏文章(不成章法，或只算游戏文字)，我甚至不讳言，叫做快餐文字亦无不可。何必认真，尤其不必当真。把玩笑当真，易流于“抬杠”，恐怕是书和报都读得太多了的人的常见病。

1996年6月17日

## 从“俳句事件”说起

——夜读抄

在同日本的俳人即俳句作者朋友们交流的会上，我感觉我是在与松尾芭蕉的日本对话，心情惬意而宁静。我试作的汉俳有一句“遥灯如柿柿如灯”，还是1990年秋天游太行山时的诗意，写出付邮以后，发现50年前一位日本俳人也写过柿子，却是柿林里残存的一个，凄凉得多了。那是《法西斯体制研究》书中提到的“俳句事件”：“俳句事件”发生在1941年；反“子规”派俳人栗林一路石写了一首俳句，“萧飒秋风起，枯叶飘零离枝去，唯残一红柿。”特高警察认为，这是歌颂无论如何镇压都消灭不了的共产党，从东京开始，北到秋田，南到鹿儿岛，对全国各地反“子规”派俳人结社进行了大镇压。

这本书关于日本法西斯体制的论述，除了体制演变、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外，并有国民统制与精神统制的专章。这本书帮助我弄清了为什么在日本至今总是晃动着法西斯的阴魂魔影。

## “举国一致”的口号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家体制就在以军部为主导的法西斯势力推动下，开始法西斯化的进程；1936年东京“二·二六”事件即法西斯青年军官兵变后的广田内阁，开始了法西斯统治；从1940年7月近卫文彦再次组阁并于10月建立大政翼赞会到东条极权体制(1941.10~1944.7)的形成，日本法西斯体制全面确立。

日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的法西斯式控制，力图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趣爱好都纳入官方划定的框框，实现所谓“强制的同质化”。这个思想文化统治的加强是与整个体制的法西斯化同步的。

1932年文部省设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以“阐明日本国体和国民精神的原理”，批判外来思想，对抗马克思主义。日本近代兴起的日本主义是一种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思潮，核心是“国体论”，以尊重日本特有传统和国民性相标榜，宣扬国家至上，忠君爱国，本来就包含神国思想、大和民族优越论、崇尚武力、对外扩张等内容或倾向；经过右翼和法西斯分子的鼓吹，他们津津乐道的日本精神、皇道精神和各种法西斯主义货色，更是一塌括子都冠以“日本的”而塞进日本主义。日本主义遂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别称。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

早在明治年代，就有《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对报刊、图书出版采取审查、限制以至查禁的方针。1934年修改出版法，



新规定“冒渎皇室尊严”、“妨害安宁秩序”、“煽动”犯罪的书刊禁止出版，作者将受到追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报刊必须在出版后送审，广播稿必须事前经递信省审查。报刊和广播电台实际上都只能采用政府控制下的同盟通讯社发布的新闻。

### 频繁的禁令和庞大的机构

为了加强文化统制，日本政府颁布实施一系列新的统制法令，比较重要的有：1939年4月颁布《电影法》，以纳粹德国1934年的《电影审查法》为范本，规定事前送审故事片剧本，强制放映新闻片等。同月颁布《宗教团体法》，规定对“妨碍安宁秩序或违背臣民义务”者，实行限制、禁止等处分。1940年12月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禁止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外电新闻，不许报道天气预报；对“散布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处以一年徒刑以下的刑罚；出版物违禁，不仅禁止发行该出版物，还可以禁止发行同一作者或同一出版社的出版物。1941年1月颁布《新闻纸掲載限制令》，禁止事项更多也更具体。同时还颁布法令对书报用纸进行限制、配给，固然与纸张紧缺有关，当局也借此压制他们不喜欢的报社、出版社。

从事文化统制的机构更是不断强化。1940年12月，作为各官厅情报、报道、宣传事务联络协调机构的内阁情报部，改组扩大为内阁情报局。在情报局总裁之下，设五部十五科，分掌企划、调查；新闻、出版；对外宣传；审查、取缔；文艺娱乐。除继承情报部的原有职权外，还负责新闻、出版、电影、

戏剧之类的指导、审查和取缔，包括推荐电影、戏剧、歌曲，组织巡回演出等。情报局直属内阁总理大臣。情报局总裁与书记长官、法制局长官、企划院总裁并列为内阁四长官。它是一个军部与法西斯官僚的结合体，成为法西斯文化统制的总部。全部人员达 600 名之多。

日本还建立了一批官办文化团体，统一和取代分散的民间文化团体，作为官方文化统制的辅助机构。1940 年 12 月，由内阁情报部部长任筹备委员长，成立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改组为日本出版会）。会长等人员均由官方选定，协会决定的事项须经主管官厅认可。1941 年 5 月，又成立日本新闻联盟（后改组为日本新闻会），协助官方对报纸的编辑、用纸配给、记者登记、培训等事项进行全面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 6 月，在情报局领导下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其章程规定“本会的目的在于，结集全日本文学者的全部力量，确立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下设各个分会，共有会员 2500 余人。同年 12 月，成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吸收除文艺评论家以外的所有评论家，会员共 910 余人；这个报国会宣称它的使命在于不让日本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立日本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和设想，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文学报国会和言论报国会都由情报局指定著名的国家主义评论家德富苏峰为会长。

在情报局统制下，各种文化事业、活动只能按官方旨意办事，不能越雷池一步。情报局向各报社、杂志社通报禁止报道、刊登的事项和不许撰稿的黑名单。每期杂志的编辑计划和撰稿人须事先申报取得批准。报纸的标题、内容、照片、广告都要接受审查。审查越来越挑剔，禁发稿件成了家常便饭。出

版图书要预先申报计划，附上原稿或有关资料。出版社甚至必须提交购买图书的“读者卡”，有关方面据此调查读者的思想倾向，有的读者受到查问，有的军人受到处分。一些著名学者因言论、学术问题而被逐出大学校园，甚或受到审判。思想迫害、学术治罪的事件不断发生。

### 思想迫害和学术治罪

凡此，日本的文化统制，还有教育改组，都是推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是建立法西斯“国防国家”总国策的一部分。

日本在近代天皇制统治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和军国主义思想。革命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高压取缔。不过，在不反对天皇制的前提下，尚允许某些自由民主思想的流传，允许学术研究的一定自由。但是在大力推行法西斯化以后，不断扩大取缔的范围，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直到和平反战的思想情绪，都成了非法的。

例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他所著的《刑法读本》曾被大审院作为好书推荐，他的刑法学说其实是很保守的。不过，泷川不赞同刑罚万能的理论，主张重视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由此出发认为革命家并非无耻之徒，犯内乱罪者不应按道德卑劣者处理；他还提出男女通奸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在谈《复活》中刑法思想的演讲中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仅仅这一些，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教授”，1933年其著作被内务省查禁，随后被文部省“停职”。此事引起一些大学

师生抗议。结果文部省坚持强硬态度，除泷川外，还让不肯屈服的京大法学部 2/3 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等 14 人）辞职。

1937 年、1938 年又相继发生矢内原事件和河合荣治郎事件。两人都是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信仰基督教，在《国家的理想》文中提出“正义与和平乃国家之理想”，允许不同主张的存在是真正实现“举国一致”，达到国家理想的必要条件，被责为“不稳言论”，被迫辞职。河合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所著《法西斯主义批判》一书，以扰乱社会安定秩序为由在 1938 年被禁，次年被免职，并被诉违反出版法，1941 年被认定有罪，经长期折磨，身心交瘁，1944 年病逝。

前面说起的“俳句事件”也就是在同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类文字狱甚至波及中小学教育界。从 1920 年代末中小学里的“生活作文”，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自由选题作文，但内务省认为，这会促使儿童观察贫困生活，“诱致阶级意识”，于是在 1940~1941 年间，在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带，对“生活作文运动”进行镇压，接连几次逮捕，有一次被捕 109 人，还有一次被捕 50 多人。在“教育改组”的题目下还作了大量文章，从略。

## 愚民政策和知识分子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

在言论报国会的会议上，内阁情报局次官奥村喜和男指出，当务之急是“抛弃‘美国心’、‘英国心’”，“回归于‘大和心’”；改变了明治维新时期《五条誓文》中“求知识于世

界”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欧美近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的方针，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在对德意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大开绿灯的同时，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1943年，内务省、情报局禁止演奏约1000首英美乐曲，后来甚至禁止使用美国型的乐器吉他、夏威夷琴和爵士乐的打击乐器。并且决定从日常生活中驱除英语，改换商品名称。

日本法西斯的文化统制与国民统制（它有形成严密组织形式的国民统制网络）相配合，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时容易做到，但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团体，信息渠道单一，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剥夺了国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可能。以致如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直到天皇宣告‘结束战争’之前，多数国民没有丧失对敌的斗志，下定决心玉碎或在本土一死战”；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毒害最大，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加入“神风队”，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由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日本总要在教科书里下功夫篡改历史了。

这本书不但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前提、体制构想和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作用，并且论证了社会传统和国民心理与法西斯思想统制的关系，不及备述。在最后部分说到“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为之效力”时，引用矢内原忠雄对当年日本知识分子所作的四类划分：第一，与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

天皇神格论、大的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本书著者指出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并举其主要代表京都学派加以分析，兹从略。

《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第一编讲德国，第二编讲意大利，第三编讲日本；上文摘引较多的是有关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统制”一节，为吕永和、孙仁宗撰稿。

1996年9月12日

## 儿女情累

韩国的政治风云，我是不甚了了的，知道一星半点，无非从报上看来。但我对金泳三 1993 年 2 月上台以后的一些反贪举措，特别是对他在追究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违法行为时表现的胆识，我是颇为欣赏的。因此，看到一篇述评题为《金泳三政权显露末世景象》，不禁对他有些同情起来了。

当然，这里有长期经济低迷、劳工不安、政治不信的问题，而最大的威胁无疑来自“韩宝事件”的政治冲击。选民们对“韩宝事件”的处理，尤其是金泳三次子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无法释疑，大大影响了金泳三的支持率。

金泳三面临的各种国事问题，那是任何执政的官员都会面临的，他要操心，但有内阁和他的执政党与他分忧；唯独他的儿子带来的麻烦，是不是更让他头疼？

至于他的同僚们能不能替他分担头疼，帮他摆脱窘境，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我们东方道德习惯，“以父母之心为心”，自然理解

金泳三的心情。他是遭到儿辈之累了。再以政坛人物之心为心，则这个小儿造成总统先生的尴尬，不仅丢面子，竟还可能波及今年冬天执政党的选票，岂不令人痛心！

不过，金泳三如果想想这种悲凉也许不独他一家为然，或能稍稍地释怀。

如果以英国女王之心为心，儿辈的风流韵事，不止关乎传统的脸面，勾起的竟是王室的地位问题，要不要改行共和制之议，这不比选票的事大得多吗？

萨达姆总统能者多劳，儿子、女婿一齐来，都不是省油的灯。女婿双双结果掉了，大儿子被刺致残，二儿子出掌大权。我不知道，倘以萨达姆之心为心，是不是索性没有儿女，倒更少些麻烦呢？还是宁可儿辈出一大堆麻烦于前，再来调和摔阖于后，才更显得游刃有余，应付裕如？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非鱼，又安知鱼之忧以及鱼对儿辈之累的看法！

中国古代有个南汉刘皇帝，认为所用臣工，一有家室，便生私心，于是下令百官皆阉，先阉后用。这个办法好像“彻底”了，但当时既不见效，未能免于很快地亡国，此别致的创意已告失败；今天也就更不便向国内外推广：太监治国，成何世界！

金泳三之子的事情终会大白于其国内外的，金泳三也当会善处其事，我们自可“莫管他人瓦上霜”了也。

1997年4月11日



## 弥天小谎

都说弥天大谎，何来弥天小谎呢？

美国空军公布了一个秘密，所谓飞碟之说，原来并无其事，是故意造出来有所遮掩的。

我还记得，50年前的1947年，一时间出了两大新闻。在我们国内，是说有个四川的杨妹能够辟谷；在国际，便是在美国某地发现了飞碟，中外记者故神其说，就显得倍加神秘了。

尔后的半个世纪，尽管冷战连绵，灾鸿遍野，人间忧患已不胜其扰，而关于飞碟的传说，关于外星人的种种猜度直至“目击”的陈述，仍然不绝如缕，时时见诸传媒，有时还是图文并茂，像煞有介事，让人目不暇接，不能断其必无，只好信其或有。

杨妹不吃饭照样度日的新闻，热炒了一阵，终于经好事之徒的亲测目验，“证伪”了，大家散去，各自找“饭辙”去了；在衣食维艰的年月里，一个可以不吃饭还好好活着的美梦

破灭了。杨妹其人，失去新闻价值，后遂不知所终。这个小小的热点，只热了三几个月。

飞碟故事却持续了50年。还亏得有关当局不想把这个玩笑再开下去，他们也不为大量“吃飞碟饭”的人着想，而“以大局为重”，选了此说恰满50周年之际，戳破了彩色汽球般的谎言。

这个谎言50年来飞遍全世界，涉及了与地球相距若干光年的大大小小的外星，可以算作“弥天”了；但虽然骗人，并不伤人，而能给受骗者以一种飞鸢八极的快慰和满足，办旅游，出杂志，也是大家自愿掏钱，且不无回报，如同在天文馆里、迪斯尼乐园逛一圈，神游神侃，不亦快哉！所以不叫大谎，称“小谎”就是了，不以骗人相追究。

如果系铃人不出面解铃，让这个谎言继续迷惑人们，除非真的遇到认真而又有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人来揭穿，说不定还要“跨世纪”。因此，不但不追究他们昨日的撒谎，还该表扬他们今天的诚实。一个人承认自己撒谎不容易，一支军队一个政府部门更难；好在50年过去，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都换了许多届，那些前任之所以面对全世界撒谎，也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口实，叫作为了“国家利益”甚至别的更堂皇的名目，一点都不丢面子。

也许50年是一个周期。美国总统胡佛在任时的诸多劣迹，在半个世纪以后随着档案的公开大白于天下。日共前领袖野坂参三，在1930年代向斯大林诬告陷害同志致死，至1980年代罪证昭然，开除党籍。

“猫盖屎”的小谎易破，“弥天”之谎难破；弥天的大谎比弥天的小谎，揭穿起来更难。但谎言总是不会“万岁”的，

奥斯维辛之后

一切谎言依赖靠谎言获益的人以存在，一旦它不再能给这些人增值，相反，揭穿它倒能带来新的利益时，它就失去了被人圆谎的理由和死守谎言的卫士。谎言的揭穿，只是时间的迟早罢了。

1997年8月13日

## 推荐一篇国际题材杂文

严秀同志写的《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是一篇好杂文，好的国际题材杂文。

天下之大，芥豆之微，无不可以入杂文。一衣带水之东有人篡改历史，粉饰侵略，居心叵测，应该予以驳斥和揭穿；天涯万里外的他山之石，也不妨借来攻玉。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地域无分远近，也都有可以总结的教训。

严秀说的是阿尔巴尼亚，涉及已故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霍查。直到1972年以前，霍查与中国友好。当时中国致阿党代会的贺电中，曾誉之为遥远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并且引王勃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期相许，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大约还记得幼时唱过有关的歌曲。

世事变化万端，国际关系敌我友的分化改组无时无之，背景复杂，资讯不足，自是杂文作者的难处。今天议论霍查旧事，一是远距离，二是“冷处理”，似乎容易些。但若不是严秀近年一直关注和研究国际共运和原“苏东”问题，则虽面对

有关阿国土上至今犹存 50 万个大地堡的外电，也不会引发如此的深思，发为如此切中肯綮的议论。

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后和波匈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文，在分析斯大林问题之后，指出搞得民主不像民主、专政不像专政，是致乱之由和致败之由。

我以为严秀文章分析 200 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修 50 万个大地堡，平均大约每 5 个人分担筑一地堡的任务；而这些地堡对于防御现代战争中的外敌入侵意义不大，其作用恐怕主要用来震慑群众，也就是把专政和镇压施之于人民。曾几何时，民变烽起，那个政权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严秀此文不过 2000 字，实际上是前述总结历史经验的继续和深入。这个远在万里外的地堡故事，让人不由不想起秦始皇嬴政收天下兵器铸金人，又征千万徭役筑宫殿长城，终不免二世而亡的更古老的故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现在常写国际题材杂文的，还有一位年逾 80 的老同志冯英子。他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恶，对日本朝野右翼势力的叫嚣，及时痛加抨击，有理有据，正义凛然。

严秀的国际题材杂文，亦如他别的题材杂文一样，都是既有激情，又持之有故，重在分析，不是简单地说“不”或说“是”，所以娓娓道来，却有很大的说服力。

让我们向严秀、冯英子学习，包括学习他们国际题材杂文的写作。

1997 年 9 月 3 日

## 葛云飞之墓和沙皇之骸骨

三国蜀汉名将关羽被杀以后，据说当阳玉泉山有人在月白风清的半夜时分，听到他在空中大呼“还我头来！”幼年读书至此，倍觉凄厉，毛发直竖，总是急急合书，惘然失神。

今天我仿佛听到抗英英雄葛云飞在喊“还我头来”了。葛云飞是吾乡萧山人氏，鸦片战争时镇海三总兵之一，据守定海土城，血战六天六夜，负伤40余处，英勇战死。但消息传来，萧山衙前的葛墓被人盗挖了！多年传说葛云飞的首级被英兵砍掉，清政府在下葬时特制了金首级安上，盗墓者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浙江省领导人刘枫愤慨地说：“连民族英雄的墓都要盗，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了！”

某些人的良心掉进钱眼，或者索性喂狗吃了。

在刊登这条消息同一天的报纸上，看到另一件新闻：在俄罗斯正为末代沙皇遗骨葬到何处而起纷争。

1918年7月17日，流放在叶卡捷琳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布尔什维克行刑队枪决。那真是死无葬身之地，谁也不

知道尸首埋在哪里了；八十年河东，八十年河西，现在找到了他一家的遗骸，沙皇多数亲戚想归葬圣彼得堡森林，莫斯科市市长拼命游说要把沙皇遗骸葬到莫斯科救世主教堂，叶卡捷琳堡市市长坚持应该葬在当地，就鼓动当地法院禁止外运。目前，据说莫斯科大法官已经向最高法院起诉云云。

我在1957年即十月革命40周年的春天，曾经访问过叶卡捷琳堡（当时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参观了少年宫，人家说沙皇早年就全家囚禁在那里。我以这个因由写过一首诗，歌颂全世界“皇冠落地”，也歌颂了对末代沙皇的处决，谓之“最简单的真理”。又经过40年后，回头看历史，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处决沙皇（且不说还株连其全家妇幼和佣人、医生），绝非上策，这是从政治影响立论。至于从人道主义方面看，这种处理政治问题和政治人物的方式，还是属于中世纪的。在中国，尽管封建性的根深蒂固不下于俄罗斯，但辛亥革命后对逊位的清室采取了类似后来的“赎买”办法，比这种秘密行刑、埋骨荒郊也还略胜一筹。苏联在1940年代对波兰军人制造的“卡廷惨案”，事前周密部署，事后守口如瓶，乃至诱过于人，情况和处决沙皇类似。所有这些史事，还有肃反扩大化中对各种各样苏联人的人身残害，而又总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上恐怕是使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革命失去民心，终致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是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苏联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是较高的。至今我们看到那里人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对为祖国和人类作出贡献的先行者，包括反法西斯和卫国战争中的英烈，也是十分尊重的。我看，围绕沙皇遗骨归葬地的纷争，特别是莫斯科与叶卡捷琳堡两市之争，当然首先反映了价

值观的变化，也不排除一些地方官员从旅游收益着眼，甚至不排除可能掺杂着某些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然而，主要的应该说是体现了一种平常心，一种人道的感情。

在我们这里，不用说爱国主义，也不用说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只要有一点平常心，一点人道的感情，就不会去盗掘民族英雄葛云飞的墓，不会在例如雨花台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搞什么狗展，不会发生向当代烈士墓里灌狗血禳灾的迷信愚昧伤天害理行为。这里提到的近代、现代、当代墓主都是英烈，这些违法乱纪、违情悖理的行为反差太大了，但并不是说，对英烈的亵渎是“没良心”，而如何对待普通人中的生者和死者就不存在良心问题了——我想，这是不待说明的。

1998年1月10日



## 我们的教科书问题

最近语文教学的问题引起注意了。在讨论教材的时候，有人提出语文教科书至今还保留着“过时”的范文。这真是使人尴尬的事情。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段里，我们强调一切文字作品(说文字作品，因为不限于文学作品，有些叫文学的也并不是文学作品)要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具体到为当前政策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时过境迁，就有个过时问题。政治风云激变的岁月，政策变化大，人事变化也大，“上”自刘少奇，“下”至时传祥，一旦名归另册，当然就得从一切文字材料中消失，或是换一种写法。许多这样为时事服务的诗文，作者在成集或再版的时候都得修订，把“背时”的人物改掉。甚焉者有只改名字不改内容的，例如把原来以“批邓”为主题的诗，轻轻一改，就改成为“揭批四人帮”以至歌颂邓小平的主题了。

我们的教科书编审工作一贯是比较郑重的，这样的事没发

生过。但也许因为郑重，不轻易作变动，就把个别反映、宣传“大跃进”或“人民公社化”的篇目保留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除了文从字顺可资垂范以外，还有多少艺术性或文章技法具有示范意义；而它在主题上的适合时宜，恰恰为后来的“不合时宜”张本，因为那“时宜”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实践证明它所宣扬的不但不符合现行政策，即在当时也是错误的。只靠“主题思想”支撑的“作品”，也就站不住脚了。把这类篇目从语文课本上撤出，好像没有多大异议。我想，这当然绝不意味着应该换上另一些现行政策的宣传品。

历史教科书跟语文教科书不一样，它正是要把“过去时”的史实告诉学生，它应该让历史如实地以本来面目出现。

“欲亡其国者先去其史”，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我国东三省以后于全东北，继而占领华北和中南之后于沦陷区，在中小学历史课教材中，极力删除或篡改近百年中国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战后，还是这个日本，在其国内的教科书里，不断隐瞒侵华真相，美化侵略战争。日本文部省的这一作为，激起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抗议，也为其国内的有识之士所不满。

我们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从历史承继优良的传统，也要从历史汲取必要的教训。“文革”中一度悍然废除历史课，同时颠倒历史，伪造史实(荒唐到把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改为毛与林彪会师)，是出于愚弄群众，消除异己，夺取最高权力的反动政治需要。当时成长的一代，了解真实历史的权利被剥夺了，今天他们的子女，有权了解历史的真实，包括他们的父母一辈为什么失去了童年和青春，并在“革命”的名义下受到非他们的年龄所应承受的苦难。如果

说仅仅为了“忆苦思甜”，那就把历史教育的意义缩小了。须知我们现在受教育的一代人，是要投入 21 世纪国际竞争大潮流的，倘不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了解自己民族真实的历史，就不知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就很难从历史的高度建立是非观和荣辱观，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怎么能够清醒地作出自己的选择，作出应有的奉献!?

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想，也可以说，不知历史的人是愚蠢的人，不知历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我们都应该从愚蠢中自拔出来。不知历史者没有将来，套一句老话：“将何以堪”啊!

语文教学的问题人们开始重视了，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是不是至少该引起同等的重视?“文革”以后恢复了历史课，是明智的，从教育后代的千秋大业着眼，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有没有遗漏需要增补，有没有不实需要修订，有没有偏见需要改正?

1998 年 3 月 23 日

## 小朱加什维利

读过斯大林传记的人，都知道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原姓。小朱加什维利，指的是斯大林的大孙子叶根尼·朱加什维利，他对他的祖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拥有跟爷爷一样的姓氏感到无比荣耀。斯大林开始革命生涯以后，就告别了朱加什维利，他的孙子重新用这个姓，其实不必在前面加个“小”字的。

朱加什维利 62 岁，应是 1935 或 1936 年生，他的父亲雅柯夫是斯大林的长子，苏德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要求，让苏联拿被苏军俘获的纳粹将领交换。斯大林拒绝了。最后雅柯夫死于集中营纳粹武装分子枪口下。

斯大林逝世时，他的长孙朱加什维利已经十七八岁。他后来成为一名军人。据说他性情暴躁，而更大的特点是“奉爷爷若神明”，“特别怀念爷爷的那个时代”。

斯大林时代应该怎样评价，在俄罗斯和苏联，已经不止是历史学家的事情。那里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在中国，1949 年

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对苏联和斯大林是不许说一个“不”字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之后，中共中央发表的文件，对斯大林持“三七开”的观点，肯定其“七分功”是继承列宁的事业，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并领导卫国战争直到胜利，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指出其“三分过”则在于肃反扩大化，使无数忠诚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公民惨遭镇压。四十年来的众多历史事件，加上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开，使更多的人对斯大林时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组织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在此前后的大清洗，把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剪除殆尽。这时候他的孙子朱加什维利还小，不懂事也不记事。1941~1945年的战时生活当会进入他的记忆了。他记住祖父领导打败希特勒的功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斯大林重作评价的时候，他已经成年，却认为所有对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披露和批评，以及一切对斯大林的批评，都是“诋毁爷爷的荣誉”。

在这方面，他的堂弟，斯大林的小孙子亚历山大·布尔达斯基就与他不同。57岁的布尔达斯基，他的父亲是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他大约生于1940或1941年，13岁那年改从母姓。他是一个戏剧导演，喜爱诗歌，轻声慢语，但对他祖父有所不敬；他说：“我不知道堂兄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爷爷的荣誉而战。爷爷犯下的罪恶不是谁能否定得了的。”

这兄弟俩在对斯大林的态度上不可调和。观点不同，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朱加什维利采取的却是极端的立场。他搜集那些他认为是“诋毁”他爷爷的人的名单，他说：“被我列上名单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总有一天我会

跟他们算账的！”“我真想像爷爷一样亲手枪毙了他们！”这个名单里，自然也包括他的堂弟布尔达斯基，他说：“布尔达斯基是一个卖国贼，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亲手吊死他的！”真可谓有其祖乃有其孙，他对祖父的崇拜和迷信，确是到了不顾史实、不问是非的绝对化程度，不知是亲情，还是盲目的家族荣誉感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对历史上从老布尔什维克到普通农民以及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成千上万无辜被杀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今天，他还顽固地坚持斯大林以暴力治国，以暴力对待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时代的错误使人觉得他是可悲的，但他的所想所说，让我们想到，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赶上斯大林在世，他岂不会毫不迟疑地参与肃反扩大化的行动，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斯大林”的名义去杀人吗？

从人的灵魂的层面看，这类以暴力对待歧见的惯性，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危险。

斯大林的历史功过须让历史来裁判。这与他的两个孙子都无关。我们局外人谈论斯大林的问题，更没有鞭尸之意。倒是列宁的语意启发我们，那些属于旧时代的东西，看似死去了，但还散发着尸臭，毒害着社会。世纪之初就有过“骸骨的迷恋”一说，作为比喻，它的喻义是普遍而深刻的。

1998年4月17日

## 以苏为镜

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间屡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茫然莫名其妙，但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党，一夕之间，忽而瓦解。

这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七八年过去，偶然从一些相关报道的字里行间，仿佛得到一点启发。比如说在群众“上街”的热潮里，捷尔仁斯基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推倒的——捷尔仁斯基何许人也？他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后第一任肃反委员会即“契卡”主席。因他死得早，不是被斯大林镇压的，所以整个五六十年代，也曾是中国青年的偶像之一。有关他的传记性文学作品，就印行过《燃烧》、《穿黄狼皮大衣的人》，今天60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记得。他的塑像一直挺立在莫斯科前契卡也是后来的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门前。其竟被推倒也，恐怕并不是针对他个人，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人跟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他所创建的这个部门执行

过例如肃反扩大化一类滥杀无辜的命令，“以革命的名义”树敌过多，为苏联共产党结怨甚深，捷尔仁斯基遂也就成了遭恨的象征。

金雁在《新俄乡纪程》中，说人民抛弃了苏共，是因为苏共抛弃了人民，抛弃云云，不失为温和的说法。苏联人民长时期所遭受的经济剥夺和政治迫害，是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能施加的。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怎么会从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变成了实际上是苏联人民的对立面呢？

最近从《作家文摘》上看到黄苇町著《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的部分章节，勾出了一个大致历史轮廓。

黄文指出，苏共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如前所述，苏共十分缺乏党内民主。又长期以党代政，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应该说，这三制使领导人以言立法，以言废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

黄文说，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诸子孙。”

黄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



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他认为，剧变以后的进程也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看来，从苏联“亡党亡国”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这些新显贵们，不少原是前朝遗老，早先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老同志”；当他们还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的时候，就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利禄之徒，他们坚持的其实只有一条原则，就是所谓“现在该轮到我們捞一把了”。一俟国内发生政治危机，他们乐得如黄文所说的“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在政权易帜之后，继续做他的官，发他的财。

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几代身上。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学习讨论，以提高警惕，寻找抵御之法。当时我们相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的语录，认定要搞垮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必是“思想领先”，由思想文化的侵袭和腐蚀入手，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似乎也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想想，未必尽然。有比意识形态更有力的东西，那就是金钱，竟被我们忘记了。尤其对于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人，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就能左右他们的思想行为。毋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先就腐败以至腐烂，自我颠覆了。可以说，江山变色，由腐败始。

套一句我们传统的话儿，所谓“亡党亡国”的最大危险，“乃在萧墙之内”！

我没有看到全书，不能对全书作出评价。然而书中涉及苏联解体缘于官僚特权阶层大搞腐败、与人民为敌这一分析和论

述，至少接触到部分的真实，可读。过去在“文革”中骂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纯属瞎说。今天，在苏联和苏共都已瓦解之后，探讨一下十月革命的故乡何以会一朝“红旗落地”，苏联的人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应该不仅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1998年12月25日

## 逸事与丑闻

哪里出了贪污受贿，叫腐败，就是丑闻，只是有攻守异路：攻之者要揭发曝光，守之者捂着盖着包庇着，皆因这是公认的丑闻。

哪里出了桃色新闻，或者叫做绯闻，就不一样了。有的说是丑闻，有的说是逸事，所谓风流逸事：或者宽待古人，一样的事，在古人是逸事，甚至是“韵事”，在今人则是丑闻；或者宽待死人，活着时传为丑闻，死了以后时过境迁，定性也就变为韵事了。至于当今，在里巷小民算是丑闻的，到明星名人那里，就成了齿颊生香的谈资，小报暴炒的“要闻”了。

不是常常作中西文化的比较么？

如果绯闻出在公职人员身上，就比较出异同来。

拿美国来说，我们都读过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那篇小说，——对立面为了搞垮对手，收买了一群小野孩子，到竞选会场上去“认爸爸”，使正在作竞选州长演说的先生涉嫌为一群非婚生子之父，不胜尴尬之至，——此文多年被我们选入

中学课本，固然是为证明美国政治的“假民主”，竞选导致乱成一锅粥，可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要赢得那里的选票，不能不多加检点，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可见在那里，舆论一般严于官而宽于民。

在我们这里，一旦发生绯闻或丑闻，不但官民有别，官大官小也不一样，一首至少流传了十几二十年的新民谣说，同样性质的事情，大领导是“业余活动”，小领导是“作风不正”，一般干部可就叫“流氓成性”了；处理时，有的去“休养”，有的去“教养”，也算“区别对待”嘛。

这是中外之异；而当官的干这些勾当时，讳莫如深，强化保密，被揭出来，又不免掩盖和抵赖，大家从克林顿事件中已经看到，其实不让克林顿专美，这一点倒是东西相同的。不同的是克林顿的这些事情没有当作隐私，相反弄得个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不像我们对陈希同的“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只一笔带过，不去满足窥视欲的低级趣味，不让那些肮脏东西污染视听，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有人说，美国可以把在位的克林顿的不轨行为拿来示众，而此时陈希同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是不懂得中国一向主张抓主要矛盾，如果只曝光陈希同的“糜烂”，不是分散注意力，转移视线，因小失大了吗？况且，只要注意我们的传媒，就会发现近日也不断有涉及官员“男女关系”的案件公诸报端，但不像克林顿案那么“单打一”罢了。

举四川射洪县副县长唐兴东的例子。他于1997年任县财政局长时，与下岗女工李雪红“建立恋爱关系并与妻子离婚”，虽说也有一段婚外恋的情节，不过经过法律手续办了离婚，如果到此为止，也就只剩情夫情妇两人的事了。但因唐兴东的父

母反对此事，那个李女士对唐的母亲大打出手，新升官的唐副县长也赶来助阵，把母亲推倒在地，他父亲的无名指关节也被打错位了，事情才复杂起来。二老向法院起诉以后，1998年12月18日，射洪县法院判决被告人李雪红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伤残鉴定费等共4000元。这天中午，唐副县长带着“社会闲杂人员”冲进审判长范光荣家，对他拳打脚踢，还拿起菜刀扬言要砍死审判长，被赶来的民警制止。这则新闻，以准“绯闻”始，而以暴力相向终。

另一个例子是河南驻马店市的女副市长陈桂玲，仕途一帆风顺，原是遂平县人民银行的一个科长，提为副行长后，1996年又升为行长；相隔两年，于1998年3月，到驻马店走马上任为科技副市长。就在这一年夏季她离了婚。在1999年1月5日、6日之间，她举枪打死了时任河南省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主任的刘铭鼎，然后自杀。据警方称，此案已基本调查清楚，属于情杀。这也已从一般“绯闻”升级为人命案，不是克林顿式的偷情可比了。

前一个案例，更带中国宗法社会的色彩；后一个案例，粗看好像带点“殉情”的味道，但稍加寻味，这决不是当代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倒像是顾城杀妻的翻版。也许夹杂着更多的世俗因素。不过可以看出，这位36岁的女副市长，手段与市井愚昧妇人无异，大不类政治人物所为，也许是涉足官场还嫌不深吧。

从这两例，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哪些异同，还是留给专家们去研讨的好。

但这一个副市长，一个副县长，死了的，活着的，都不会像克林顿那样，一边像犯了错的孩子等着挨骂，一边还继续保

持居高不下的支持率。真是中国的群众太“势利”，谁出了事都只供别人“瞧好看”么？有人分析，那些支持克林顿的美国的“群众”，据说也是只看到克林顿带来的经济好处，因此同样难逃什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讥云云。不过，话说回来了，克林顿在“花案”之外，好歹是有政绩的，那两人除了搞婚外恋，还做了什么有益于人民的事吗？

1999年1月15日

## 谁 管 谁

去年夏天，西安一个七岁的女孩、二年级小学生壮壮，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见到了克林顿，并且有简短的对话（《作家文摘》摘自《女友》1999年1期）：

克林顿看见了站在一个两米高的台子上的小姑娘，等她走下来，握住她的手说：“你是个勇敢的小女孩，站在那么高的地方你不害怕吗？”

壮壮说：“只有站在那儿才能看见你啊！”

“你很想看见我吗？”克林顿被壮壮的话逗笑了。

“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壮壮很干脆地说。

“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什么的吗？”克林顿笑问。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

“唔……”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很认真地对壮壮说，“应该说是美国人管美国总统。”

小壮壮自然会作如上的回答，克林顿也必然要作如上的辨正，国情不同嘛。

小壮壮当然还没学过政治学，也不懂得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她是从她的经验出发，认定大人是管小孩，老师是管学生……那么美国总统就是管美国人的吧？

克林顿知道，他是替美国人管事的，管理国家和众人之事，然而，归根结底，他这个总统，也还是归美国人“管”着的，他得服“管”；故虽面对异国的小女孩，他也不敢胡说。不久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他的错，就错在他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而他又想背着人，不让人管。最后美国人还是“管”到他头上，“管”得挺凶。

小壮壮暂时还闹不清美国的事，那不怪她，她还小呢。比她大得多的人，像我吧，不是连我们中国的事，也未必就都闹清楚了吗？

怪只怪这个“管”字，既可以是管事，也可以是管人；同是管人，也有多义：在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常用的，就有管辖、管理、管制、管教……不一而足，壮壮是指的哪一“管”，她自己可能也还没弄清吧。

再就要怪“总统”这个外来语，人家叫作 president，按照词典的注解，它指的是历史上的州长，(殖民地)总督，又是长官，大臣，(议院的)议长，法院的院长、庭长，(美国大学)校长、(英国大学)院长，会长，社长，(会议)主席，(银行等企业的)行长，总裁，董事长，总经理等；当然，还用来指某些国家元首即我们所译的总统。原本只有一个“主持者”的涵义，不知哪位第一次用汉语译介这个词的翻译家(上个世纪叫做“通事”)，参考了我们一国定于一尊的传统，找了一个“总而



言之”“统而言之”可以使人认为万人之上大权独揽管天管地管到拉屎放屁的这么一个总管统辖的“总统”尊称，使这个词在原文中本来还有的具体部门主持者的意思全都相形失色，退避三舍。而且早在我们中国辛亥革命后引进这个头衔的时候，就还曾独出心裁地加了个“大”字，曰“大总统”。那时候已经号称“中华民国”而不是皇清、帝国了，但官与民，谁管谁，“应该”怎样是一回事，“实际”怎样又是一回事，一直是个糊涂公案。大官“管”小官，大小官一块儿“管”老百姓，则是深入人心的了。

小壮壮认为克林顿这个美国总统不但代表着米旗蛋糕，米老鼠，好莱坞和冰淇淋，而且是能管(全体)美国人的大权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她这样作答，也许跟她的国内经验完全不相干；一个七岁的小姑娘，能有多少堪称经验的东西呢！

1999年1月20日

## 何必改词

在北京，一次《黄河大合唱》纪念性演出结束时，全场在报幕员的提议下全场随着台上齐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我会唱，歌词也能记诵：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我在电视屏幕前哼唱，唱着唱着不对了，再唱第二遍时，仔细盯着字幕看，发现原歌词中的“向着自由”被改成“向着胜利”了。

是的，我们多年来唱的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不久前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到处播放劫夫在19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就是反复轮唱：“向前进，向

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团结就是力量》，是1946年作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一出小歌剧的主题歌，那时候第三次国内战争刚刚开始，人民解放军尚未转入反攻，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三年光景，“胜利”和“新中国”的确都在前面，要向前进，才能走向胜利，走向新中国的。“向着胜利”，有什么不好呢？

然而，“向着自由”，又有什么不好，有什么非改不可的理由？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号召在战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他说：“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当时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想到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的时候，认定她的属性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这是毫无疑义的；在歌词中不可能并列五个定语，但在以团结奋斗为主题的歌曲中，以“自由”同“法西斯蒂”和“不民主的制度”对举，是不错的。这是包括“自由”一语在内的歌词的政治背景。

而在这以前的1930年代，甚至早在1920年代，多半是由赴苏学习的共产党人从苏联带回来一首革命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拉金作词，别雷编曲），原词有七段，大约为了普及，易于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人中传唱，流行的歌词是由中国同志另填，压缩为一段四句的：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  
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歌名亦改为《光明赞》）

是谁填的新词，已无可考，但在当时直到 1940 年代末流传甚广。艾青的长诗《向太阳》，公木的《八路军进行曲》（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都写于 1930 年代末，我看都受到了此歌有形无形的影响。至于牧虹作词、卢肃作曲的《团结就是力量》，“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正是前引歌词的引申，不是“万丈光芒在前头”，而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我们”，团结得如铁如钢的革命力量自己“发出光芒”了。这就是此歌的艺术背景。

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一曲的政治背景和艺术背景，就知道硬把“向着自由”改为“向着胜利”，姑且不问是否征得了原作者的同意，是否有侵权之嫌，就事论事，也是没有道理的，是轻率而粗暴的。如果不是出于青年人的无知，而是出于主事者的武断，就尤其值得一切有责任感和历史感的文化工作者注意。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革命需要是第一位的。革命的群众歌曲的生命，在于适应群众运动中团结鼓舞群众的需要，因此有些歌曲的歌词，在不同时期作了改动，如舒模作词作曲的《你这个坏东西》，在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版本；乔谷等作曲的歌唱军民关系的《朱大嫂送鸡蛋》，到后来改词成了讽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朱警察查户口》。但不是任何以革命的名义所作的改动都是正确的和成功的。至于“文革”以后一度居然要把《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乱改一番，不说是居心叵测，也是匪夷所思吧。当时决策者的政治动机姑且不论，事实也证明，尽管当时组织了像光未然、李季这样的名家去干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也终难改掉田汉在国难当头的 1930 年代写定的歌词，那

里凝结的是诗人的心血，也是千百万苦难中国人心的呼声，血的号叫！

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纪的90年代末，为什么要去改掉50多年前唱遍全国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两个字，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记忆，就能抹煞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吗？

写到这里，我想这篇小文的标题未免太温和了，应该改为：《不许篡改》。

1999年5月18日

## 说起《祖国进行曲》

在《世纪之问》一书中，读到李辉和蓝英年两先生的对话《镜子中的历史》，提到《祖国进行曲》。李辉说：“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好像能唱许多苏联歌曲，其中有一首号称‘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歌词大意是：‘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有无数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亲切的称呼是同志。’过去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现在知道了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蓝英年说：“现在俄国的电影，一演到劳改营的场面，就放这支曲子。”

我年轻时候很喜爱这支歌，那是同对苏联的向往之情分不开的，而苏联，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国革命者在上世纪30年代把革命根据地叫“苏（维埃）区”，甚至喊出过“拥护苏联”“保卫苏联”的口号，我是能够理解的。

翻查薛范先生编的《苏联歌曲珍品集(1917~1991)》(中国电影出版社)，它的中文歌词是姜椿芳译，吕骥配歌：

[齐唱]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以下每节后唱，直到曲终）

[独唱] 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疆，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原译“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各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像那伏尔加直泻奔流。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我们田野你再不能辨认，我们城市你再记不清。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这个称呼无论谁都熟悉，凭着它就彼此更亲密。

春风荡漾在广大的地面，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活。世上再也没有别的人民，更比我们能够欢笑；如果敌人要来毁灭我们，我们就要起来抵抗。我们爱护祖国有如情人，我们孝顺祖国像母亲。

书中对这支歌曲的背景作了详尽的介绍：这是音乐故事片《大马戏团》的主题歌。影片叙述一个美国马戏团女演员，由于生了黑孩子而遭到迫害，最后在苏联受到尊重并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从1934年开拍，1936年基本完成，但总觉最后缺少一首有份量的歌。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花了半年时间，共写了36稿，他后来回忆说：“《祖国进行曲》是先写出曲谱，而后由列别杰夫-库马契填上词的。……我坐在钢琴前，左右

是亚历山大罗夫(影片导演)和列别杰夫-库马契。旋律出现后,大家同声高唱,欢庆成功。列别杰夫-库马契被音乐所触发,立即写出副歌的歌词,开头一句是‘我们祖国美好’;我对他说,音乐的宽广气息要求的不是美好,而是‘辽阔’。大家就这样定稿了。”于是在影片结尾,美国女演员抱着自己的黑孩子同苏联人一起高唱着这首歌走过五一节的红场:“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1936年5月25日,影片首映的当天晚上,电台就播放了这首歌曲,很快便传遍苏联全国。同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鉴于发展电影艺术中的贡献以及一系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的苏联歌曲”,授予这一对作曲作词的搭档以劳动红旗勋章。后来,《大马戏团》一片的电影音乐和歌曲又于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我们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定时播放的,也是这首歌第一句的旋律。

可见这首歌作为苏维埃国家颂歌的地位,无论是以进行曲风演唱,或放慢成为抒情的颂歌,那旋律所展现的宽广曲境,显示了泱泱大国之风和乐观坚定的情绪;歌词与曲调也达到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的程度。

我们见过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颂歌,曲调平庸乏味,歌词苍白凑数,一听就知道是所谓“完成任务”的,而作者对这“任务”并无感情。《祖国进行曲》则不然,其中有作曲家和诗人的激情。从正面看,我们可以想见,此曲作成于1936年,作为社会主义建成标志的《斯大林宪法》就在本年公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胜利完成,而莫斯科审判和大规模的镇压要到1937年才开始,人们在这时因国力的增强而产生某种欢乐和自豪,以及“自由呼吸”之感,在歌



曲中得到了反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说革命初期的混乱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残酷的“反托(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党联盟)斗争”也已是上一个十年的事，然而，1930年代初强行农业集体化造成大迁徙、大饥馑，在富饶的粮仓乌克兰等地也饿死许多人的事，歌曲作者知道不知道？这是今天的俄罗斯读者和中国读者都会提出的问题，但这是别人难以代为回答的了。总之，从历史真实的高度来要求，这首颂歌尽管有相当的艺术性，也不能掩盖它在总体上属于粉饰以至伪造历史的序列。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些曾经喜爱这首歌的中国读者，在更多地了解了苏联解密的历史以后，不能不面对的尴尬局面。有一位老杂文家甚至说，那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是只有当年的“克格勃”才能这样唱的。可慨也已。

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也译作库马赤)(1898~1949)，中国没有出版过他的诗集，我看到的多是歌词。在这本《苏联歌曲珍品集》里，还收了他好几首。1934年写的《快乐的人们》(同名影片插曲)，1936年写的《快乐的风》(影片《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插曲)，以至1938年写的《青年歌》、《伏尔加之歌》(影片《伏尔加——伏尔加》插曲)，都是与作曲家、列宁格勒音乐宫音乐指导杜纳耶夫斯基合作的。这几首歌曲也都跟《祖国进行曲》的风格一样，欢乐昂扬，是为青年人写、让青年人唱的。《快乐的风》中格言式的警句“要争取才能得着，只有寻求才能找到”(另译：“谁有愿望——谁就能达到；谁去寻找，——一定能找到!”)，在传唱中给人以鼓舞。

在战前的1939年，他还为影片《水兵们》写过插曲《海鸥》；而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后，列别杰

夫-库马契立即写下了悲愤的诗篇：“起来，巨大的国家，作决死的斗争……”24日在《消息报》和《红星报》同时发表，当天就由苏军红旗歌舞团负责人老亚历山大罗夫谱曲，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第一首歌曲。我在丘琴先生译的苏联诗选中还读到一首库马契写于1943年的《只要我们的心不老》，不知可曾谱曲否？

由此我想到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1900~1974），他的诗有大量谱曲传唱，有不少是直接为电影作的。如《红莓花儿开》、《你从前这样》，就都是为影片《库班哥萨克》（中译《幸福的生活》）作的，作曲家也正是那位杜纳耶夫斯基。这部影片摄成于1949年，据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说，此片和《攻克柏林》一样，同为斯大林晚年看而不厌的影片。《攻克柏林》中有斯大林飞临于柏林攻克之后，享尽片中群众的欢呼，其实历史上他并没有这一次柏林之行，也算是“革命浪漫主义”吧。《库班哥萨克》也是“革命浪漫主义”，当时苏联农业危机四伏，但片中却是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喜庆丰收。这两部影片成了粉饰现实、欺骗人民的典型。然而片中的歌曲照样流传，也许因为“红莓花儿开在野外小河旁，有位可爱的人儿使我日夜想……”，只是一个少女含羞的倾诉，“你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哥萨克你勇敢的鹰……”则唱出了夹带几分感伤的痴情，而这都与农业上的报喜不报忧没有直接的关系。伊萨柯夫斯基出身农民，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也许正是因此，他熟知农民的疾苦，他在自己农村题材的诗里，写风景，写爱情，而不去凑趣歌颂集体农庄。在这部影片里还有两首歌，一是《丰收之歌》，一是《歌唱幸福》。后者当时就没有唱开，至今湮没无闻，显然没有艺术生命力；前者我还记得，

那歌词一开头是：库班河上风光好，什么什么起浪涛，“快收割，快装上车，让我们快快收割完毕”，全无文采，但靠跳动的节奏还能撑起来，多少表现了农民在收割时或有的兴奋，算不算得上局部的真实？不记得这两首歌词是否也是伊萨柯夫斯基写的了，同广泛流传的两首相比，总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倘也出于伊萨柯夫斯基之手，就更使人感到悲哀。

在苏联，是直到1950年代，文学界以奥维奇金、田德里亚科夫为先驱，才开始正视农业落后和农民生活贫困的真实。赫鲁晓夫公开提出农业问题后，农村凋敝才逐渐不再成为文学写作的禁区。在这以前，那么多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多是图解政策，不管那政策给农民带来多少苦难，还一律唱赞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如此，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也是如此。潘菲洛夫还以整同行作家出名。在那谎言笼罩着一切的年代，要求文学参与制造谎言，写小说的人里，似乎只有萧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为什么他能逃脱“歪曲生活”的文网、“反苏维埃”的罪名呢？据蓝英年的文章说，《静静的顿河》里写到了红军阴暗面，这本是大忌，但恰恰因为顿河地区是托洛茨基所辖的战区，而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政敌，暴露他所部的阴暗面，乃可以免受追究了。

但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更深层的原因，待考。总之，我佩服萧洛霍夫的胆识。在1930年代大饥馑的时候，他且正受到当地某些党的干部的围攻陷害，而他竟一再写信给斯大林，反映群众生活和基层政权的真实情况。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我想他不会不掂量的。这就是萧洛霍夫的良知所在。他关注的已不是一个作家通常看成命根子的自家作品的命运，也不

是作为作家在党政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和由此带来的实惠，而是人民的痛苦；这证明他不止是落户故乡，身在农村，而且是心系农民，他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农民贵族”，他不会背叛人民，投靠权势。从萧洛霍夫，我又想到“咱们的老赵”——赵树理同志。过去只知道他在1958年后写过《锻炼锻炼》、《赖大嫂》等短篇，接着在1961年又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座谈会，这就以会上的发言和会外的作品，构成了围绕这一座谈会命名的“中间人物论”事件，此案后来与其他事件或案件一起，形成“文革”当中的“文艺黑线”文字狱。去年从《读书》杂志上看到陈徒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在那前后，赵树理还曾写信给中共中央，对农村中各种“左”的表现作了如实的反映，因而受到重点批判，这是与萧洛霍夫颇有类似之处的，而这也是在“文革”中遭受打击的口实之一，最后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不幸被活活整死，则又是他不同于萧洛霍夫之处了。

想想这些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因而冒死陈词的先例，那些只以假大空或高大全甚至“瞒和骗”求售的东西，应该占据什么应有的位置，还不明明白白吗？

1999年6月27日

## 《跋涉者的足迹》序

面前是一对俄文翻译家夫妇孙维韬、温家琦的书稿。

这是一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往事，一支苏联时代的挽歌。

维韬是 1950 年 10 月提前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走上空军工作岗位的。后来有 10 年时间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身边做俄语译员。因此，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在莫斯科、西伯利亚和远东，他不但会见过苏联的空军英雄，接触过苏联的将帅，也熟悉许多苏联专家和普通工作人员，他体验过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真诚的友好感情，他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紧张后不止一次“谈判桌上的较量”，“唇枪舌剑的交锋”。这是一个俄语译员眼中的中苏关系史。这个年轻的译员，不但参与过许多中苏两国间的国家级谈判和礼仪活动，还随同中国军事代表团，参加了 1956 年各国空军主帅云集的苏联航空节，和 1957 年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庆典。世事沧桑，看到他笔下融入自己感情的、亲耳聆听、直接目击的第一手材料，忽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觉。

这本书，不是中苏关系的编年史，而只是一个中国译员的亲历记，但它比正式的史书多了一些可贵的细节。不仅有例如刘亚楼这样有“儒将”风的高级将领的音容笑貌，也有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在外交场合与日常言行中的吐属；例如在苏联一次偶然谈起图哈切夫斯基，对于这位在二战前夕就以外国间谍的莫须有罪名处决，多年来鲜为人知几近湮没无闻的逝者，叶帅竟那么熟稔地缕述了他的历史功绩，连苏联军方的陪同人员也感到惊异：这是唯有亲闻瞥咳者才能有的传神之笔。

对于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作者也是既没有像过去的宣传那样，一边倒地说好话，也不是情绪化地笼统指责他们都是大国沙文主义骄横跋扈，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其中有些人的恶劣表现，同时对许多人寄予了友好的感情。对于前者，这位译员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顶撞过，还因此得到过刘亚楼的首肯；而在30年后的1991年，他重访俄罗斯，曾专程上基辅去拜会了在1955~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席顾问的比比可夫·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将军。此时的将军早已退役，且苏联亦不复存在，孙维韬更只是作为故人，他们的重逢，却是纪念曾有一段国家关系和工作关系沉淀在个人心中的盟友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政治，然而已经超越了现实政治。

在维韬和家琦合写的这本书里，无论前半部有关两国空军间合作关系的记述，还是后半部他们夫妇俩到俄罗斯旧地重游的见闻和感慨，都不隐蔽自己的是非好恶，直言不讳，这是我所十分看重的。以维韬和与他同样在空军中做译员的妻子的身份，在当时的工作中，虽然参与机要，但并不参与决策，对于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置喙之地，对自己在特定范围内所接近的中苏双方人员包括高级将帅，他们的看法只

能是个人的看法；从 1961 年离开莫斯科后，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直到 30 年后才得重来，此时此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业已瓦解，他们后来虽曾在俄罗斯又住了 5 年，但探讨苏东巨变、总结历史教训并不是他们的任务，因此他们也仍是在特定范围内同俄罗斯人有或深或浅的接触、或多或少的交往，他们的种种看法更是基于他们个人的感想。因此，我想，不必责之以“全面”和“深刻”，更不必强求以“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此中人语”，我认为他们的劳绩，就在于如实地写出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他们原始的真情实感。

在 1960 年代中苏公开论战，苏联撤退专家以后，直到中国国内的“文革”结束，这对于几乎所有的俄文翻译工作者，都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空白时段。然而我从维韬的著译年表看，他却并没有浪费光阴，而留下大量的作品和译品，更不用说到了 1980 年代，他在译著编审方面的发挥了。1950 年代初我就是他以“智涛”为笔名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诗篇的读者，对于他的博闻强记和勤奋刻苦，是佩服的，又是羡慕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纪念普希金诞生 200 周年的朗诵会上，邂逅贤伉俪，嘱我为他们的新书作序，浏览书稿后，谨写读后感如上。

1999 年 7 月 25 日

## 关于《人权宣言》

——为《青年小百科》作

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1789年), 全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它在理论上颠覆了神权和君权, 开辟了一个人权的时代。

这个《人权宣言》共十七条, 如果不能通篇背诵的话, 至少应该记住第一条所说的: “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宣言宣布主权在公民, 公民人人都有权直接或间接参加立法, 决定赋税, 担任公职, 并享有信教自由, 言论、著作和出版自由, 以及知情权, 等等。

这些, 可与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参看。后者认为人生来就赋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这两个宣言在人类历史上最初提出了普遍实现人权和公民权的纲领, 在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历史长途中, 是具有开创性的



重大里程碑。

《人权宣言》的第一条，逻辑上包含有政治民主以至社会民主的意义，第三条标举主权在民亦即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制止可能发生的非民主的权力之行使，更不要说滥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宣言》至少以第五条至第十一条的篇幅，阐述了“法律是公共意识(志)的表现”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和界限，立法和执法的原则，包括无罪推定，等等。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人权、民主和法治乃是互相依存的。人权和公民权要靠民主和法治来保障，而对人权和公民权的重视和尊重，又是民主和法治的前提。正如这一宣言的前言部分所说，“不知人权、忽视人权和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人权宣言》具有 18 世纪法国思想的特征，它提炼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学派、重农学派以及英国洛克的进步思想；例如来自伏尔泰的思想就是个人必须受到保护，使之免受警察的专横和司法机关的错判，等等。根据这些思想制定的原则，一般说来是对人类最为基本的，也是普遍适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权观念不断发展，人权内容也日益具体。

1945 年的《联合国宪章》，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继承了《人权宣言》的精神，系统地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并把人权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在《人权宣言》诞生将近 200 年时，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后开放供各国签署并于 1976 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重申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基本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籍、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原因而受到影响；在具体内容上较之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又有所发展，如从法律上禁止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任何鼓吹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的主张等。

我国政府在 1997 年、1998 年先后签署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还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生效，这两个公约的内容，却也是我们在学习《人权宣言》的同时，应该力求了解和熟悉的。

在新世纪，中国人要和全人类一起，实现人权、民主、法治的目标，推动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实践问题了。

1999 年 11 月 30 日

## 看大片有感

看大片《偷天陷阱》，先有一句台词，后来又出现在马来西亚银行保险柜的密码表上：“别用大炮打蚊子”！据说是孔夫子说的。

老年间读过“子曰诗云”的，都没见过中国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今天的小学生每天用20分钟背一段孔孟老庄语录，也会怀疑孔子说过这句大白话，那时候有大炮吗？

不过，用据说是孔子的话作密码，至少说明孔子在马来西亚是有影响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外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孔子不属第一也属第二。据统计，中国人的著作，在国外被人译介最久、出书最多的，也就是孔子、老子和李白几位了。

孔子没说过“别用大炮打蚊子”，但说过“割鸡焉用牛刀”，见《论语·阳货》，或许就是由此以讹传讹；好在意思差不多。

世界级的名人，人们除了知其名以外，也许只记住他一句两句名言，有的没走样，有的说不定还走样了。无心的误读，

有意的扭曲和删汰，更有时间的淘洗，人脑不是电脑，记忆所能储存毕竟也是有限的。所以，千古名人，人们往往确是只知道一个两字或三字的姓名，顶多再加上一句名言，一件逸事而已，这跟正式出版的《言行录》不同，什么言，什么行，取决于人们传说中的自发倾向，“典型”或“不典型”，全面还是片面，就管不得许多了。

岂止像孔子这样传到国外的，即使在国内，名人的命运也相仿。拿诗人说，最大多数国人知道屈原，是因为端午节吃粽子的传说；知道李白，是因为听说他是“酒仙”，卖酒的打出“太白遗风”的幌子；知道苏东坡，怕是从川菜到其他菜系都推出“东坡肘子”“东坡肉”，尽管口味各自不同。有多少人读过他们多少诗，就难说了，屈原赋高古，今天读书人常引用的不过其中几句；李白诗，只有“床前明月光”连小学生都会背，专家们却在争“举头望明月”还是“举头看明月”；苏东坡除了东坡肉，还留下杭州苏堤，念道了近千年，此外他不少诗文警句已是成语，但谁能经常记得“水落石出”是苏公头一个说的呢\*？

一个名人一辈子说的话，做的事，可谓多矣，然而不但当时，尤其是身后得以流传的，常常带有偶然性，尽管说必然寓于偶然之中。

晋大司马桓温平生事迹，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谁能数说清楚？但读过点书的，都知道他曾对老树发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叹，若是光留下这一句话，倒也还像个多愁善感的风雅之士，可稗史偏偏又记下一句他的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可就大大改变了桓大将军的形象。

今天的新闻人物不一定都能成为历史人物，但历史人物中

大多曾经是一时名流。你的正经言论，不用说后来人未必有时间看，同时代人忙于生计，又有几个能认真对待？倒是你不经意的片言只语，也许倒让人口口相传，铭刻在心。除了嘉言，还有懿行，你刻意而为，人们可惜并不在意，偶然写个白字，情绪激动失态，甚至下意识的什么个小动作，就被促狭鬼们抓住了。你干了一百件自认为好事，人们觉得那是应该的，你最怕人提的那一件半件亏心事，却成了世俗注意的焦点，茶余酒后的谈资，又怎么办呢？

名人的名言与名行，往往如此；你说，历史对名人究竟公平不公平？

一心想成名人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有备则无患；已经成为名人的，要以平常心对待这个规律，孔夫子之所难免者，谁能幸免？

1999年12月29日

\* 此文发表后，即承友人和读者指出“水落石出”一词的首创权应属欧阳修；苏轼写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已在欧阳先生之后了。

## 政治色彩

1999年12月23日莫斯科消息：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那时候他还没代行总统职权）在政府例会上说，俄拖欠的儿童补贴数额已经超过300万卢布，有些联邦主体拖欠达12个月。这已成为有关机构的当务之急。普京说，千万不要认为政府对这一问题漠不关心，这个问题“已不仅带有社会色彩，而是具有了政治色彩”。

普京讲政治。他从政治角度来看拖欠儿童补贴的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他担心公众会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那就会大大影响政府的公信：难道不是政治问题吗？

我不知道俄罗斯的儿童补贴是怎么回事，但无疑是关系儿童福利的政府拨款。这使我联想起我们这里的教师工资和农民负担。教师工资打白条，农民减负不兑现，我想，跟他们那里的拖欠儿童补贴有相似之处。我们的有关方面，可曾把这样的事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抓”？长久以来，是不是仅仅看作一个工作作风、工作效率问题——顶多

是“缺少群众观点”呢？

腐败问题明明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叫作“不正之风”，后来不得不指称“以权谋私”，直到现在，也还是顶多当作经济犯罪来看待。

淡化腐败问题的政治色彩，只能掩盖问题的实质，延缓问题的解决，但并不能消弥其负面的政治影响。

为什么会是这样？

长此以往，后果又将是怎样？

2000 年 3 月 7 日

## 回答和不回答

1999年12月11日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了保罗·罗伯逊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由美国男低音歌唱家凯文·梅诺演唱罗伯逊歌曲，加上电影和幻灯，反映罗伯逊的音乐、政治观点和生活。

对于有“黑人歌王”之誉的保罗·罗伯逊(1898~1976)，我素有好感，早在1949年夏听说他将应邀访华，我还写过一首小诗表示欢迎。然而他没有来。后来知道是受到杜鲁门政府的阻挠。罗伯逊终其一生，没有能来中国。这回听到的罗伯逊歌曲，既有我所熟悉的《老人河》等，更有其他一些劳动歌曲、蓝调、灵歌和教堂圣歌以及犹太民族歌曲。

不过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音乐方面的收获，而是说明书上译介的一段问答。是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期联邦调查局一次听证会的记录。从罗伯逊的话里，我得知了有一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指当事人在审讯中有权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

以下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阿兰先生(以下简称阿):你现在是共产党员吗?

罗伯逊先生(以下简称罗):噢,够了,够了,够了,别再问了。

谢莫先生(以下简称谢):请你回答好吗,罗伯逊先生?

罗:共产党是什么?你说共产党又是什么意思?

谢:我希望您要求证人回答问题。

罗:你说的共产党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共产党是与共和党、民主党一样的合法的政党。你指的是哪一个?是那个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党派,由那些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所有美国人和劳动者的尊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组成的政党?你指的是那个政党吗?

阿:你现在是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罗:你是不是想在我投票的时候,把我投的那张选票从投票箱里拿出来看一下?

阿:主席先生,我请求您命令证人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主席:您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罗:我拥护第五修正案。

谢: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罗:我拥护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阿:你是要行使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吗?

罗:对,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

阿:你是否已经明确,如果你如实告诉委员会你現在是不是一名……

罗：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要求行使第五修正案。我想要做什么与你们无关，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好了别再问了。

主席：但委员会要求你回答这个问题。

罗：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所以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答案。

阿：我建议主席先生命令证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否已向我们如实提供了一些可能会在刑事诉讼中对他本人不利的信息。

主席：我们要求您回答这个问题，罗伯逊先生。

罗：先生们，我去过很多地方，斯堪第纳维亚、英格兰等等。无论在哪儿，共产党员总是首先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献出生命。这并不是什么刑事行为，第五修正案也与刑事犯罪无关。最高法院大法官瓦伦先生在多次讲话中都已表明第五修正案与刑事犯罪无任何关系。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

从这一记录看，保罗·罗伯逊借助于上述第五修正案，拒绝了回答对他不利的提问。这使我想到，在过去不短的岁月中，例如“文革”期间，我们曾经不得不面对指供诱供式的各种提问；在众口一词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声中，完全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使不是处于天生的“被告”地位，而在所谓正常时期，也要面对诸多的表态要求，而没有不表态的自由；就是说，相对于发言权的不发言权，也是不存在的。而整人者除了可以无中生有地构陷人罪之外，还可以从你现成的自述、表态、检讨当中取其所需，“上纲上线”，鸡蛋里头

挑骨头，让你自己走进自己的“瓮”里去。

因这样的切身经历，我于这一“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格外有兴趣。据说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谈到斯大林在肃反中的暴政时，曾经说，这样的事情在英美等民主法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此见甚为中肯。

记得国内似也出版过罗伯逊的传记，其中当有有关章节；又，关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国内也应有相应的介绍：都会比音乐会的说明书所言更加确切，待找来一阅。

2000年3月7日

## 搞不懂啦，希特勒

德国两名历史学家年前出版一本新书披露，纳粹头子希特勒在他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年代，曾经用数以千万计的巨款，贿赂他麾下的将军，换取手下人对他的唯命是从。

这是从广州一家报纸的国际新闻中抄出来的。从前只知道无权的向有权的行贿，官小的向官大的行贿，这一回才发现希特勒如此的“不耻下贿”，比“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显得更务实，大约也更加立竿见影了。这倒真是一新耳目的新闻。

不过，作为一个并非少不更事的读者，看着这条新闻，总觉得有些搞不懂的地方，也许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或者径直说，是我以中国的为官之道去揣想希特勒的御下之方吧？

随手把这条新闻抄下，括弧里则是我的感想和疑问：来自“军事历史研究所”的乌贝茨尔和退休将军弗格尔，在名为《服从便能致富》的新书中，根据纳粹党留下的机密档案指出，希

特勒每年动用他总值 2000 万马克的私人秘密储备，收买他的得力助手，以保证他们对他忠心耿耿（这没什么不明白的，连凤姐都用她的私房钱收买平儿；只不知希特勒秘密私人储备的来源，多半也是“公款”。而“服从便能致富”，当然指的是服从希特勒，但那么多德国平民服从希特勒的结果，替他去打仗，化为炮灰，因对他服从而能得他财贿的，只是他的“得力助手”，也就是得力的帮凶而已）。

其中大部分的款项都落入 3000 名德意志第三帝国年代的元帅和将军手中，包括收取了 88 万马克的莱布将军，以及分别收取了 25 万马克的伦德施泰特将军、米尔希将军、克卢格将军和雷德将军（原以为只是“布施”给所谓身边的助手，没想到竟是三军将帅，且竟达 3000 名之多！消息却只点了这五位将军的名，是不是因为他们收受的数额最大？那么像他最核心的干将、最亲密的战友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等，难道所得倒少？戈林本是极富有的，戈培尔呢，是另有财源？要么就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不必用钱收买，还是在此项专款之外别有出账？）。

古德里安将军更获赠一幢位于西里西亚、总值高达 120 万马克的物业，而曼施泰恩元帅则妒忌古德里安得到的物业，于是要求希特勒同样给他一幢位于奥德河的物业（因为不可能 3000 将帅每人分配一套别墅，这可视为额外的恩宠有加，故引起别人的争宠。消息中语焉不详，那个曼施泰恩元帅怎么能像中国人要官那样开口向希特勒要物业呢？无乃太赤裸裸了乎？要么就是他同希特勒有不同寻常的“哥们儿”关系，否则岂不像绿林草寇分赃似的，希特勒的统帅部里会演出这样的闹剧吗？待考）。

希特勒通常会将贿款支票放入信封内,并在信封面上加印“德意志机密文件”字样,当生日礼物赠予部下(如果希特勒亲自动手,那也真够累的。“机密”不错,“文件”云乎哉)。希特勒1940年战胜法国后,露骨地说渴望下属完全受他支配。而他的参谋长恩格尔也引述希特勒当年的话表示,得到恩惠的将军会感激希特勒,对他马首是瞻(赠送生日礼物,例如生日蛋糕,现在中国连大一点的宾馆都视为常事了。希特勒不可能记得3000部下的生日,显然是由办事人员具体操作的。但得到最高统帅部送来的“文件红包”,虚实相生,还是会令受之者感激得很,从而更加俯首听命,希特勒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希特勒此举须得做得十分机密,不然3000将帅发现这份恩宠人人有份,自然也就不稀罕了。不过,窃以为,希特勒这番苦心,其实是多此一举,在纳粹体制内,你希特勒权倾天下,一个人说了算,你要让三军将帅听你的话,凭你的权力给他们加官晋爵就是,我们中国封建时代有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难道你们纳粹德国不是这样?武将也爱钱,给他官阶不就全有了吗?那么,比起你送红包来,一是“公事公办”,他照样领你的情,却不留痕迹,后代史家也就不会出来考证你的行贿;二来他们在其位捞其钱,万一失风,自负其责,一概与你无干。再说,找一两个不是对你唯命是从、甘受支配的家伙,杀鸡给猴看,哪个不变得噤若寒蝉,唯恭唯谨,令行禁止,敬若神明?何须你一反常态,婆婆妈妈地私送红包)。

拜读以上新闻,我想,如希特勒这么向自己的部下遍送贿礼,大不类他这个混世魔王之所为,或者说,替他着想,颇有一点跌份。难道一个如此专权的专制主义者,竟

奥斯维辛之后

不擅于用他手中的党政军权来辖制部下，使之从消极就范进而积极效命，倒还要乞灵于金钱的小恩小惠吗？搞不懂啦，希特勒！

2000年3月16日

## 看阿莲，说卖座

一部影片，没有时尚所趋的靓男倩女，没有情海爱河的缠绵悱恻，也没有警匪交战，飞车跳楼，光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中年妇女，在为受到污染毒害的老百姓奔走打官司，这样的片子能卖座吗？

美国华纳电影公司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影片《阿莲(埃琳)正传》(《永不妥协》)，情节就是这样简单。

而这部美国影片，获得了全美春季票房卖座的冠军！

埃琳·布洛克维奇，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失业单亲妈妈，银行里只有 47 美元存款，来一个小小的律师事务所打工，尽管同事们看不起这个没学历、没专长的外行，她却格外努力工作。她在整理案例资料时注意到一些验血报告，便花几个星期走访专家，四处调查，发现供水公司生产的饮用水含有超量的六号氯，使成百的家庭因饮水中毒，生了癌症和别的怪病，有个少女不得不切除了乳房和尿道；不仅如此，十几年来他们排放的工业污水，还一直污染着那个地区的地下水。



埃琳经过一再的曲折，终于得到律师事务所同事的理解，和老律师一起，跟拥有 280 亿美元总资产的供水公司打起官司。埃琳不但在污染的水道里采集水样，收集因污染死去的昆虫尸体作物证，她还要走访在痛苦和失望中灰了心的受害者，帮助他们恢复“讨回公道”的勇气。一个一个地动员，征集到几百个原告，她已经能够把 643 名受害人的姓名、年龄、家人、电话号码和发病细节一一记住，当庭作答。经过无数坎坷，通过法律程序，终于为全部受害人争得总金额 3.66 亿美元的赔偿，而那个公司最初在谈判中只提出赔偿 25 万美元！

在以埃琳为原型的这部影片里，只有普通又普通的一个中年打工妇女忘却了生活艰辛，“一心扑在”用法律武器维护公众权益的斗争上。既反映了供水公司只顾牟利而损害环境生态和人们健康，并企图销毁证据的违法犯罪行为，又反映了弱势群体在遭受侵权时的无奈无告，当然，它更反映了像女主角这样以不畏困苦、不怕威胁的坚强性格终于取胜——想一想，当她接到恐吓电话，让她“为三个孩子着想”，不要再搞调查的时候，这个单身母亲，顶着多大的压力呀！

这样的矛盾和斗争，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在中国卖座的影片中，类似的也有，像《秋菊打官司》。但是，不同的是，秋菊是为自己打官司，艾琳是为别人打官司，且整个过程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显得比较沉闷枯燥。如果中国今天拍了这样的影片，能卖座吗？

也许有人说，这是女主角领衔主演朱莉亚·罗伯茨，亦即主演了《诺丁山》的那位当红女明星“人气”好，如同当年主演《秋菊打官司》的巩俐；然而在这部影片里，没有给她提供多少展示“最灿烂笑容”的机会，我们看到的，只是她以一个职业

妇女加单身母亲,竟将三个孩子托付别人,辗转于废料处理井、污水水道和成百个遭灾受难的家庭之间。把这部片子的卖座解释为追星,不一定能说到“点”上。

这样的影片能够在美国卖座,成为春季全美票房之冠,让我对美国广大电影观众刮目相看。我以为这标志着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素质——包括他们对环境保护和司法公正的关心,他们懂得这都是需要不疲倦地斗争的。

一部片子能不能拍好,能不能卖座,取决于影片的全部创作和诸多外部条件,最终离不开观众这个重要方面。影片和观众的关系,也是双向选择的。如果估计不能吸引相当的观众,哪个制片人肯投资拍摄?

我这样说,没有贬低中国观众素质的意思。如果这部影片在我国公映,不妨听听观众的反映,也可以从卖座不卖座来作一次验证。

2000年5月20日

## 也谈格瓦拉

古巴革命中仅次于卡斯特罗的二号人物，曾经以其放弃执政地位出走后的神秘经历，吸引过一代向往世界革命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里跑到周边国家如缅甸打游击的北京红卫兵，身上多半就有格瓦拉的影响。

听说最近在一个小剧场演出中国人自编的有关格瓦拉的话剧，围绕这次演出也颇有些网上的议论，当然是对格瓦拉不胜神往，呼唤“魂兮归来”的。我没有看这个戏，也没有上网，只是听说，不宜插嘴。

读了张辛欣一篇《别了格瓦拉》的随笔，知道美国有一本关于格瓦拉的传记近作《一个革命者的生涯》，“展示这个人理想主义的激情，也展示这个人的‘冷酷的心’。作为古巴革命委员会4个最高领导之一，他对判处55人死刑有直接责任。他惩罚懒散工人的方法是，把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去。”我想今天那些心仪格瓦拉的人，一定也会为他的“冷酷”作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打仗哪能没有

伤亡？在对敌斗争中难免误伤自己人，子弹不长眼睛嘛，活着是为革命作贡献，死了更是为革命而光荣牺牲嘛！

记得在 1950 年代~1960 年代，即苏联结束斯大林时期以后，意识形态宣传独尊列宁，在文艺领域也出版了不少关于列宁的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像《列宁的故事》、《蓝色的笔记本》(?) 等等，却已不是正面表现列宁的革命活动和专政铁腕，而是从一些侧面抒写列宁在日常生活中、在同普通人的交往中的人情味，俨然一个慈祥 and 善溢于言表的老祖父，再不是目光炯炯高度警觉随时准备捕获猎物的“山鹰”了。就为这个，当时中国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文艺方面的内容之一，就是指责他们歪曲列宁形象。

今天看来，这也算不得什么歪曲。人是多层面的复合体，像列宁这样的“伟人”，性格更不可能像天真烂漫的儿童那么单纯。在阶级斗争中“横眉冷对千夫指”，在革命营垒内部“俯首甘为孺子牛”，难道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格瓦拉来过中国，曾经留下了一张照片：远远的，戴着贝雷帽的格瓦拉少校，手牵着一个中国小孩，冲一个方向跑去。那小孩到今天应该也有 40 来岁了。但近年未见什么地方重发这张照片，其实这无损于格瓦拉作为一个世界革命力行者的形象。不是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都愿意拍摄“与孩子们在一起”以示“亲民”的照片吗？1940 年代莫斯科版的《斯大林传略》，插页就有斯大林在红场上抱着献花小女孩的照片，当时给人的印象，这个笑容可掬的苏联大元帅，并不像国际反苏反共势力宣传的那样，铁石心肠，手上沾满鲜血吧？

除了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期以外，一般心态正常的人，都乐于欣赏手执橄榄枝而不是手持大棒的

人，对于具有“革命的两手”者，人们也乐于接受他“软”的一手，而对那“硬”的一手，却是敬而远之，心存戒惧的。这就是为什么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要加大笔墨写有关保尔爱情的“软性”的一面。这一来，不但怀旧的老同志成了热心观众，有些年轻人也能接受。问一个少女的观后感，她由衷的反应是：“保尔真‘酷’！”

不同于张辛欣的《别了格瓦拉》，今天表示欣赏格瓦拉的老少爷儿们，恐怕也未必会走上格瓦拉式的征途，或者去参加什么恐怖活动了；在啧啧称赞之余，有人当会重温往年“身在茅屋，心怀天下”的旧梦，有人则会叹曰：“格瓦拉真‘酷’！”

2000年5月23日

## 不安的灵魂归宿何处

——读高莽《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

高莽的这本书，同蓝英年的《寻墓者说》，都主要写了俄苏文艺界的一些“旧人旧事”。不同之处，蓝英年是虚写其“墓”，高莽则大多是曾亲去墓前凭吊祭扫，在文边配了这些墓前纪念碑、雕塑像的照片。

高莽把他的书题名《灵魂的归宿》，然而我以为，他写到的许多死于非命或受尽苦难的不安的灵魂，生不安枕，死不瞑目，“应有未招魂”，怕未必能算在公墓一角就找到了归宿。

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年轻时丈夫就遭镇压，后来本人又被日丹诺夫点名批判，坎坷终身。她的土坟上覆盖着石片，坟前有一堵石块垒成的墙，据说象征着监狱，坟头上竖着黑色铁铸的巨大十字架。高莽说他面对这苦难铸成的十字架陷入沉思：“她来到世间，接受了苦难，又背负着苦难而去。她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她是妻子中最可怜的妻子。”高莽说：“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

“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这句话也适用于这本书里写到

的大部分墓主。

书中涉及的 22 位文学家，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高莽还写到了 15 位艺术家，5 位汉学家，8 位其他各界人士。

如在上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齐名的大导演梅耶荷德（1874~1940）。他提倡现代艺术，追求创新，深得国内外一部分舞台艺术家钦佩，但为苏联当局所不容。下面是高莽为他和他的妻子、话剧演员赖赫（1894~1939）开的一份时间表：

1937 年 12 月 17 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出《异己的戏剧》一文，辱骂梅耶荷德的艺术探索。20 天以后，1938 年 1 月 7 日，苏联政府艺术事业委员会通过决议：查封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国家剧院。那一天，赖赫在舞台上第 725 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茶花女》中的主角玛格丽特。她在梅耶荷德剧院工作 13 年，创造了十几个使人铭记在心的角色。

1938 年 6 月 20 日，梅耶荷德出差到列宁格勒，突然被捕。同一天，他在莫斯科的寓所遭到搜查。赖赫在搜查证明上签了字，同时附了一句：搜查人员“蛮横无理”。

24 天以后，7 月 14 日凌晨 1 时，赖赫在家中遭人杀害，身上留下 17 处伤口。寓中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当局通知赖赫的子女：48 小时之内腾出寓所。搬进去的是贝利亚的司机和贝利亚手下的一名女郎。1940 年 2 月 2 日，根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的批示，梅耶荷德被处决。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是贝利亚们的乐园。而像梅耶荷德夫妇这样的遭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竟是千百万正直敬业有思想有个性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专制主义的极权统治是一切思想者、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天敌，是人

类进步的天敌。

高莽写到的汉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维克托·彼得罗夫（1929~1987），对中国十分友好，他研究鲁迅、瞿秋白、巴金、老舍、郁达夫……著述等身，受同行们尊重，受同学们爱戴，但一直是大学里没有任何职称的老师。原来，1950年代初，他在大学读书时便爱上了艾青的诗，他的学位论文选题为《论艾青》。为此，他对艾青的诗歌创作及生平事迹作了全面研究。谁料在准备论文答辩时，校方忽然通知他，艾青在中国被宣布为一个“反党小集团”成员，因此要求他改换题目。彼得罗夫经过一番思考，决意不改。他向校方表示：我可以不要学位，但我不能背叛学术良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事隔20多年后，高莽与他重逢，听说他身体不好，关心地问他病情，他没细说，却殷殷打听中国老一辈作家在“文革”后的情况，特别是艾青。

可惜彼得罗夫已经在1987年，以59岁过早地逝世，然而他不肯违背自己良心，不惜牺牲“功名”的士节，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高莽书里还介绍了风格不俗、很有特色的赫鲁晓夫墓。那墓碑由黑白两色花岗石交叉组合，两者中间托着完全写实主义的赫鲁晓夫头像。这一墓碑的设计者是著名的现代派雕刻家涅伊兹韦斯内。在这位雕刻家和赫鲁晓夫之间还有一段“官司”。1962年，赫鲁晓夫率领党政领导全班人马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30周年的画展，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其主要作者是涅伊兹韦斯内），就以粗野的话训斥他，而他也毫不示弱，跟这个大人物顶撞。赫鲁晓夫骂他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涅伊兹韦斯内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



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想和文艺界缓和关系，邀请挨过他批评的文艺界人士到家中作客。他三次邀请涅伊兹韦斯内，涅伊兹韦斯内都没有去。

赫鲁晓夫去世后，赫鲁晓夫的儿子找到涅伊兹韦斯内，请他为父亲设计墓碑。雕刻家表示同意，但提出条件：按他自己的想法做，别人不得干涉。他后来才知道，请他设计墓碑是赫鲁晓夫的意愿。按照赫鲁晓夫的遗嘱，请涅伊兹韦斯内设计的墓碑，最后成为一件吸引广泛注意的作品。墓碑的构图费人疑猜，诱人思考，而雕刻家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也给人以深长的启发。

2000年7月25日

## 老皮真逗

我对政治人物从不称“老”称“公”，何况是毫不相干的外国人，更何况是皮诺切特这样有血债的“智利前领导人”。

这回破例，但不称皮老，而称老皮，不是为示亲切，从俗简化而已。

此人政绩即劣迹众所周知。在英国被押，一副老病缠身快死的模样，竟弄到了病情证明，得以逃脱解往西班牙受审的危机，飞回智利。一下飞机就扔掉轮椅，不再装病，可谓得意忘形矣。

智利高等法院现已作出剥夺皮诺切特终身参议员豁免权的裁决。据说“皮诺切特在不得不面临起诉和审判的情况下，一改往日深居简出的做法，频繁露面，意在尽量争取民心”。

玩出什么新花样？9月4日，他在妻子陪同下，在首都圣地亚哥由他的孙女宣读了一份告白书，呼吁“全体智利人民团结起来，忘记过去，放眼未来”云云。

老政客不忘打官腔，叫人们“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

么，不是清算他的祸国殃民的旧债，而是“忘记过去”，一笔勾销。

好一个如意算盘。你说逗不逗？天津话说：眼不眼？

谁最爱听“忘记过去”这句话？老皮若起草倡议“忘记过去”的宣言，征集签名，苏哈托准会头一个联署，敝国那些已经落网的和逍遥法外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刑事犯都会乐于大力声援，为“忘记过去”运动推波助澜。

2000年9月30日

## 不仅是美国的事情

我在《回答和不回答》一文中，提到歌王保罗·罗伯逊在抵制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非美活动”调查时，曾经以《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为武器。我在文末说待找美国《宪法》有关的材料看一看。

此文在《随笔》刊出后，许良英老人就来电话说，他那里有相关的中文资料。后来他在溽暑中复印了三件寄我：一是美国 1791 年《宪法修正案》(一称《权利法案》)原文；二是它的中译本(《美国的历史文献》，赵一凡编，三联书店，1989 年版)；三是爱因斯坦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 48 页有对《权利法案 1791》背景和性质的说明：

合众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充满着争执和反复的平衡。作为革命理想和实际利益的矛盾产物，它以其开放兼顾、

自相克制的特征被专家们称为“一堆妥协的结果”。

宪法草案完成之后，对它最大的意见是其中缺少权利法案部分。在此问题上，宪法起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汉密尔顿与要求修改宪法草案的杰弗逊等人争执难下，很快导致了国内政治派别的形成，并影响到宪法的最终通过。

由于美国人民普遍重视“人民主权”，并希望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他们斗争得来的基本人权，当时的众议院领袖詹姆斯·麦迪逊相应地提出了修正案，首届国会通过了其中的十二条，各州最终批准了十条，于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生效，成为宪法的头一批修正案，即人权法案。

权利法案的基本意图是扼制中央政权的强大趋势，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所不能做的事情（各州的人权法案也有类似的限制性质），同时突出民众与个人权益的不可侵犯。

罗伯逊一再提到的那一条宪法修正案全文如下：

**第五条修正案** 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刑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唯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列；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这个第五条实际上包括了好几款，罗伯逊引用的只是其中一款，以拒绝就任何有可能使自己被判罪的问题作证。法律文本的特点是只能引用原文，不能用另外的言语复述。而我想，如果这一条付诸实行，则我们所熟悉的私设公堂、私刑拷打、指供诱供、逼供信、抢抄抓以至非法致人死命等等，就都不仅是一般的违法，而是违宪的行为了。

在十条修正案中，还有几条读来倍感亲切。

**第一条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第四条修正案**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产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第九条修正案** 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轻视人民所拥有的其它权利。

还是回到第五条修正案的话题上来。

爱因斯坦 1953 年 5 月 16 日给威廉·弗劳恩格拉斯的信，当年 6 月 12 日刊于《纽约时报》时，曾根据受信人的要求，将有关“第五条修正案”这些字样删掉。原信全文收入了《爱因

斯坦论和平》一书。

弗劳恩格拉斯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教师，那时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要审问他的政治信仰、所参加的秘密的和政治性的团体等)，于是写信给爱因斯坦，请教他该怎样对待这件事。爱因斯坦写这封信作答，他提出不能停留在以第五条修正案为武器，而应从保卫公民权利和《宪法》精神这一高度来拒绝作证。

爱因斯坦在信中说：

我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反动政客在公众眼前幌着一种外来的危险，借此来引起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伙人是得逞了，现在开始来禁止教学自由，对于一切不肯证明自己是顺从的人，就剥夺他们的职位，也就是说要饿死他们。

为了反对这种罪恶，只居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呢？老实说，我看只有照他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方法去办。每一个受到委员会(按：指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

但这种拒绝作证的依据，不应当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种遁词，即援引《第五条修正案》以免自己可能受到牵连；而所依据的应当是这样的主张：无辜的公民屈服于这种审问是可耻的，而这种审问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下决心采取这种严肃的步骤，他们就会得到胜利。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当得到的，绝不会比那

个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好多少。

爱因斯坦这封高屋建瓴正气凛然的回信公开发表，当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美国正直知识分子反对麦卡锡主义法西斯迫害的战斗号角。那个在上世纪50年代初掀起恐苏、恐共歇斯底里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的美参议员麦卡锡，气急败坏地骂爱因斯坦是“美国的敌人”，有个极右的退伍军人组织骂爱因斯坦是“颠覆分子”。不过，一年多以后，麦卡锡就气数尽了，1954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谴责他“违反参议院传统”。这是许良英老人来信中告诉我的，爱因斯坦的这封信，也是他1963年在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翻译的。其时，他已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他在劳动之余翻译的《爱因斯坦论文集》终于在1979年得以出版。

许良英在信中还告诉我，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已被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吸收，作为该公约第十四条之二（庚）款：“凡受刑事控告者”，“不得被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见《中国人权百科全书》，第792~79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我知道这个公约，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正式签署，不过尚未经全国人大讨论批准。

原来以为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是美国的事情。现在看来，已经不仅是美国的事情了。

2000年10月4日



## 历史的感叹

赫鲁晓夫是 1971 年 9 月 11 日去世的。8 月下旬，他会见了诗人叶甫图申柯。

据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叶甫图申柯讲起了不久前周游全国的见闻。最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当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镇压规模全然不知。他说，他在贝加尔湖会见工人、知识分子，并谈起了斯大林的镇压。对于当时有多少人遇难的问题，有人回答是 2000 来人，有人纠正说不止这个数，是 2 万来人。可见，他们连当时的大致情况都不了解！

赫鲁晓夫 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列举斯大林几次大镇压中违反法律滥杀滥捕的若干案例。会后平反了相当部分冤假错案。这就是人们说的“解冻”。然而因国际国内以及党内斗争形势的变化，还有赫鲁晓夫本人所受意识形态体系的局限，在“解冻”的几年中也时有春寒袭来。单是在苏联文艺界，像赫鲁晓夫和叶甫图申柯谈起的双方都难以忘怀的 1960 年代，当时赫鲁晓

夫“讲过许多措辞尖锐而并不公正的话，使得他同真诚支持他事业的文学家、画家、电影艺术家分离开来。他对叶甫图申柯说，他为自己当初对艺术界年轻人所说的那些尖刻话而深感内疚。”

从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罢黜了赫鲁晓夫以后，直到1980年代初，苏联进入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方面停滞了，甚至倒退了，言论、出版控制加紧，尽量堵塞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真相认知的途径，让青年一代懵懂无知才好。

叶甫图申柯在1970年代初的感叹正是如此。

然而，过了不到20年，苏维埃政权和苏共党一夜之间解体，以自身的宣告破产，使历史的旧账一笔勾销。这就更加令人感叹。

勃列日涅夫不想让青年一代了解历史，了解斯大林镇压的全面情况，不能仅仅认为是思想僵化，自己僵化也教人僵化，或者为僵化而僵化；而是由于他要打斯大林的旗帜，只有打斯大林的旗帜才能为自己的一套做法找到辩护的依据，要打斯大林的旗帜，就得美化他，对他的暴行遮遮掩掩。这就是他为了继承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必得遵循的行径，必得采取的姿态，必得付出的代价。

在某种意义上勃列日涅夫是个庸人，他既代表了反对赫鲁晓夫“打破坚冰”路线的保守势力，他就不得不反赫鲁晓夫之道而行之。在他执政期间，把赫鲁晓夫曾经为苏维埃政权和苏共党赢得的一线转机堵死了，扼杀了，不可挽回地输光了，而为几年以后的彻底瓦解埋下伏线。

1989~1991年事变以后，为已经消失的苏联和苏共党唱挽

歌的人里面，有几个是1970年代初对斯大林镇压不甚了了的青年？

可见，一个党一个政权，向青年一代掩盖自己历史上的阴暗面，并不能避免自己的危亡。

1970年代初诗人叶甫图申柯见到的那些“当代青年”，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斯大林镇压的实况了解不多，但后来的二三十年间未必不会增进了解；官方封锁真相，却还有民间渠道，官方只是限于教科书和新闻出版，民间渠道却是口碑千万，无法一一审查，甚至难免在如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这恐怕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始料不及的。

1970年代的青年之后，更年轻的一代在苏联易帜前后正是最活跃的社会力量。他们也许仍然是对斯大林暴政知之不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苏联体制的颠覆者。他们的出发点，应该已不是上几代人从斯大林时代积累下来的宿怨，而是对现体制的反弹，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可见那种以为只要掩盖了斯大林大镇压的真相，不让人们知道暴行的规模，使大家安于一片光明的历史叙述，就可以维护苏联的长治久安的想法，其实只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自慰犹可，要长久地欺人则是徒劳的。

何况，使叶甫图申柯吃惊的，是当时那一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镇压规模全然无知”，这当然令人遗憾，就如中国人不知道整个抗日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或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人数等等；但从一个普通人的感情来说，一个案例就足以决定爱憎的态度和是非的立场。这一点，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宣传教育影响下的中国人，是有深刻经验的：在内战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战前动员中，一出秧歌剧《白毛女》，一个黄世仁欺压民女

的恶行，就激发起万千战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昂扬斗志，是并不需要了解全国恶霸地主以至整个国民党政权欺压民女以至迫害百姓的“规模”的。

假如勃列日涅夫之流能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那样，把历史真相逐步告诉人民，与人民一起面对历史，总结经验，对症下药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也许事情的进程会是另一样，至少勃列日涅夫不会落下拖历史后腿的千古骂名吧。

但历史不承认“假如”。这也是历史之所以常不免让人感叹了。

2000年11月15日

## 拟外国故事

朱学勤先生《书斋里的革命》一书中说，他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看到德国新教牧师马丁的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流行模仿国外笔墨，我也来效一下颦，如下：

有一个中国人，1950年代初对高校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他想“我不是教授讲师，没我的事”；批俞平伯，他想“我跟《红楼梦》不沾边，没我的事”；反胡风，他想“我不是胡风分子，没我的事”；内部肃反，他想“我历史清楚，没我的事”；反右派了，他跟着起劲，想“我只要跟着党狠批右派，就没我的事”；反右倾时，他想“我不是党员，没我的事”；大跃进时反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想“只要随

大溜，顺情说好话，没我的事”；四清运动整社队干部，他想“我不是四不清干部，没我的事”……到1965年批《海瑞罢官》时，他还想“我连这出戏都没看过，没我的事”，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他发现自己陷在漩涡之中，往四外看去，已经没有“没事”的人了。

2001年2月5日

## 何以讳言“统治”

在流行的语言体系里，“统治”一词总是经常和“反动”联系起来，好像一说统治就是“反动统治”；因此在自我表述的时候往往讳言统治。似乎中国只有在半个世纪前是国民党“统治”着，再往前一点是新老军阀们“统治”着，而辛亥革命前的几千年里是历代帝王“统治”着，这都不错；然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以后，在中国大陆上“谁主沉浮”，谁是当仁不让的“统治阶级”、“统治者”，实现着自己的“统治”，则对不住，含糊其词了。其实，这样讳言统治的结果，是模糊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性质，是颇不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的。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不但不讳言统治，而且光明正大地声称“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经由革

命成为“统治阶级”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什么是国家？“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说得毫不含糊。

大家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了《国家与革命》，这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尔后共产党执政的国度，不仅作为一种国家学说，而且具有了行动纲领的意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提法，“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那么，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就意味着组织成为国家即有组织的暴力（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实质，也就是通称的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1937年写作的《矛盾论》中，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即所谓同一性时，就曾举例说，“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后来的权威表述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十分明确地继承了马列的国家学说,在他这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成为统治阶级以后,“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拥有有组织的暴力的阶级统治;这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后来的宣传中避免以“统治”和“统治阶级”来指称工人阶级(据解释是指执政以后的无产阶级),而笼统代之以“领导”和“领导阶级”,不知当时有没有什么内部通知,或只是范文率先示范,于是约定俗成。1949年6月,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暂代“无产阶级专政”之说,可能碍于新政协筹委会刚刚开过,声明要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不好一下子揭橥“无产阶级专政”;而以“领导”代“统治”之说,或也出于一时的策略考虑?按毛泽东一贯的说法,只有在接受领导者那里才谈得到领导权,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自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所判明的“人民”范围内的阶级、集团和个人自然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由于在所谓“人民”内部或政权内部还有“落后”的部分,因此党也还有在人民内部、在政权内部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的任务,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原则的逻辑依据。

然而有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为什么还要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条呢?因为前者不能完全涵盖后者,更不能代替后者。

无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的领导是互相依存的。毛泽东认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如果讳言统治，如果模糊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性质，模糊了它作为统治阶级手中的暴力这一特点，不是无异于把共产党的领导解除了武装吗？

查一查 1996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修订本)》，〔统治〕一条，释为“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或地区：~阶级|血腥~|封建~”，还是更多地用于负面意义；〔统治阶级〕一条，释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有时特指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这个“有时特指”反映了相当时期以来的一种语言习惯。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昨天的无产者，今天（经过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在宣传中强调自己的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就是要通过国家即有组织的暴力实行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呢？为什么在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好像不那么理直气壮？这算不算党的宣传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2001 年 2 月 19 日

## 三月五日

1953年3月5日，是苏共中央发布公告，宣布斯大林逝世的日子。

北京和莫斯科虽有五六小时的时差，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仍然赶在当天下午播出这一消息。

播音员是曾在西北大学学习俄语，1949年以来每年10月1日都上天安门现场转播庆典实况的男声播音员齐越。当他沉痛地读出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千万听众潸然泪下。

这固然由于他一字一泪强忍悲哽的声音的感染力，更多地得力于三四年来的强化进行的“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等的中苏友好宣传。

这种宣传是全面的。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萧军说有“各色帝国主义”的“反苏”文章。随后这家报纸副刊上关于苏联的内容一直占着极大的篇幅，除了介绍抗日战争初期苏联空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事迹，纪念库里申科大队长等牺牲的英烈以外，译介了不少苏联报刊

上的文章，包括《共青团真理报》有关“什么是英雄行为”的讨论等，以苏联的实例对中国读者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当时频繁出现的译者名字有乌兰汗、桴鸣等。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提出在国际斗争中向苏联“一边倒”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建立。毛泽东在文告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据说苏联并不是第一个来电作出积极反应的，但中国新政府还是第一个同苏联缔交。国外来访的第一个文化代表团，是以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西蒙诺夫还应邀留下来，参与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的制作。

接着，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率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于苏联于中国，都是一件大事。转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期限30年。然后毛泽东才回国。

在这期间，国内报刊上当然充盈着有关斯大林，有关苏联，有关中苏友好的诗文图片。在全国城市普遍建立的中苏友好协会，遍及机关、工厂、学校，已经拥有了千百万元的会员，每个会员发给会员证，按月缴纳会费。

苏联影片在中国成为热门，首先是卫国战争题材的，如《青年近卫军》、《丹娘》，也有各加盟共和国的，如《玛丽特传》、《那伏伊》等，那时国内还没搞华语对白片，由苏联译制成华语的，多半带着浓重的大连口音。

东北新华书店近水楼台，出版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译本；

而上海当时还有不少民办的出版社，也纷纷译介苏联小说，我看到的第一本，似是叶志美译《萨根的春天》，为一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作家原著；接着有曹苏龄译《旅伴》，好像是潘诺娃著，还曾在《人民日报》连载。这固然反映了上海这个商业大城市出版者们灵活的生意眼，也反映了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苏联历史和现实的需要，还有译者们可以理解的政治热情。这种出版苏联以至俄罗斯文学译本的势头，直到1956年初出版业都实行公私合营，始终未减，可以说极一时之盛。

1950年朝鲜战争发生，中国派出军队参战。国内大张旗鼓地展开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在知识分子中批判亲美、恐美倾向，树立仇美、蔑美思想，到欧美所谓西方世界留过学的人文学者、科学家，更要就自己政治思想以至学术思想所受的资产阶级影响，作出检讨，交代海外关系，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是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初期的重要内容。在学术问题上也要“一边倒”，因为没有超阶级的学术。一般人看电影《米丘林》，知有米丘林苹果也就罢了；生物学界和农业科学界的朋友，却要表态服膺李森科，因为李森科在学术斗争中的优势地位是由斯大林肯定的。

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审的，以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本流行于中国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就被毛泽东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教材；不但其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陈述和评价成为唯一的合法版本，而且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点的归纳，也成了不可游离的纲领和经典。1949年以后大中学的政治课悉以此为依归。

而在职干部的“干部必读”课，在1950~1953年，依次

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联共党史》。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学习》是理论学习辅导刊物，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无非是以列斯“注”马恩，或以马恩“注”列斯罢。

这说的是正课，已经让人装了满脑子斯大林的英明伟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乃不世之天才。其间，还穿插了斯大林随时发表的新作，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逝世前不久，1952年秋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在正课之外，电影和歌曲是最深入人心了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9》、《宣誓》，无不树立了斯大林作为列宁亲密战友领导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形象；《区委书记》让我们看到斯大林一个《胜利冲昏头脑》的讲话，立即纠正了农业集体化中的严重偏向；《西伯利亚交响乐》虽从批判音乐家萧斯塔斯科维奇取材，展示的却是在斯大林关怀之下音乐天才的发挥……更不用说斯大林本人最喜爱的影片，《攻克柏林》中斯大林在胜利之日忽然飞临柏林，历史上没有的事，但万民欢腾，仰首翘望；《库班哥萨克》(中译《幸福的生活》)，麦田如海，喜庆丰收，集体农庄生产生活形势一片大好，一曲《红梅花儿开》，男欢女爱，恍如伊甸园，这都是斯大林赐予的幸福啊。

这样日常的意识形态宣传，还觉不够，在1952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35周年前后，全国进行了一次“中苏友好月”活动。我参与了广播宣传方面的工作。记得在中南海怀仁堂有乌兰诺娃演出的古典芭蕾《天鹅湖》，中亚女歌唱家塔玛拉·哈依的演唱；五位备受欢迎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多次与观众见面，

其中有《库班哥萨克》的女主角拉迪尼娜，还有《乡村女教师》的扮演者斯米尔诺娃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是我策划安排的，邀请了卓娅的妈妈，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真正的人》（波列伏依纪实小说，同名主人公的故事片中译名《无脚飞将军》）的男主角、功勋飞行员马列西耶夫，以及电影《一年级小学生》的女主角（当时已是四年级小学生了），都寄来了热情但稍嫌刻板的讲话，估计是根据苏联电台帮他们起草的广播稿念的。

几年来理论上的灌输，思想上的渗透，加上感情上的熏染，对苏联的友好，跟对斯大林的崇拜，在中国城市居民中已经成为主流风尚。农民一般不太关心国际政治，但如同国内称工人阶级“老大哥”一样，国际称苏联“老大哥”，没有什么疑义。就在那个“中苏友好月”里，一位苏联农学家访问京郊张郭庄，我去采访时，听到村干部讲的都是跟报上一样的中苏友好言论，农民对外国专家的话不甚了了，但看得出几分好奇的后面充满了好客的善意。

当时，公认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陆上普通人们潜意识中是把斯大林当作全世界人民或云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正是因此，斯大林逝世后，人们自然认为毛泽东应该顺理成章地递补为世界级的领袖，也就很容易接受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了）。

忽然，一声噩耗，斯大林逝世了，没有精神准备的听众感到突然，一时觉得社会主义阵营大厦柱摧梁折，始而惊，继而茫然——说得轻些是惘然若失，说得重些是彷徨无主，因为那时毛还没有讲不管谁死了，“地球照样转”的话，于是有灾难临头之感，“痛失领袖”即此之谓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众

多国民为一个外国人之死而悲伤逾恒的事，且这种悲伤不见得是做出给人看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几年来围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个牢不可破的大家庭的“国际主义”教育；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中道崩殂”，能不令人挥泪垂涕吗？

我当时虽没有郭沫若悼诗中说的“如能赎兮，人百其身”的悲壮情怀，但仿佛回到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宣誓时的情境，这一情境是我从莫斯科版《斯大林传略》读到的，又从巴甫连科编剧的电影《宣誓》得到具象的印证。但我来不及沉浸在感伤中，必须“化悲痛为力量”地付之行动。当时我正办着每晚半小时的“贯彻《婚姻法》特别节目”，遭逢这一超过国丧的大事，领导决定停播一切涉嫌喜庆、有碍服丧的文艺节目，同时决定特别节目也撤销了。我和一些内勤编辑都被派出去采访“群众反应”。

我的任务是采访清华大学学生（而不是教师）。我骑自行车出西直门，经白石桥，一路风沙漫漫，白日无光，一个多小时到达清华园，通过校党委宣传部，安排到建筑系，跟同学一起收听了不断重播着的苏联党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的联合讣告，然后听泪眼迷离的部分同学座谈感想，表示决心，如翻阅当时的报纸，大抵可看到类似的记载。我印象殊深的，是会后一位一二年级的女同学，名梁纫勤，告诉我她的父亲原是国民党政府某机关的官员，因此她思想改造的任务更重，她一定要把悼念斯大林化为实际行动，紧紧跟着党，为人民服务。她带着因出身而生的原罪感说着这些话，眼里闪着真诚的泪光。

以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我都会想起这个明确意识到异己身份的女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她可能认真地听党的话，交



心检讨，自我改造，但是否得到党组织或具体到班干部的认可，在分配工作等一系列关节，能不能免于歧视，其后 20 多年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她的家庭能不能躲过劫难，她在精神上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悼念斯大林的活动，在北京是以天安门前开群众大会达到高潮的。许多代表人物讲话，我只记得黄炎培一开始就讲到电影《难忘的 1919》，当时这类场面上的讲话都是千篇一律，惟此还带着一些个人特点，不过也可见黄炎培这样饱经政治沧桑的人，他对斯大林的发言立论，也是建筑在宣传性的电影故事的基础上的。

像我这样一代从少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教育，视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典范，把红星闪耀的克里姆林宫当作世界灯塔的人，心目中的斯大林确实已成偶像。

当时我的见闻所及，完全不了解全世界范围的思潮动向，不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消长和分化；不知道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革命的全部真相，苏共党内斗争的复杂情况，更不知道斯大林发动农业集体化和以莫斯科审判为代表的大清洗造成怎样的灾难。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跟中国党的关系，1949 年就中国革命形势、1950 年就朝鲜战争形势，中苏间不同意见的往复磋商和妥协一致的微妙经过，都是迟至世纪末苏联档案解密后，才从一些报刊偶尔透露的资讯看到一鳞半爪的。

然而正是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前述为斯大林逝世真诚感到悲痛的青年学生，在斯大林逝世当时，心理指向是单纯的。而在政治中心深知中苏关系的沿革和内蕴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心情会复杂得多。大概在中外古今，置身局外的普通人，总是以非政治态度对待政治斗争，即以常情常理看待政治

三月五日

人物和政治事件，因此常不免于被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蒙蔽、欺骗或利用，一旦真相暴露(不一定大白于天下,也许只是部分地白于天下)，就只剩下吃惊的份儿。

不过3年以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闭幕那天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时期滥开杀戒等等黑暗内幕，我在3月间听了传达，就是世上千百万这样吃惊的听众之一。

那是后话了。

2001年2月26日

## 三月五日断想

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时在1953年，距今48年，几近半个世纪。

现在连斯大林是不是死在这一天，都成疑案。据回忆，这个伟大人物到晚年更加多疑，周期性地进行清洗，众星拱月般随侍左右的政治局委员们，差不多都预感到新一轮逮捕刑讯和屠杀快要开始了。听斯大林寝室外的警卫报告，斯大林没有按时呼叫他们，室内了无动静（因规定他们不传唤不得进入室内，有点像曹操，卧榻不许接近）；这些“近臣”们竟然默契地故意拖延时间，不去“定省”，拖延了多少时间其说不一，总之破门而入时，斯大林不在床上而倒卧在地板上，如讣告所说，伟大的心灵已经停止了跳动。

接着，发公报，下半旗，排队吊唁，开会追悼，组织专家设法保存遗体……机器开动，按部就班，全世界各国首脑政要，唁电如雪片飞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及他们影响下的无产者和进步人士同声一哭，谁也不曾怀疑斯大林是死于3月5日，

还是4日、3日？

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谁来接替他？谁能够接替得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并排发表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三人在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几个月以前，苏共刚刚召开了十九大，斯大林致开幕词，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我们也人手一册学习过的，因此马林科夫我知道；莫洛托夫是老外长了，早就闻名；只有贝利亚，尽管他在苏联国内赫赫有名，主管克格勃，权倾朝野，但对不住，我是头一回听说。不过总算让人放心，苏联不会群龙无首了。

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葬礼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回国后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这篇只在《文艺报》而没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题为《灿烂的星座》。他告诉我们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强调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成员组成了“灿烂的星座”。这个形象的比喻，很富感染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称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这篇署名散文没有发表在作者主持的中央机关报上，使之不具有权威的性质。党报有党报的口径，所以柳亚子的诗词一经刊布，传诵一时：“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阰？”

集体领导，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新名词，却是一件新事物。苏联是因为像斯大林这样盖世无双的伟大领袖出缺，才用一个形同星座的领导集体来填补的。然而，不幸，即使是灿烂的星座，在天体运行中也会出现分化。

第一个是贝利亚出局，距他登场不过100天光景，说从来是英国特务云云，到年底据闻就处决了。

4年以后，1957年7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

又作为一个反党集团出局，不过这回没有杀，莫洛托夫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大使（当时我们国内盛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号领导人泽登巴尔是他的女婿，后来又说不确定），另两位前后任的部长会议主席则发配到边疆州。

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俨然又是众星拱月的格局，远在北京的邓拓该也喟叹灿烂的星座之不存了。

这样，直到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乘赫鲁晓夫到黑海边度假之机，“捏估”好了，请赫鲁晓夫回来开会，让他自己辞职，这也是学的赫鲁晓夫对付那个“反党集团”的做法——突然袭击。后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特别不满的，也是对所谓赫鲁晓夫式人物格外加以提防的，就是这个“突然袭击”：一是赫氏1956年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时斯大林尸骨已寒，更无知觉，谈不到突然袭击，袭击的是苏共党各级领导和毫无精神准备的党员和人民，以及获悉这一秘密报告的各国党的领导和党员；二是1957年7月赫氏打掉莫洛托夫等人，是动用军用飞机把各地中央委员匆匆拉来开会，形成多数，合法地罢黜的。

不过，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也学了赫鲁晓夫对政敌采取不杀之例，比斯大林那时文明多了。赫鲁晓夫只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处于软禁之中，以迄作为“养老金领取人”去世，塔斯社是以这个头衔称呼之，《人民日报》转发新华社电讯则标题曰《赫鲁晓夫死了》，这个标题被我国新闻业务刊物和新闻写作教材当作范例称引多年。

进入1960年代以后，毛泽东强调提出了选择接班人问题，并且强调不要“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接班。但他把赫鲁晓夫式

的“突然袭击”，更多地看作个人品质问题即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问题，而多少忽略了宫廷政变的土壤就在于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君不见《资治通鉴》记载了成百起父子兄弟相弑相残的血案，都是为了争夺皇位或皇位继承权么？“二十四史”之被称为“相斫书”，那相斫的斧钺首先挥舞在萧墙之内、宫廷深处。而毛泽东以为只要继承者是自己信得过的忠心耿耿的人，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心怀不满可能在身后作秘密报告的人，就可以“放心”了。为此，他目光四射地瞄定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身上，必欲肉体消除之而后快，回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老路上去；青出于蓝之处，是不仅依靠“专门机关”，更要发动亿万群众，他担心“专门机关”也不在自己手里，乃不惜“砸烂公检法”焉。

勃列日涅夫蝉联 18 年，直到“正常死亡”，可谓幸甚；而他的后任安德罗波夫接班没多久就因为遽然逝世，把班交给了比他年纪大的病号契尔年科了。现在有人对他的猝死是否属于“正常死亡”提出了质疑，我们局外人隔着时空间距，也觉得确有可疑之处。因为在他当政时，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国防部长在 1984 年 12 月一个月里先后逝世，其中三人死于“心肌缺氧”，而我们知道“心肌缺氧”并非传染病。难道他们相约躲到天堂上去讨论华约国家的安全问题，需要请安德罗波夫莅会主持吗？

这些隐秘，怕只有等各国有关档案解禁以后，才有揭破的前提。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里“和平接班”，这是我们看到的一面；由于幕后都是暗箱操作，不知道勃列日涅夫生前跟他的同僚是怎么“捏估”的，其间是不是“和平”，或者各种不同意见暂时妥协，致使安德罗波夫得票占了微弱多数；但

安德罗波夫上台以后，随着他雷厉风行地对贪污案件采取强有力查处的措施，国内政坛特别是党内高层中各派势力的平衡难免发生变化，他能否免于“非正常死亡”，也就成了问题。

后来是年纪大于安德罗波夫的病号契尔年科继位，给人以颞预之感，来不及看到他的政绩，倒是“寿终正寝”了，至少在客观上成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戈尔巴乔夫以后的事就不说了。近事不好说，远事好说，除了因为有了一定的距离，比较容易看清之外，还因为时过境迁，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更清晰地显示出来；当然，也会有一些资料被相关的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然而，即使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把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几乎消灭干净，那被《联共(布)党史》弄得是非颠倒混乱不堪的几十年历史，终于也还是逐步澄清了。

我想，历史本身有一种力量，就是要以本来面目面对后世的人们。想要篡改历史的人，就像要一手遮天，总是心劳日拙的。弄清苏共每一届领导人权力继承的内幕，不过其中一个小题目罢了。

2001年3月5日

## 《爱因斯坦语录》

手头这本《爱因斯坦语录》，收集了爱因斯坦从17岁起到晚年许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有不少摘自非正式著述，例如题词、访谈、他人回忆和私人信件(包括从未发表过的给两任妻子的情书、家信，妻子是否宜于像官员换届一样称“任”，我拿不准，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序量词，故暂从俗)；我们从中能更逼近地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性、有激情又有个性特色的爱因斯坦。

我是“乱翻书”，就不先看那些关于政治、关于人类、关于宗教的大题目，而一翻就翻到似乎可有可无的“杂题”。

果然有趣，又不止有趣。

例如关于年龄、可理解性、好奇心和神秘感：

有些人，如你和我，虽然像其他人一样到时候也会死，但是，不管活多大岁数，我们都不会老。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我们诞生于其中的伟大的神秘世界面前，我



们永远像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样。

这个世界的永恒的神秘是它的可理解性。……它是可理解的，这个事实是一个奇迹。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惊奇地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底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感。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感情，存在于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摇篮中。如果不知道有这种神秘感，感觉不到神奇，感觉不到惊异，那就形同行尸走肉、熄灭的残烛。

你不觉得这些话所包含的思想，引领我们一步步走近诗也走近科学么？

爱因斯坦极其推崇个人和个性：

在人类生活的多彩的展示中，在我看来，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丰富感情的个人，是个性，当群众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仍然是迟钝麻木的时候，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和崇高。

只有当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宽容开放，使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发展，人类社会的高贵价值才能显现。

另一方面确实也有这种情况，一个永远不肯被奴役、或被当作盲目工具使用的、秉性自由的人，可能遭到肉体消灭。

而爱因斯坦坚信，只有独立的个人才能产生使社会得以改善和避免贫乏僵化所需要的新思想，甚至“我承认，思想能够影响身体”。

他这样说“宽容”：“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宽容。……如果国家变成主体，个人沦为唯命是从的工具，那么一切高尚的价值就都会丧失。”（1934年）

他这样说“良心”：“即使是国家的要求，也决不能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转引自他的讣告）

他这样说到“暴力”（Violence）：“暴力有时可能很快地清除障碍，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被证明是具有创造性的。”

而早在1930年，爱因斯坦就这样论“暴力”（Force）：“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批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爱因斯坦这些话，讲在希特勒上台两三年前；而在德国这样一个200年来没有民主和人权的“最残酷的极权主义的故乡”，这些话又一次成了不幸而言中的预言。

杭州出版社的这本书，艾丽斯·卡拉普赖斯编，仲维光、还学文译，许良英校并作序，还附录了许良英写的《爱因斯坦评传》，对于想了解爱因斯坦生平、科学贡献、思想和人品，但又不可能钻研《爱因斯坦文集》的一般读者，不失为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

2001年8月18日

## 评点一篇“异域走笔”

[原文]

### 现代越南人说：让往事随风去吧

(作者邢世嘉，刊于《新民晚报》2001年11月7日“异域走笔”专栏)

在过去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越南总是战乱不断，越南人的生活也总是与战争相关。那时，在我的印象中，越南人不是在枪林弹雨中拚杀，就是在挖地道，钻地道，和敌人周旋。好像他们的生活就是进攻和防御。

然而，在硝烟散尽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战后出生的新一代越南人，对战争和历史没有切身感受。他们耳濡目染的是人人经商、人人挣钱的社会氛围，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他们只希望大学毕业后找一份高薪职业，早日发财致富。

在我问及越南青年“对历史是否感兴趣”时，没有一个人持肯定的回答。其中一位从事导游职业的年轻人

似乎很反感，他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要老是把战争挂在嘴边，现在我们只想多挣点钱，早日买回自己的摩托车，享受跟邻国看齐的生活水准。我打心眼里同意这位青年的观点。但是我又说，作为导游，讲人文历史是你们的职业，而战争史是历史的重要部分，他怎么能不挂在嘴边呢？你猜这位导游是怎么反驳我的，他说，你们游客只管自己游好乐好就行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都要淡忘了，你们还要知道那么多干什么？

### 〔评点〕

这篇短文让我将信将疑。看来作者是以游客的身份到越南观光，那么除了接触导游以外，究竟还曾向多少年轻人作了调查提问，就对“战后出生的新一代越南人”作出了全称判断，又径题为“现代越南人说：让往事随风去吧”呢？

这一句“让往事随风去吧”，文中不见出处，不知是哪位“现代越南人”说的，还是流行于越南的共识；是民间的感慨，还是政府的导向？

我以为倒像是作者的心里话——在提到那位导游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只想多挣点钱……”的时候，作者说：“我打心眼里同意这位青年的观点。”

然而，作者大概忘记了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规定的当下环境里跟这位青年导游问答的。他也许想让导游讲一讲抗美战争或更早些抗法战争的历史，不过，事实是，“在硝烟散尽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最后那一阵硝烟，却是发自中越交战的战火啊。你让越南导游向中国游客“讲人文历史”把中越战争“挂在嘴边”，是否一种不情之请？是否有点莫名其妙？人家说

“你们游客只管自己玩好乐好就行了”，已是足够的委婉；至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都要淡忘了，你们还要知道那么多干什么”云云，这耐人寻味的答话，难道能作为这位越南导游乃至青年一代越南人忘记历史、抛弃历史的证明么？

此文乍一披阅，不禁为越南哀，一个经历了那么久的苦难的民族，至少他们年轻一代竟淡忘了历史！因为记得哲人说过，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通读全篇之后，我从将信将疑进而感到不是那么回事。“对战争和历史没有切身感受”并不是那里的青年遗忘历史的理由，参与当下市场化改革中的经济活动，也不是必然导致遗忘历史的条件。

这倒提醒我们反观自身：无论是“对战争和历史没有切身感受”的年轻人，还是经历过战争（例如充满苦难、抗争和牺牲的抗日战争）和历史（包括战后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运动直至“文革”等等）的人们，是不是心存对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及其人民的命运的关注，经常温故知新，而没有健忘到“让往事随风去吧”；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会发现自己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许多的伤口并没有结疤，哪里来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假如有人问我“对历史是否感兴趣”，我只能回答，不是“兴趣”问题，我感觉到的是历史留在我身上和心上的痛。

2001年11月21日

## 阳光下的黑夜

写了谈软禁那篇文字，其中曾涉及暗杀云云。

于是，精神上的虐杀，肉体上的消灭，绑架，逮捕，行刺，极刑，杀人，砍头，枪毙，绞架，凌迟，刽子手……这些中外古今或同或异的字眼纷至沓来，挥之不去。

这些话题，像阴谋、谋杀一样，通常似是黑箱操作，不见天日的。

但现在窗外阳光耀人，写下这些词汇，依然阴气森森，那毛发倒竖之感，就是恐怖或恐惧吧。

不知印欧语系中的恐怖、恐惧是否同一词源，在我的母语中，却都源于一个恐字，七情之一，至少是有文字以来便有的心理反应。

那给人恐怖恐惧的刺激的，最初来自自然，黑暗饥饿寒冷风雨雷火山洪林火，野兽猛兽和一切对生命的狰狞威胁，继而

也许大量来自同类的自称灵长类的人吧。

是的，这是全人类的现象。

所以 19 世纪的散文大师蒙田虽然没经历过希特勒的死亡营，斯大林的肃反，波尔布特的所谓革命，以及中土的白色恐怖、红色恐怖，也早已写出过论恐惧的宏文。也许现代人只能为他补充些后出的例证。

我在上世纪的 1998 年秋，在顾后瞻前的《狂欢不再》一文篇尾，曾说在 21 世纪人们可能遭遇到的后冷战时代的三种致命的危险，其一即恐怖组织的恐怖行动。

不意“9·11”这个为大半个世界异口同声指认的大规模恐怖行动，这么早就降临到新世纪曙光初照的小小地球上。

但我在意识到恐怖组织的恐怖行动将给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全带来的威胁时，也没想象到“9·11”事件这样大面积和强力度的杀伤，我心目中还是零星的至多是密集的爆破、枪杀、劫机威胁罢了，总之，没想到个人或集团采取的恐怖行动，早就暗暗地发展成时人指称的国际恐怖主义了。

在我接受的关于革命的正面教育中，是排除以肉体消灭为目标的暗杀行为即所谓个人恐怖行动的。

据说列宁的哥哥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捕，17 岁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表达决心说：“我们要走另一条路。”

另一条路即推翻整个的旧制度，而仅仅谋杀沙皇本人并不足以达到这一革命目的。

但在从整体上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过程中，是不是排除恐怖手段呢？

历史记录下列宁的铁腕。十月革命后，以革命的名义处死了成千上万的政敌，其中包括昨天的同盟者以及平民。

1917年二月革命时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18年被秘密处决，连同妻子儿女。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列宁命令这样做，但也没有证据表明列宁不同意这样做。

国际公法没有一般地反对战争，但反对虐杀战俘。

罗曼诺夫家族的末代沙皇连战俘都算不上。

也许执政者的恐怖行动，无论杀戮一个人一批人或一个阶级一个群体的人，都不算恐怖行动，而是其主权即统治范围内的合法行为？

法国把一个专业刽子手世家称为“合法杀人家族”。他们作为行刑的刽子手，不因“杀人”而受法律追究，他们的杀人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政府行为的实践，因此归根到底是“合法”的。

斯大林举行三次莫斯科大审判，大开杀戒，都由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像按照幕表似地履行一道道法律程序，自然是“合法杀人”。

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洛夫获得高票，“票高震主(?)”，这是他随后被暗杀，而人们咸认为出于斯大林策划的原因之一\*。



据说为了彻查这一案件，引出了列宁格勒大清洗——大屠杀，当然又是“合法杀人”了。

“合法杀人”与非法杀人——也就是明杀与暗杀交互为用，在执政条件下，就以明杀为主，暗杀为辅了。

为什么在卡廷森林杀害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的事又讳莫如深呢？

明明是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决议付诸执行，是光明正大的“合法杀人”，却弄得支支吾吾，躲躲闪闪，鬼鬼祟祟？乃是因为杀外国人，且并非战争中的敌国的军人，而触犯了国际法，触犯了世界范围的众怒，不敢承认，只能推托搪塞，诿过于人，一包包了四五十年，终于纸里包不住火。

世上的事情都可以以小喻大。

从我们“身边”看，那些乡镇市县正副职官员之间，为争权夺位，为扫清道路，不惜买凶杀人，不就是政坛名人巨擘之间制造口实置人死地的缩影么？

东方有，西方也有。

美国总统四年一届，二百年来从林肯始颇有几位是被暗杀的。最晚的一位，是1963年的肯尼迪吧。

谋杀原因无他，不同的政策后面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是社会财富及资源占有份额的矛盾，也是政治权力占有份额的矛盾。

同是对政敌的谋杀，也有不同。

西方，多是在野的谋杀在朝的，劣势的谋杀优势的。

东方，则往往是主流的谋杀非主流的，有权的谋杀无权的。

西方，对手间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名实相副的政敌。

东方，则扑朔迷离，平时无所谓政敌，都是同志和战友，一朝翻脸，已成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其中不乏大大小小的“假想敌”。

从好生恶死的人类本性和常情度之，一切以暴力剥夺他人生命或对他人生命形成威胁的，都使人感到恐怖、恐惧。

但常识又告诉我们，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而一切革命又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暴力不可分，能说一切导致流血牺牲的都是恐怖行为吗？

在这里，我们的思维很容易陷入有关正义和非正义，多数人和少数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有权者和无权者，合法与不合法，人权与主权，以至阴谋与“阳谋”这一系列范畴形成的迷途、怪圈和泥淖。

诉诸情理，人性有共通的许多方面，不同的群体也会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所持不同。

诉诸法理，各国的法律有时出入很大，甚至大相径庭。理应共同遵守的国际法怕也远不完善。

国际法将如何界定国际恐怖主义，我们拭目以待。有谁能作出有价值的建议吗？

我们说恐怖行动，过去常指个人的或某些群体的个别行动。

我们说恐怖组织，就是把恐怖行动集约化经常化计划化了。

而恐怖上升为主义，则是理论体系与系统实践的互动，务虚它会形成精神控制，务实则可能导致政府行为。不仅对内必然是极权主义的专政高压，而且对外富于侵略性，时刻危及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人类的安宁、生命和前途。

从现实政治层面和人类整体命运层面看，都需要对这个国际恐怖主义作出系统的综合研究，分析它的源，它的流，它的不断变化的表现。

国际恐怖主义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甚至想起了几千年来有文字记载的“人性恶”的历史……

2002年1月

\* 近年有来自俄罗斯的资料说，基洛夫是因婚外恋遭到情杀的，这就排除了斯大林的罪责。姑志于此。对斯大林这样心毒手辣的人，清点他的不法行为，也还是该实事求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

——2006年9月邵注

## 读报札记

新华社记者徐机玲3月1日自南京报道，中国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一起研讨了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认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应该铭记所受的创伤，警示后人，不让悲剧重演。

研讨会是在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以色列学者们参观了纪念馆内的万人坑遗址、遇难者遗骨陈列室和日军暴行史料馆，对日军杀戮30万人的血腥暴行深感震惊。

来自以色列的犹太学者大卫·班卡尔教授，现任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反犹太主义研究所所长、当代犹太人学会大屠杀所所长。他在比较分析后，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残酷屠杀暴行是对人类文明、公理与正义的肆意践踏。

报道说，中以两国学者就德日侵略军屠杀暴行的思想体系、犯罪根源、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探讨交流。可惜限于新闻体例，于此语焉不详，如能更多了解会上研讨的成果，一定会得到触类旁通的启发。我们多年来也看到过不少“对人类文明、

公理和正义的践踏”，除了看到这些暴行的“社会影响”以外，说到它的思想体系、犯罪根源，常常莫明究竟，是很想听一下专家学者指点的。

与上述报道同时，读到《北京青年报》载刘传锦据俄罗斯媒体2月27日报道，阿富汗临时政府计划在首都喀布尔建一座塔利班罪行博物馆，其目的是将塔利班统治七年中“这些现代的野蛮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昭告世人，警示后代。

我认为，阿富汗临时政府的这一决定，不仅代表着阿富汗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也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这个决定在阿富汗土地上犹有战火未熄的时刻作出，表明了临时政府反对塔利班的决心和远见：留下塔利班的罪证，才有利于清算其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杜绝其借尸还魂的危险。

据报道，阿富汗有关部门已开始在全国征集有关塔利班罪行的史料；未来博物馆的一个展厅将集中展示塔利班欺压妇女和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其中最突出的将是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被彻底炸毁的图片和说明，云云。

记得巴米扬大佛被毁当时，我曾想到中国1966年“破四旧”时对传世文物古迹的破坏。现在，经过文物部门和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已经编出了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目录，我以为，认真调查，把“破四旧”前后发生的不是由于“外患”而是由于“内乱”导致的文物古迹的破坏，一一登录，不使湮没无闻，也是“此其时矣”了。不是为了具体追究具体的责任人，而是为了节省后人的考据功夫。这应看作是文物工作者份内的责任。

文物工作的工作对象涉及历史，其责任可称历史责任。其

他各方面的工作也都有向历史负责的问题，也都义不容辞地负有相同、相似或各自不同的历史责任吧。

2002年3月9日

## 小议“跟屁虫”

偶然发现一家报纸的国际版上开辟一小专栏，叫“国际打油”。

这一天专栏的诗配图，题为《跟屁虫》，诗云：“总统小布什，首相布莱尔。两布成搭档，一唱一个和。你要灭拉丹，我咒他早死。你炸阿富汗，我喜做陪客。你反萨达姆，我说不宜迟。你做霸王梦，我在床边乐。小英跟大美，忠心最了得。甘当跟屁虫，欣然无愧色。”

这位诗人谦称“打油”，原来说的都是世界上头等大事情。大约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不准备再当世界革命中心，特别是1989年后强调中国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来，国内传媒对国际问题的表态都是很谨慎的，久矣夫不见对别国领导人的嬉笑怒骂了。而这首国际题材的“诗”，独树一帜，表了中国政府不曾表过的态。

诗人把英国首相布莱尔关于拉丹等的对策与布什总统执行的美国政策相一致，谥为“跟屁虫”，显然是以为应该反其道

而行之才是正理——因为，按诗人的看法，美国从“9·11”以来的反恐怖主义行动，海湾战争对萨达姆的打击，都是其“霸权主义”的表现，俺们在30年前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急先锋，于此岂能后人？

国际社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一致，或基于利害，或基于道义，不一定意味着必然是小国、弱国对大国、强国的“忠心最了得”的结果，那样也太看不起有国格、有骨气的小国和弱国了。这也许是诗人囿于自己的经验，以为“保持一致”只能是谁“忠”于谁的问题。

但不管你怎么看，人家英国首相布莱尔代表英国政府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既定方针，是你这个打油诗人所奈何不得的。布莱尔虽贵为首相，按英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能够自说自话，自行其是的，他要对女王负责，也要对议会负责，对英国人民负责，英国和英国人民什么时候成为“小英”了？诗人不觉得自己太把自己看“大”了吗？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懂得尊重各国人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小强弱或你个别人眼里的“小”或“弱”，你没有理由无端指责别国，甚至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人。你说布莱尔是“你要灭拉丹，我咒他早死”不对，怎么才好？必得“你要灭拉丹，我祝他长寿”？

我先是以为此打油作者乃是继承并发扬“中国可以说‘不’”的一脉传统，回过头看看诗前小序，说“‘9·11’事件后，英国首相布莱尔紧跟美国‘走四方’，鞍前马后，特别卖力。近日国内舆论嘲讽他是美国的一只‘跟屁虫’，布莱尔对此说不屑一顾”云云。原来如此，所谓“跟屁虫”之说，并不是作者的创意，不过是（英国）“国内”的一种舆论吧，我想，



英国不是“舆论一律”的国度，相信其国内不会只有这一种舆论，而且这种舆论也不会多么强烈，所以布莱尔可以“对此说不屑一顾”。只有在遥远的中国国内有这么一位诗人，不但对此说“一顾”，而且把它敷衍成一首“国际打油”了。

诗人把布莱尔以至英国决策层叫做美国政策的“跟屁虫”，或者说他有这个自由吧，但切记，“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不然的话，应该把你叫成谁的什么呢？

按照一般的礼节，在这里还是把这首“国际打油”的作者尊称为“诗人”的。

2002年5月4日

## “小田岳夫”是谁

今读《文汇读书周报》上摘录钦鸿先生《许广平与范泉关于〈鲁迅传〉的一场争论》，其中提到范泉翻译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云云。

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我得以知范泉先生之名，一是因为他编的《文艺春秋》杂志，一是因为他翻译的《鲁迅传》，那本传记作者是小田嶽夫。

如果向日本文艺界人士发问，他们恐怕只知有小田嶽夫，而不知小田岳夫。我国大陆从1950年代起实行汉字简化，把“嶽”简化为“岳”了。但日本书面上用的汉字并没有随同我们搞简化，我以为，对于日本人的汉文姓名，还是要“名从主人”，按他们的习惯书写为好，不然就会造成混乱。

对于我国古人的姓名，以至古代地名或一些特指的专有名词，似乎也宜采取这样的原则来处理。

不知当否，质诸高明。

2002年5月12日

## 《闲逛美国》序

这是一本以鉴赏收藏家的眼光、记者的文笔写成的美国游记。

从前我只知道书稿执笔者周侗是北大出身的资深记者，直到我迁居潘家园旧货市场对门而不曾涉足其间近四年之后，才知道周侗早已成为明清青花瓷鉴赏收藏家了。

说他以鉴赏收藏家的眼光观察美国，不光说他能在美国古董市场上“捡漏儿”，更是因为他和他的合作者、夫人吕丹云一起，在纵横美国东南西北几万里的行程中，面对目迷五色、七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和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现象，远观近看，摩挲端详，究其根柢，辨其源流，比较短长，品评高下，确有心得体会，这才笔之于书，用文字锁定，“收藏”起来，同时“收藏”于相机的照片，只是小小参照罢了。

说他以记者的文笔写美国，要在用事实说话。这在从事职务写作的，尤其是规规矩矩的“笔杆子”，未必容易做到，因为要忠于所谓新闻导向，每每不免对事实加以剪裁（不过剪裁

有巧拙而已)。周侗从来不是一举手一投足每句话每个字都中规中矩的人，这里又是纯粹的个人写作，所以多采独立的视角，在这个那个问题上，说得高些是“一家之言”，说得低些是“聊备一说”，不可绳之以一时一地的宣传口径，更不必与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相对照也。

我，在喜读《闲逛美国》部分书稿时，也不是以听有关国际形势或某国国情分析的严重心情，而是如与老友闲坐聊天，倾听他说壮游见闻的自由心态，他的有些具体看法我也未必赞同，因为我于背景了解不多，自不能遽下判断，但我相信他说的都是亲见亲闻，所思所想，这才是最可贵的。

至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如同我们的老大中国一样，原是不看完、说不尽的，尽管两位作者在美国游历了三四趟，但那活动范围仍不过是广大幅员上的点点线线，从中得到的感触和认知，从中提炼的思想观点会有一些的局限；但重要的是见从己出，不是先有成见，这就多多少少能为我们读者提供一些新鲜的，属于作者个人的发现。

这样做的作者多了，我们就可以从众多有关的书籍中，看到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美国。

作者说他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度，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我看大抵做到了，还可以加上疑处说疑；我们对自己的祖国，有些事一下尚且说不清楚，何况是别人的国家。在所谓“坏处说坏”的时候，作者也能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发表议论，而不像有些情绪化的文字，沿袭长期以来曾有的武断的文风，攻其一点，上纲上线，据说是针对着“妖魔化中国”，而去把这个那个对象国也“妖魔化”一番。这样的“反帝”情怀，似乎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把他们之所作为，跟

19世纪下半叶为了救国，为寻真理、求进步而努力向外国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比一比，看看先贤们那时向西方以至东方（如日本）学习中写的游记、日记和纪实与议论文章，自然便看出目的不同，一切都会不同了。一百年后的人未必就处处胜过一百年前的人啊。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关于美国的书也出版了不少，我印象最深的当属林达写的近距离看美国的三本书。据说叶永烈新近出了一本面对一般读者的美国游记，现在周倜夫妇的这本书，可以说同样是写给一般读者看的，而有关专业人士应该也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希望有更多帮助我们“睁眼看世界”的，有可读性又有可信度的好书出版。

2002年7月10日

## 为自由而闪耀

——读《自由星辉——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统集》

苦难能够摧毁人，却也能淬励人的精神。无论一个人、一个群体以至一个民族都是这样。

犹太民族两千多年来遭到亡国灭种、走死逃亡之痛，到20世纪中叶，又有600万同胞死于法西斯的屠杀。同样饱受法西斯主义荼毒的中国人对此感同身受。

1941年，正当众多的犹太人被驱赶到死亡营、焚尸炉，千百万幸存者被迫辗转流徙，随时有死于非命的危险，而欧亚两洲人民也已被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置于侵略的炮火下，其他若干国家和地区即将被卷入战争的灾祸之际，这一年的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两巨头——准确地说是美英两国政府首脑——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旗帜鲜明地揭橥了“四大自由”，即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sup>①</sup>；使全人类，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中国人，在硝烟和血泊中听到响亮的号召，在痛苦和迷茫中看到了熹微的希望。

二战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自由对法西斯的胜利

利。但远非最后的胜利。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并没有从某些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退出。各式各样的野蛮，各式各样的专制，还在阻挠着人类的进步，制造着种种灾难。

而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漫长过程中，特别是近百年来，涌现了灿若群星的作出卓越贡献的卓越的人。一个奇迹般的发现：其中不少第一流的人杰，虽属不同国籍，却都是犹太民族的后裔。

我们像康德一样仰望星空，又低头历览这长长的名单，令我们动情的不止是这些人杰可见可考的经历和业绩，还有他们思想和实践中贯串的人文精神。

在这里，衡量人的尺度，不是时下流行的所谓“成功”的标准。其中有些人与其褒为“成功”人士，毋宁如实说是“失败者”，如罗莎·卢森堡就是在1919年领导柏林一月起义失败后被德国政府秘密杀害的。

我这一代人在成长期中，追随中国共产党，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因此，列宁称誉为“鹰”（“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的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曾经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之一，她的《狱中书简》则是我们锤炼革命情操的教材。然而我们囿于成见，往往忽略了，卢森堡那些被认为“犯错误”的见解，也许实际上正是她表现了高瞻远瞩的预见。

卢森堡尽管与列宁在革命活动中互相支持，她对列宁也很尊重，但早在20世纪之初她就不同意列宁式的建党结构，责备列宁是极端集中主义、主观主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

命在俄国胜利，卢森堡站在支持者的立场，在欢呼声中，她对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提出批评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她表示忧虑：“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陷于瘫痪……”她实际是要求实现党内民主化进而扩大到全社会的民主化。这一独立见解是基于她憎恨一切压迫和奴役行为，抱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后来苏联 70 多年逐步走向失败的历程印证了她的远见。

另一位卓越的女性汉娜·阿伦特，她是现代社会的有力批判者。她所著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不仅给她带来世界性学术荣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本书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那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它把一部分人视为天生理应消灭的“种类”，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撒谎、作伪证、行使暴力等畅通无阻。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自订一个“终极目标”，为此要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一部分人自封为这一改造的执行者；发动那些陷于被攻击的恐惧中的人去攻击其他人，并赋予“崇高”的含义，这正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阿伦特在影响 20 世纪风云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出自己的有力的声音。她在《论革命》中把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加以比较，表达了“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的理想；同时揭示了“革命”这个人类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摆脱的悖论。



从德国逃亡到瑞典的女诗人奈丽·萨克斯，她的作品更具犹太色彩，她认同她同胞的信念和宗教神秘观，用象征意味浓厚的有灵性的语言写诗，不忌讳死亡集中营和焚尸场的恐怖真相，呈现出面对人的卑劣行径所感到的哀伤。她要“让一切恐怖和怨恨都成为过去”，因为新事物不可能建立在仇恨和复仇的基础上。1966年，萨克斯“由于其卓越的抒情诗篇和剧作以感人的力量表达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宽恕、解脱与和平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sup>②</sup>

我们心目中这些灿烂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都是为文明而不是野蛮、为自由而不是专制，闪耀着自己全部的光辉。

在重版时冠以“智慧星辉”书名的《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推出了88位传主；眼前这本续集，传主也达78位。前者选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及大众传媒各领域，后者则扩大到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的代表人物。经济文化方面所收的理论家和企业家，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著，自由经济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支柱，他们所代表的经济文化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而政治文化方面入选的个别传主，所作所为则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悖，与全球价值相悖，与其他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名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可同日而语。如长期担任斯大林副手的卡冈诺维奇，公德私德均不足取。据本书中《苏联历史上最具权力的犹太人——卡冈诺维奇》（高科）一文称，1925年，他受斯大林委派去改建乌克兰共产党，采取一系列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过激做法，不得人心；1930年代，他全面支持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以积极和残暴闻名，所到之处，便有成千上万户所谓“富农”、“富农的走狗”

全家扫地出门；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会上，他借担任组织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下令销毁了近300张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使斯大林和基洛夫都以满票当选，为斯大林保住最高领导地位；1933~1934年，1936~1938年，他是大清洗的急先锋，经他审批的逮捕、判决名单达几十件，他审查大案、要案时随意改动判决内容，并受斯大林委派到一些州去摧毁当地党政部门，仅在顿巴斯一个地方，他就下令于一夜之间逮捕了140名党政干部。……够了，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丑恶、双手血腥的恶棍，极权主义的死命推行者，怎么能厕身于为文明和自由的群星间呢？

也许编者所说的宗旨之一“从正反两方面揭示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精神”能够解释一二，收入卡冈诺维奇式的人物，是要他充当“反面教员”的。不过，把这样的人列入“文化名人”，总觉难以苟同。名人固然，文化何在？只有卓越的政治家能够代表一种政治文化，一般大小政客且不足以言政治文化，何况是以政治迫害为业的刽子手？

全书业已编就，我意无须改动。相信读者自有辨别和评价的能力。

讨论人文精神和文化方向，我以为应该从区别野蛮与文明、专制(奴役)与自由开始。

“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两个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语文中，多年来往往混用，有待界定。<sup>③</sup>然而无论就“文明”还是“文化”而言，都不能离开全球价值的认定。

全球价值取决于全人类的共同要求和共同归趋。在我们常识所及的范围内，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实现越来越

文明、越来越自由的现代化目标；只有民主，能够对抗野蛮和专制(奴役)，对抗形形色色复活和变种的法西斯主义。

“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凡是符合全球价值，有利于民主的建设健全，有利于人的越来越自由(而不是恐惧于专制)、越来越文明(而不是屈从于野蛮)，有利于人们物质福祉的增进和精神世界的提升，就该是我们欢迎的，乐于吸纳和传承的，反之，便坚决拒绝它。

2002年7月29日

**注释：**

①对以上三位传主的简述，均引自本书有关三文，作者分别为邓峰、崔卫平、钱涛。

②③参阅陈言《“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本篇中所有“文明”一词，则是对应于“野蛮”来使用的。

## 斯大林格勒站

巴黎每个地铁站里，都用特大字在墙上写着站名。我头一次乘5号线，一进站就念出：STALINGRAD，这不是“斯大林格勒”吗？

斯大林格勒：久违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后，不记得在哪一年，苏联就把伏尔加河畔这座名城改称伏尔加格勒了。在那同时，什么斯大林诺、斯大林纳巴德等等都改了新名或恢复原名，塔吉克斯坦首府就从斯大林纳巴德改回“杜尚别”——在当地语言里叫了多少年的：三棵树。

这个巴黎地铁站，不知是什么时候以斯大林格勒命名的。我想当是在二战之后。

二战中，从1942年冬天到1943年初，在伏尔加河西岸冰天雪地里惨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肯定是希特勒的德国军队当时遭到的最大一次失败。整个的10月份，俄国人在巷战中利用断壁残垣，顽强防守，捍卫每一寸焦土废墟。直到转过年来，在苏联5000门大炮的狂轰猛炸下，双方在城内瓦砾成堆、

遍地冰冻的废墟上，展开最后肉搏式的争夺。一时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斯大林格勒；正是在这里，不但粉碎了希特勒控制伏尔加河、掠夺高加索石油的迷梦，而且就此挡住了他们东进的脚步。

构成这次战役结局的，有希特勒狂妄、愚蠢和偏执造成的多次失策，更有苏联 150 万大军和斯大林格勒成百万居民的英勇战斗和牺牲。

15 年后，我从苏联带回一块斯大林格勒的弹片，久埋在浸血的泥土里已经生锈，不能辨认炮弹原来属于哪方了。当时写过几句感想：

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  
多少泪，多少汗，多少鲜血！  
多少次忍痛生离死别，  
多少人悲壮地告别世界。

欢乐的回忆，纯真的愿望，  
幼稚的过错，懊悔和原谅……  
对多少人这一切都不复存在，  
都已经在浴血的土地上埋葬。

即使你今天还很年轻，  
即使你没有经历过战争，  
这一块斯大林格勒生锈的弹片  
不能不使你想起很多事情。

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我已经 10 岁，生活在日本占领军统治下，那时候沦陷区报纸按照日文里汉字译法，把那血战中的城市称作“史达林格勒”。我从片言只语想象着那里的巷战，为争夺每一幢房屋的生死角逐，直到我无法想象下去。

生活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人，从成年人到孩子，一定也像我一样，对几千里外那座激战中的城市不再感到陌生了。

我想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在巴黎解放以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大约就在把凯旋门周围命名为戴高乐广场的同时或稍后，分别给地铁作了罗斯福站、斯大林格勒站这样一些命名，多半是为了保存一段关于二战的记忆。作为历史的纪念，没有像对罗斯福那样用另一“巨头”斯大林之名，单取了欧战东方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之名，不能不说表现了法国人的睿智和分寸感。

我读到的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学作品，不如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多。最早是苏联随军记者、诗人、作家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苏联外文局出版的中文译本。透过萨巴罗夫少尉和护士安尼亚的战场爱情，我们多少体验了硝烟火网短兵相接的斯大林格勒的气氛。

另一部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 99 个昼夜，表现了人们争取自由、反抗奴役意志的长篇小说，是苏联作家格罗斯曼战后写的《生存与命运》，在作者生前被禁，1988 年才在苏联国内出版，我看到的是 1990 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中译本。

书中写到了 1943 年一二月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覆盖了如网般纵横交错的战时的道路，覆盖了硝烟和污泥……积雪下沉睡着强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 and 不幸的人。这不是雪，而是时间本身：洁白而又柔

软的时间一层层地沉积在鏖战的城市的废墟之上。现在一切正在变为过去，在这场缓缓飞舞的大雪中看不见未来。”

永远过去了的过去，有什么永恒的东西留给未来？

我们今天生活着的世界和岁月，不就是 60 年前生者和死者的未来么？

巴黎地铁的斯大林格勒站，有三条线路在此交叉，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想起世界历史上那一重大的战役。

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写道：“世界名城的特色在于它们的灵魂，‘战争之城’斯大林格勒也有自己的灵魂，这灵魂便是‘自由’。”

也许正是这城市在战火中锤炼的自由的灵魂，让爱自由的法国人长久地铭记着她吧。

斯大林来了又去了。斯大林格勒在与专制迷信决裂的日子里，摆脱掉加在它身上几十年的名字，但也没恢复“察里津”的旧名，而是以它依傍伏尔加河的地理位置，谦逊又自豪地以伏尔加格勒命名了。

巴黎地铁的斯大林格勒站，本来的命名就与斯大林其人无关，自也无须跟风改动。巴黎的地铁站，地面上的大街小巷，不少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命名，让人恍若穿行在历史中。

历史，像地铁列车那样一节节地渐行渐远，但不断远去的历史，有时又仿佛离我们很近。

2002 年 8 月 1 日

## 国会大厦

塞纳河左岸的国会大厦，是 200 年前的波旁宫，路易十四的女儿波旁公爵夫人的府邸，她的情人拉塞侯爵就在相邻处修建了私家豪宅。人事有变异，往来成古今，还在法国大革命前，就由另一位亲王把这两处房产并为一座了。“请看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后来归了公，据说拿破仑还曾过问这座归了公的改建过的波旁宫的外装修呢。

拿破仑的墓葬就在波旁宫西南，在巴黎登高一望准能看到的镏金圆顶的荣军院；另一边不远有罗丹美术馆，原本是 1730 年建成的一处私人园林。这三处，叫名胜也好，叫古迹也好，恰成一个三角形。

走上波旁宫高高的台阶，十二根矗立的圆柱守护着气势恢宏的门廊，间隔着并列的五座宫门。要深入进去，才到达议会大厅，半球形圆顶，据说是由旧日接待厅改建。我想，当年波旁公爵夫人和拉塞侯爵幽会，显然用不着这么大的空间。有回声嗡嗡的厅堂绝对不适于夜半的私语。而 100 年前



中国学者、黎庶昌写的《法国议政院》文中描写的，大概才是这里典型的光景。

手边没有黎作《西洋杂志》，但在友人书架上看到《杂文作坊》，里面有我读黎书后写的杂诗并有注。

其一是：

嘈杂人声辩若狂，宣言宗派听铃铛。  
朝来定议夕退位，民情国事两无伤。

黎庶昌《法国议政院》文中所记若是。《伯理玺天德辞位》文叙法国总统马克蒙无议会多数支持，被迫辞职；“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

这是说，议会有权决定总统的去留；在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度，哪怕是总统易人，也不致引起社会的动荡，国家事务照常进行。

其二是：

西洋杂志志西洋，万里来观议事堂。  
独断独行今已矣，改弦颇思得更张。

庶昌著《西洋杂志》，于西方政制民俗，以及物质精神文明，多所介绍。又其《答曾侯书》谓：“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俄皇遇刺》文中对亚力山大二世“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立议院，民情不能上达”颇感不满。

黎庶昌是晚清末世的清醒者，放洋观光，于别国先进是个

有心人；但他毕竟属体制中人，赞赏议会制，也着眼于民情可以上达，使君主得以兼听，更使民众为国——实则是为君主分忧，仍在君主立宪窠臼中。正如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的改革，以避免重蹈法国王室被革命推翻的覆辙，都是为“圣上”设想。这是他有所局限的地方，但他能看到议会制容纳不同意见，有利于比较选择，终究胜过盲目固持大权独揽的权力者一筹。他在当时能公然宣扬西洋的政治文化，没有视为夷狄之学或资产阶级一套一笔抹杀，是他的开明；而他却未因此受到追究查处，也还由于那时全国浸润于一片求变的气氛，先有开明的官员办洋务，继有相对开明的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戊戌变法”虽被坚持专制的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但慈禧随后也不得不保留若干维新措施；最后，君主立宪的方案千呼万唤终于出来，可惜太晚了，没能起到由此让步而抵销革命的作用。大清国 260 多年的皇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颠覆了，黎庶昌等一两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们的著作，也就成了近代思想史的档案材料。

每逢读史，我常常不免有生当明末或清末的感觉。站在中国的先进者 100 年前曾经来观礼的法国议会门前，忽然想起黎庶昌那远去的声音，不是历久弥新，犹如在耳边么？

## 示众台

巴黎市政厅不远，是有 800 年历史的中央菜场。菜场北边一个十字路口，据导游小册子说，那儿有个不注意就会忽略的，远没有宫殿、古堡、教堂那么身价高贵，但又不能不叫古迹的“示众台”。

但友人告诉我，示众台今已无存，当初是无意遗留下来还是有意保存的，后来的拆毁又是无意抑或有意，如是有意，意在什么，是谁决定的，不知有没有史料可考。我自己国内的事情尚考不清，哪还管得了别国的事？

然而久久不能去怀。遥想 14 世纪这座示众台初起时，菜场每周开市三天，商贩云集，肉菜满摊，四面八方的顾客往来，有时就在必经的路口，驻足而观，那示众台上押来了小偷、骗子、妓女们，任大家往他们身上抛垃圾、扔石块以羞辱之。

那时候，有没有人不以为然？一个时代的风尚，就是不成文法，尤其是以为从来就如此的。《圣经》里耶稣那个时代，

不是就流行往所谓通奸者或其他“不道德”的人身上掷石头么？

羞辱以至虐待“公认的”不道德者，就最足以显示自己的道德了吧，可不是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吗。

这个古老的风俗习惯，或说是“法外之法”的“刑外之刑”，不知在法国持续到什么年代，具体地说，像这样一座处于市中心的示众台，延续到什么年代才停止使用？

不过，我看，一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使用率达到最高的断头台，可比小小的示众台厉害多了，它同样召引人众来围观，收示众之效，但早已不是为了羞辱当事人，以儆效尤，而是为了镇压异己，威慑整个社会。

这座示众台既是位于圣厄斯塔许十字路口，就与圣厄斯塔许教堂为邻。两者同样可称古迹。这座始建于16世纪的规模仅次于圣母院的老教堂，流传下来的却都是可以引为荣耀的佳话，单说文艺方面的，剧作家莫里哀在此受洗，诗人拉方丹在此举行葬礼，作曲家柏辽兹在此欣赏了由950名音乐家演出他的大作《感恩赞》，钢琴家李斯特在此首演《大弥撒曲》。这一切都同法兰西以至全人类的文明相关联。

而示众台展示的既是社会底层的阴暗面，又是对待这种阴暗面“以不道德对不道德”、“以非法对非法”的不文明表现。以羞辱别人人格为得意者，什么时候能认识到这也是可耻的呢？

也许只有让两者并存，而不以前者掩盖后者，才是一种磊落一种豁达。

中文译作“示众”，如果的确传达了法语中的原意，那么，我想，中国之有“示众”的历史恐怕要比法国悠久得多，远的

不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到处响彻“把某某某揪上台来”的嘶喊么？1966年6月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不是就搭起什么“捉鬼台”么，捉的是鬼，自己便是人或神了，斗的是反革命，自己便是革命之化身了，这样的台是批判台，斗争台，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场，岂是小小的巴黎古“示众台”可比乎！

1966年、1967年参加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周扬等人的万人大会，对那一长串批斗对象包括所谓陪斗的人，是批判，也是示众；长安街上过卡车，彭德怀元帅被押沿街示众，示众也是批斗；后来除了秘密处决以外，流行公审公判，无不有示众的意味。一时间，神州赤县，到处在游街示众，到处揪上台示众，刘少奇主席在中南海自家院里挨斗，没有另外搭台，站在台阶上，那台阶也是示众台了。

至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没留下一处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示众台，因为处处曾是示众台，处处可充示众台，也就没有特定意义的示众台了。不须单独建立“文革”博物馆，或许也是同理，让过来人指认，哪一寸土地没有留下过“文革”的创痕？

中国人历来有毁坏真古迹、制造假古董的毛病，谁知道千百年后会不会重建什么文革“示众台”，甚至仿古仿洋复制出西方古籍中所有而实地所无的“耻辱柱”来。

## 一样的广场

罗马有个威尼斯宫，没有列入我们这次参观的景点。年轻的导游只是远远一指，说那个二楼的阳台就是有名的莫索里尼阳台。

莫索里尼在那个阳台上“表演”过无数次演讲，说是表演一点也不错，他用心总结经验说，个别谈话要亲切，群众场合要煽情。想见他当年站在这阳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向他狂呼“法西斯万岁”的党徒，自我感觉是当代的恺撒，何等的不可一世。

莫索里尼是靠煽情、蛊惑、欺骗起家的。1919年，他在米兰组织了有150人参加的“战斗的法西斯党”，提出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信仰、服从、战斗”！

信仰什么？服从什么？为什么而战斗？

莫索里尼说：“19世纪，人人口中无不谈民主。现在的口号应当恢复古来的理想，改为‘以少数贤明之人治国’。……欧洲再向民主方面走，是愈走愈糟；只有革命可以救国。”

他说的革命，就是反民主之道而行之，就是法西斯专政。

当时意大利有国会，实行代议制民主。莫索里尼的党徒施展流氓手段威胁选民：“谁不投黑衫党的票，重者致命报复，轻者一杯蓖麻子油！”就这样，从1919年的4000张选票，一跃而为1921年的17.8万张选票；随后，法西斯党的武装党徒即达50万人，普通党员100万人，他们控制和操纵的工会等社团250万人。国会中的法西斯党团，占了535席中的35席，他们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1922年10月莫索里尼率领10万人向罗马进军，迫使内阁辞职，他当上政府首脑，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专政；比1933年上台的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党魁希特勒早十年，可以叫法西斯主义的“祖师爷”了。

莫索里尼一上台，立即禁止游行示威，叫喊把“诽谤”法西斯主义的人“钉在墙上”。接着，公布法令，除了法西斯党团以外，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予以取缔，“一切权力归于法西斯”，莫索里尼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还不算，进一步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取消工会同时，成立法西斯工团，把资本家和工人、劳心的和劳力的，全纳入这个组织的领导下，为法西斯国家从事物质生产。它要求，“在法西斯国家中，每个市民不再是一个自私的、反社会的、反集团的人，而是遵守政府法律、效忠法西斯国家的模范公民（？驯服工具！）。”<sup>①</sup>

大约在1926年底，莫索里尼不但“革命”成功了，他在内政上的各项“改革”也成功了，这年11月他颁布《紧急法》，标志着国内法西斯化已经完成。

莫索里尼在接受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采访时，志得意满

地说：“我来到这儿就不想走了，不打算走了，打算尽可能久地留在这儿。”他说起他所崇拜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借以夫子自道：“对独裁者来说，长期掌握政权是极其重要的。”<sup>②</sup>

莫索里尼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对国内危机的注意，也为了他建立新罗马帝国的狂妄目标，他又在国际上寻找同伙，寻找支持。他在指挥意大利军队单独入侵阿比西尼亚（其后改称埃塞俄比亚）以外，又伙同德国纳粹希特勒一起武装干涉西班牙。此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成为生死搭档，莫索里尼管希特勒叫“元首”，希特勒管莫索里尼叫“领袖”。他们在二战中虽有利益矛盾却在总体上互相响应、互相支持的一系列战争罪行，是人们所熟悉的了。

1940年6月10日，莫索里尼就在这个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上，发布了追随希特勒参战的宣言。他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将把我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句话正扎根在德国人的心里，他们已经飞着，在天空，准备从阿尔卑斯山一扫到印度洋，那就是：征服吧！”

广场上的法西斯党徒照例狂热地鼓掌、欢呼、跳跃、嘶喊。

将近5年以后，1945年4月2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出逃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意大利边境一支游击队处决。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在广场上。米兰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发轫的地方，但此时在这个广场上，已没有向他欢呼的万头攒动，只有满怀复仇的愤懑的人群，先把他们的尸体吊在路灯杆子上，又放下来扔在路旁阴沟里，也有的说是扔在一家咖啡馆门前，陈尸，践踏。



罗马的广场，米兰的广场，一样的广场，今天，一样是人们在悠闲漫步，鸽子在从容觅食……却写下了法西斯狂人墨索里尼的生平始末。

**注释：**

①这里采用的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而墨索里尼对他的女婿齐亚诺的私房话，可就直截了当得多：“意大利民族是一群绵羊。十八年也改变不了他们。……我们要叫他们循规蹈矩，从早到晚穿着军装。打他们，打他们。……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必须把他们送去作战，甚至你非臭骂他们一顿不可。我就是要这样做。”（《齐亚诺日记》，转引自解力夫《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②转引自解力夫《专制魔王——莫索里尼》。

## 诺曼底海滩

到诺曼底去。

从巴黎向西，有很长一段路与塞纳河同行，车行左岸，河水向西奔往出海口。过鲁昂城而不入，说好归程再来，瞻仰法兰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纪念地，她是在此遭受火刑的。

诺曼底！诺曼底！这个遥远的地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个响亮的呼唤。它与“登陆”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与打败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也与结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

那是1944年，临近我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报纸上，频繁地出现诺曼底的战况。平时沉默整天没话的父亲，披阅报纸眼睛不时地发亮。

我们无须到诺曼底西北角瑟堡的“战争纪念馆”去。我们就在卡昂城北面阿罗芒什那一带海滩下车。

天阴沉，一阵一阵的毛毛雨。低空的云压在粗砺的海滩上。这是法国5500公里海岸线的一段，生死攸关的一段；位于跟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西北角。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的

水，此刻海天一色，如满布的云似的灰沉沉。

58年前的6月6日，那是历史上称为D日的进攻日，从午夜到拂晓，也是这样阴霾的天气，而空中有更狂的风，海上有更恶的浪。

那年5月里有18天好天气，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盟军却按兵不动。

好一段时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在诺曼底之东、法国东北角加莱海峡部署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以迷惑敌人，完全符合“声东击西”计策的原旨。1940年英法军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选在这里通过了最窄最近的海峡。因此，德国不是无缘无故在此配置了重兵，实力最强的步兵师和装甲师。

诺曼底的德国防线也是严阵以待的。沿着海滩至今保存完好的一个个乌龟壳式的地堡，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依然冷冷地盯着海上，但这时已没有炮弹，更没有操作大炮的日尔曼士兵，炮口就像惊愕得下巴掉了环，失神地张着嘴哑然愣在那里，碉堡上弹痕斑斑。

当时可不是这样的。关于盟军可能于6月6日~16日之间登陆的情报，关于登陆地点可能在加莱海峡的判断，以及希特勒累次“注意诺曼底”的提醒，固然都是统帅部里的事情；而每个碉堡里的一组德军，不管意识深处誓死忠于元首希特勒，还是不那么死心塌地，也都只能夙夜匪懈提心吊胆地守在炮位上，等待着最终或是当炮灰或是当俘虏的命运降临。

他们甚至不会知道，上级认为天气恶劣，没有迹象表明进攻“迫在眉睫”，不会知道驻防诺曼底的军团司令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不会知道德国海军因为风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巡逻的船只，也不会知道德国空军侦察机已经飞不到英国

南部海港，而在那里，大批的盟军正在静悄悄络绎登船……

我是许多年后，从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才得知这一切的。

而龟缩在诺曼底海滩碉堡里的德国陆军士兵们，则在1944年6月6日拂晓，亲自承受了这一连串儿事前都秘而不宣的历史性动作的后果：

千船齐发，越过风急浪高、雾雨昏瞶的海峡，向诺曼底一线如潮逼来。猛烈炮火掩护着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盟军从舰船登上卵石圪塔的海滩。

在这之前，凌晨时分，两个美国空运师和一个英国空运师，2万人已经在诺曼底德军战线侧翼的后方安全着陆。

希特勒妄称“大西洋壁垒”的防线，几小时内就突破了。

这几小时是你死我活的短兵相接，茫茫雾雨缠裹着血肉横飞。

我们现在脚下这一带是英国军团和加拿大军团楔入地段，美国军团的桥头堡在西边的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

一年以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后，节节胜利的美国骁勇善战的巴顿将军，这一回作为美国第三军团的司令来了。后来就是这位坦克将军，对诺曼底地区的德军进行了大包抄，在攻克了西南方的阿弗朗什以后，回师东南，直指巴黎。这是后话。

直到6月6日下午4时55分，在酣睡中没人敢于打扰的希特勒终于一觉醒来。他下令对盟军的“滩头阵地必须在今晚肃清”。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当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加已经在一处海滩取得立足点。而且果然像希特勒所担心的，盟国的后续部队正继续

由海空登陆。

6月10日，蒙哥马利将军报告说，他已经完全在海滩站稳脚跟，可以接受视察了。于是，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参谋长马歇尔分别登上了英国和美国的两艘军舰，顺利穿过英吉利海峡前往各自部队的阵地。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深入内地七八英里了，他的总部设在离岸大约5英里的一个乡间别墅。这一天天气好极了，据丘吉尔回忆，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是黑白花色的奶牛，在阳光下或走或卧。当时居民热情地向他们招手。

丘吉尔驱车或漫步在这狭长的占领地，看到沿着海岸线，大量船舰延伸了50多英里，都得到有效的保护。他在保卫阿罗芒什港（就是此刻我们脚下这一带）的海军上将维安陪同下，观看了英国战列舰和巡洋舰近距离炮轰德军阵地，炮击从容不迫，连续不断，敌人没有反应。丘吉尔对维安说：“既然已经这么近了，为什么不在回家以前再打上几炮？”其时距离只有6000码（约5公里多点），在敌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他们向寂静的海岸开火，然后快速驶离。德军却没有回敬一炮。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我多么希望你也在此啊！”

从6月6日以来，头六天中，盟军已有32.2万人，5.4万辆车辆，10.4万吨物资在诺曼底登陆；从6月9日起，战争主动权已经落在盟军手中，到6月11日，盟军已建成了一条连续的战线。

尽管这样，不但最初在诺曼底海滩，就是在诺曼底地区的腹地，在塞纳河和横亘法国中部的卢瓦河之间，且战且退的德军仍在顽抗，战斗依然极其惨烈。直到8月25日，法国第二步兵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攻进巴黎，当时法国抵抗运动已经基

本上控制了巴黎市区(法国地下武装起义了,警察也罢工了,巴黎警察总局已被爱国者占领)。

我在巴黎荣军院的二战纪念馆和蓬皮杜文化中心陈列的摄影作品中,都看到了巴黎解放时倾城狂欢,入城式时迎接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一片兴高采烈,在那历史的时刻,所有的楼窗都打开了,所有的街道喧哗着,所有的手臂举起来欢呼。

诺曼底登陆不仅打开了解放巴黎的通道,也打开了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通道。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诺曼底海滩痴望那阴雨中显得平静而凝重的海水,远方,对岸,什么也看不见,此时连一只海鸥的影子也没有,俯首拾起两块卵石,觉得应该带回去留个纪念,这是地老天荒经受过大西洋或北海的潮水冲击和磨砺,永世默默无言的卵石——它能证明什么,它能纪念什么?

从平地漫到丘陵上的野草,在雨中显得湿漉漉的,从1944年那个夏天,已经58个春秋,一岁一枯荣,也绿过了58遍;当时地面上雨水中草叶树根沾染过的,有盟军的来自远方的年轻士兵的血,也有德国步兵的血,濡染过,渗透过,却也早就在时间里风干,在大地上灭迹,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渐渐消逝为淡淡的血痕。夏伊勒的笔一下子就把诺曼底的战争随手带过,转去写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德国内部谋害希特勒的尝试”,1944年7月20日的高级军官谋反案了。

诺曼底漫长的海滩上,不仅留下了德军坚固的炮台地堡,更留下一片一片十字架,盟军阵亡将士墓园。据说其间也有德军死者的墓地。

除了我们,四顾无人。除了细雨打在伞上,万籁静谧

无声。

当时敌对双方成千上万的指挥官和士兵，共同书写了这一页诺曼底战史。

这一页战史的作者今天在哪里？

这一页战史的读者今天在哪里？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应有的众多读者在哪里？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应有的众多读者在哪里？

用生命有意无意地写着今天的历史的人，还顾得上重温细读昨天的历史么？

终于远远开来一辆小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穿着灰色的雨衣，走上那边山坡，经过草丛灌木匆匆走过来了。他像是比较熟悉这一带的路径，迳直地无所顾盼地走过来。看清了，一个50多岁左右的中年人，战后出生的一代，他显然不是当年这里战役的参加者，不是二战的亲历者。他的脸色严肃而阴沉，从我们身边走过，原想跟他打个招呼，却没说出什么。他走上去又走下来。他肯定不是一般的游人，他是有目的而来的。那么他是在凭吊先人，温习写在海滩和坡地上的历史，或者是个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来作田野调查，谁知道？……等我们在一座德军地堡顶上的平冈照过相，远远看到这个沉默的孤客，他发动了车，又匆匆而去。

离岸不远处，石座上停着一辆盟军的坦克，是诺曼底登陆28年后，上世纪70年代从浅海打捞出来的。它以特殊的角色身份留在这里。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海滩，灰色的蒙蒙细雨，灰色的双十字架……只有并列的旗杆上高悬着的法国红白蓝旗，美国星条旗，英国米字旗，加拿大枫叶旗，是于草树的湿绿外仅

有的鲜明颜色，但有雨无风，旗帜都黯然下垂，仿佛在为诺曼底登陆中的牺牲者默哀；也许到了雨过天晴，来自大西洋的暖风轻拂时，这些国旗才会招展起来，表达当年反法西斯胜利者的欢悦吧。

半个多世纪在扰攘中过去了。这里已听不到立体战争中钢铁的轰鸣爆炸电波的呼叫人的呐喊，看不到炽烈的火网闪电的信号翻滚的浓烟，嗅不到 TNT 硫化物令人窒息的火辣辣臭味和其间溅起的动物血腥……往昔的风云甘于寂寞地退场，隐入时间深处，让位给后来者。只是随处竖立的一些石料的、水泥的碑碣坊柱任我们一路打量，都简洁、朴素，不渲染、不张扬。历史仿佛很自信：有人会遗忘，有时会遗忘，但不会是所有的人永远遗忘。

雨停，我们也将离去。同来的数学家万桑，是生在巴黎长在巴黎的巴黎人，40岁了，他说他第一次到这里来凭吊战场，他说他还要再来。我们在停车场看到两辆大客车，成队的中学生来了，该是到这里上历史课吧，今天6月20日，星期四，不是假期。

2002年8月



## 独夫心态

——夜读抄

外国的书我读得不多。关于二战，丘吉尔的回忆录很晚才买到，倒是很早就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李慎之等的中译本，“文革”后期就内部发行了，借来读过，对希特勒这人的真实情况，主要是从此书来的。

不久前重新翻翻，对希特勒败绩时要毁坏一切这一点，感触殊深。

1944年8月25日，盟军和法国抵抗运动部队解放了巴黎。在这之前两天，8月23日，希特勒下令毁坏所有巴黎的桥梁和其他重要设备，“即使艺术纪念物遭受破坏也在所不惜”。时任德国西线B集团军司令隆梅尔元帅的参谋长的斯达派尔将军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这个斯达派尔是1925年图平根大学的哲学博士，不久前刚刚参与了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事件，他是所谓谋反分子，却是几乎仅有的逃脱希特勒惩罚的人。他后来揭露说，巴黎失守以后，希特勒马上命令用重炮和V-1飞弹摧毁这座城市，但这个命令他也拒绝了。

几个月以后，希特勒败局已定，他在1945年3月19日下了一道“焦土政策”的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他在向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解释这一决定时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9日，元首希特勒信托的秘书马丁·鲍曼下达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而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行走。

假如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和其他补充指示等等全都付诸执行，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尚未死于战争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

按照当时的各种“焦土”命令，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这是要在盟军到来之前，灭绝仍然存活的所有德国人的生路，这是要让整个德国民族作他的陪葬；希特勒横下一条心要在最后时刻自杀，他对他曾经表示无限热爱的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是心有不甘的。

德国人民能够幸免于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的破坏未能执行以外，还由于斯佩尔和一

些军官直接违抗命令，奔走努力，保证重要的设施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执行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所炸毁。（按：这个纳粹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战犯斯佩尔，因此在纽伦堡法庭上得免判处死刑，被判 20 年徒刑。）

希特勒不但要毁灭别人之国，而且要毁灭自己之国；不但在发动战争时要制服敌国，而且在兵败垂死时，恨不能把自己再也不能君临的一切，毁坏得片瓦无存，寸草不生，人丁绝迹。真是彻头彻尾的独夫心态。

环顾中外古今，独夫心态莫不如此，只有程度不同罢了。在中国，从“咸阳一炬”肇其端，打下天下，进得城来的，大掠三日，要烧要杀；失了天下，败走之前，放他一把大火，我不能占有，你也别想得到。像梁武帝那样，只是在亡国之前烧掉自己珍爱的藏书，已经有点文绉绉的书呆子气了。至于李自成逃出北京，大概过于匆忙，居然把紫禁城完好地留给了满洲大清国。在西方和中东，暴君尼禄纵火烧得古罗马成为废墟，欧仁·德拉克卢瓦(1798~1863)的名画《萨达纳帕尔之死》，则表现了被围困宫中的国王命令太监杀死他的后妃宫娥侍从以及心爱的犬马。这与项羽之杀虞姬，朱由检(明崇祯帝)杀公主异曲同工。

希特勒命令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徒步大迁徙，不但使人想到了他曾把 600 万犹太人置于死地，而且使人想到斯大林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少数民族赶出家园，流放到荒远的边区和极地，波尔布特把整个金边城抖落一空，驱赶男女老少长途跋涉到乡村，都造成大量的非自然死亡。

天下独夫都不把人当人，自然不管人民死活，他们只顾逞一己的野心，而视人民如草芥，如儿戏，甚至妄言死一半

人也不在乎，当然那前提是他享命万岁，大权在握。可惜，即使权倾天下，叱咤一时，也还是人间的匆匆过客，不死于人，则死于天。世上水照样流，草照样绿，女人照样生孩子，而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以至波尔布特等如今安在哉！

2002年8月12日

## “国际耻辱”

西伯利亚有个贝加尔湖，大家知道就是汉使苏武“牧羊北海边”的那个北海。五六年前已经列为世界纯天然宝贵遗产之一。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保护法令，开始实施旨在保护的五年计划。

但是，因为海豹皮值钱，偷猎严重。贝加尔湖的海豹皮毛制品不止出现在俄罗斯中心地区，还销到乌克兰、中国、意大利。贝加尔湖海豹的捕杀限额是每年 3000 头，实际上非法猎捕达到 1 万头。每年冰雪融化季节，海豹群艰难地爬向湖中群岛的岩石，许多海豹身上都有斧子砍的伤痕和猎枪的弹痕，它们是死里逃生的。

当地居民认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有些就是监守自盗的偷猎者。有人辩护说，监管员的工资低，只能靠偷猎维持生活。但正直的居民说：“我们不信，心地纯洁的人能今天打死海豹，而明天又保护它？”

海豹的劫数还不光是偷猎。1987 年~1998 年间，有 1 万

只左右的海豹尸体被风暴抛到贝加尔湖岸边。人们怀疑是两个化纤企业排放污水造成的。1997年这一年就有1500只海豹尸体被冲到岸边，化验结果海豹体内的氯有机物含量，几乎相当于布匹中的含量。

因为俄罗斯政府没有完成事先的承诺，贝加尔湖自然保护老问题上又加新问题，落到濒危境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保护自然联合会不得不前来检查。普京总统就此声明他将全力监督解决这一问题。有关报道说，俄罗斯这才避免遭受国际耻辱。

“国际耻辱”一词用得好！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社会，国际形象问题就更显得突出。在争取国际声誉的同时，如何避免国际耻辱？

我们在人类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珍稀动植物保护这一国际关注的领域，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2002年11月22日

## 伯利恒之星

所谓中东——西亚，于我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远不如欧美一些国度，虽然没去过，但对它的方位、幅员，大抵有个模糊的印象。

然而有些地名，像耶路撒冷、伯利恒，可是从小就听说，记得清清楚楚。恐怕是得之于教会学校的熏陶了。

这一切都跟辉耀着冰雪和灯火的圣诞节分不开。这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也是孩子们欢乐的节日。

1939年我上了北平育英学校小学部。那年冬天度过我生命旅程中的第一个圣诞节。没有宗教仪式，一年级小学生也没上相邻的公理会教堂。但每人发了一纸袋，吃的，记得是夹馅面包，还有零星糖果。数量不大，意思到了，上帝的馈赠啊。拿回家，自然是我个人享用的；好像高年级的姐姐哥哥并没有拿到这份圣诞礼物。那该是格外厚待我这初来者了？——谁知道，或许他们也有份，没带回家就在学校吃掉了？

我还做过一件与圣诞节有关的“美术”兼“手工”作品。

算起来该是 1940 年的圣诞节前夕；因为 1941 年冬圣诞节还没到，12 月 7 日日机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我们这家由美国基督教会资助的学校就被日本占领者接管，我们提前回家过了一个长长的寒假。

而那年，日本还没接管我们学校。为了欢度圣诞节，不记得老师是怎样布置的，反正我想独出心裁，决心做一个金星，然后饰以青枝绿叶的流苏。但回到家，真正动起手来，头一个困难是材料；手头没有现成的金箔纸，连“电光纸”都没有，只能用单面挂白的硬纸壳。借来姐姐和哥哥的直尺、三角尺和圆规，比来比去，改来改去，画出个五角星的形状，再用橡皮把浅浅的铅笔痕迹擦去，保持纸面雪白光洁。原来构思做流苏用的枝叶，是心目中的藤蔓植物，但这时已是严冬，窗外萧索，室内又没养文竹之类可堪披挂垂拂，想得不错却实现不了；无奈只得就在白纸壳上画出几缕枝枝叶叶，涂上绿色，跟五角星连在一起剪下来。那五角星是任其雪白，还是染成金黄，也还颇伤了一会脑筋。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件自己创意的“美术品”。起先家里人见我苦思冥想，画了又改，改了又画，问我的作业是什么，我还保密，想做好后给他们一个惊喜。待到大功告成，竟只是一个平面的五角星上挂着一串死板僵硬的“青枝绿叶”。

这个想法是受到什么启示而来，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那颗星，无疑是伯利恒天空上悬挂的，“东方三博士”远路迢迢，奔着它来，终于赶到马槽旁边，“听啊天使唱高声，报知耶稣今降生……”

忽然想起这些陈年旧事，而且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是因为看报上国际新闻标题，伯利恒战火不断。我不是宗教



奥斯维辛之后

徒，我总是有意识地回避有关宗教与战争的残酷的历史，告诉自己，一切宗教都是主张和平与仁慈的。但在人间的权力和武装面前，似乎宗教情怀就变得脆弱无比了。

伯利恒天上的星，什么时候能摆脱战火的遮蔽？

2002年11月27日

## 重过莫斯科

### 此身虽在堪惊

从 1957 年春天初访莫斯科，到 2003 年秋天重来，间隔了 46 个年头。在天文时间里，这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个人，却是“朝如青丝暮成雪”。许多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一生也没活这么长，契诃夫才 44 岁就病死了，普希金只在人间逗留了 38 年！

而在人类历史上，这 46 年经历了太多叫人不胜沧桑的大变动。我们是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出访苏联的中国记者团，又正当 1917 十月革命的 40 周年，赫鲁晓夫在接见时，让我们捎个口信：他们准备以盛大的庆典迎接毛泽东同志的到来。我在此行中写的组诗，就题为《第四十个春天》。诗集排好了版，没有问世。因为就在毛泽东率团去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的同时，我正式成了反右派斗争的对象。这个政治运

动，不仅像是斯大林时期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重演，而且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清除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斗争。我和我的几十万同案者们的命运，就这样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

其后，在冷战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陆续发生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变。号称“牢不可破的友谊”而结盟的中苏两个大国，由互相指责的所谓论战而终于分裂。在我们这里，三年大饥荒，死人无数，十年大动乱，更是冤狱遍于国中；在苏联那里，一度说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然而卫星上天、军备竞赛和打击持异议者，都不能消解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最后出现谜一样的突变，曾以列宁斯大林为旗帜的政党、政权一朝瓦解。

俄国人也许从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特别是近年公开苏共档案以来，对几十年的历史有了较多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普通人，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大家离真正的庐山远得很，庐山远在万里外的云雾之中，我们对历史深层的所知，正合着香港人爱说的：“一头雾水”。

照例到光线微弱的列宁墓地去看望逝世近 80 年的列宁。鱼贯而行的不少是俄国老太太，神情凝重，只是注目为礼。倒是有些 60 岁左右的中国游客，多半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大学生，绕过列宁遗体时，鞠躬如也，就像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似的。

在列宁墓外，跟他做伴的，尽是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头面人物。斯大林的遗体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次党代会后从列宁墓迁出，焚化了埋在后面赭红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墙根。有一

些苏联元帅和苏共总书记，各立一尊石雕半身像，依次排列着；文秀数过来，发现没有赫鲁晓夫，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在总书记任上去世的，契尔沃年科虽只当了年把，死在任上时身份仍是总书记，而赫鲁晓夫虽当了十一二年的总书记，可没死就下了台，死时的塔斯社消息已只称之为“养老金领取者”了，故不在塑像之列。然而我们接着发现，排尾的一个是苏斯洛夫，并没当过总书记，置身于此，类乎破格，但他是几朝元老，据说颇有操纵一切的权力和手腕，他又是意识形态的主宰，多年来力图控制苏联人的精神世界。原来立像的标准是灵活的，出于某种需要，全在掌握之间。我和文秀相视而笑，不再追问。

不过，在这个显赫位置上接受瞻仰或参观的死者，都不得不跟他们的夫人分开。我就在新圣母公墓中，发现了苏斯洛夫夫人苏斯洛娃的墓，不远还有赫鲁晓夫的墓，布尔加宁的墓，以及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里唯一的妇女，一度风头甚健的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的墓。这个公墓似有一个好处，只讲先来后到，不以身份为序，因此参差错落，也顾不得死者们生前的恩恩怨怨了。

如今所有到莫斯科观光的人，差不多都被人领到这个公墓看看，像在巴黎差不多都要去看看拉雪兹神父公墓那样。这些墓园也的确比我们国内的公墓好看，因为每座墓都有不同的设计，有的堪称艺术匠心之作。北京现在除了八宝山之外，也又开辟了些新的公墓，阔人和他们的家人子女，开始关注身后的阴宅了，日积月累，将会形成一些新的旅游景点吧。

高莽著的《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一书图文并茂，其中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墓前还是一幅照片，这回已

经代之以她《天鹅湖》舞姿的立体雕像。公墓的另一处，又见一座全身雕像，当代职业妇女的装束，原来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在这里，她是新来的。

走出墓园，已近黄昏，骤雨微晴，有一线斜阳透过云层，一阵风来，梧桐叶落，不禁想起“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句子。不过这里一切清扫得干干净净，规规整整，没有词里那般的萧飒。

回想46年前，那“第四十个春天”，虽说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经过波兰、匈牙利接连的动荡，我们恍忽感觉到国际共运的某种危机，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一片玫瑰色，但我所受的政治熏陶，仍然使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批判和革命传统，加上十月革命以来中国革命者“到莫斯科去”的浪漫行迹，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对“新俄”几乎天然地怀着好感，加上苏联画报、电影歌曲对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说起苏联，阳光与鲜花更像是无可更易的主调。我在当时团里算是年纪小的，比我大10岁20岁的人其实也都差不多。我们那次访问的政治色彩很浓，我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报道十月革命40年的成就，藉以修补因揭露批判斯大林而露出破绽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形象。我们所要着意的自然是光明面，是辉煌、伟大、欢乐、幸福，纵的与十月革命前“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日子相比，横的与西方世界的两极对立和“垂死没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贫穷痛苦相比；这是既定的宣传要点，也是采访时的指导思想。

这回迥然不同了，我们夫妇只是私人游历，她是初来，我虽说是重游，却并不为了怀旧。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变迁，那些

团结一致或你死我活的政坛人物一个个出局了，去世了，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依然在俄罗斯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着，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每天都有新的太阳升起的真实生活。

我在46年前初来时，接待过我们的，我们采访过、接触过、邂逅过的朋友，满街上的行人，大剧院里的观众，其中中年以上的想必都垂垂老矣，当年40多岁的人，如今还有多少健在的？反正我们记者团的成员，除了我和新疆的富文（他当时40岁，今已晋九），别人都不在了，有两位，刘克林和丁九，还是在“文革”中自尽的。

站在红场一角，不是凭吊一个政权，而是面对着一去不复返的时间，面对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历史，想起我认识的和陌生的，那么众多的人已经不在，而我幸存，忽然觉得“此身虽在堪惊”！我得以苟活到今天，是怎样的际遇和偶然。

### 谁能自由呼吸

历史上，生活中，一切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从小接受替别人着想的道德教谕，学会“设身处地”，后来爱好了文学，这就转化成一种身份和境遇的假设。

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1957访问苏联，我倒没有想象自己在40年前的1917躬逢其盛，那时候连瞿秋白还没有到“赤都”来，张西曼似也还只在远东海参崴一带，传说亲眼见过列宁的柯庆施则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我确实想过，我若在1927年来到莫斯科，我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我的叔父年轻时，1926年在上海，即将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不幸被军阀孙传芳逮捕，从此改变了一生的道路。如果他那时成行，到了莫斯科，

在尔后的年份里，他会跟着米夫、王明大抓“托派”、大反“江浙同乡会”等等，还是抵制反对，而被加上托派的罪名，遭到流放、监禁或遣返回国？简直全都不敢想象。

说到1937年，自然不会假设自己在莫斯科，而是想象我逃离沦陷敌手的北平，然后或从津浦路南下，或到平西平北投身抗日武装。到了1947年，真的参加革命的时候，是为“最低纲领”即为打倒蒋介石，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心目中却想望着“最高纲领”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苏联乃是叫人神往的样本。那时候总是悄悄地哼着姜椿芳译词的《祖国进行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记得艾青有一首诗，说他行走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公路上，“像那些阿美利加人 / 行走在加利福尼亚的大道上”一样，为此受到批评。说来惭愧，我哼着这首苏联电影插曲，就如哼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似的，仿佛我也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且以这是唯一可以“自由呼吸”的国度而“自豪”。这是1940年代一个倾心于共产党的少年的心理。说来跟1930年代把革命根据地叫做“苏(维埃)区”，以至刷出“拥护苏联”“保卫苏联”的标语，如出一辙。这种心理机制，由于《共产党宣言》论断“工人无祖国”，以及有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而更加强

了。如果为自己辩护的话，可以说，这是因为生活在蒋介石国民党治下，实在感到窒息，难免向往着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罢了。

何满子后来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说：其实在那片国土上，当时能够自由呼吸的，大概只有“克格勃”。

克格勃的全称，应该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吧。安全机构是各国都有的，并无足怪。克格勃却因它把触角伸向“铁幕”之外的各个角落，而为世人所熟知；它在“铁幕”之内的作为，是直到斯大林死后才逐渐透露出来的。它现在已经成为包括它的前身“契卡”（十月革命后的肃反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格别乌”（苏军参谋部情报总局）在内的一个代词。在漫长的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国土上有这样一支听命于斯大林的别动队，不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苏维埃之上，而且凌驾于苏联共产党之上，单是1936~1939这三四年间，就有一半以上的苏共党员，120多万人曾被逮捕，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就不必说千千万万非党的苏联公民了。

回望斯大林时代，在第一线上冲锋陷阵，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搜捕，乃至动用告密、伪证、刑讯等非法手段，镇压异己、滥杀无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就是这支别动队。它罪无可道地成为人民群众怨恨之所集。因此，当民怨爆发的时候，首先就把克格勃办公楼前矗立了几十年的捷尔任斯基塑像，套上绳索拉倒了：这个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亲密战友，被当成了专制极权血腥统治的象征。

不过，十几年后，这回我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上，看到迎面而来的一艘货船，沿用着“捷尔任斯基号”的老船名。而



且，据说他那被拉倒的石像已经另外择地重立起来。我不相信这是像有人说的，因为普京出身于克格勃，对这位契卡老领导、高高瘦瘦穿马靴的波兰人格外关照；而多半是由于在老一代俄罗斯人的记忆中，把他在革命狂飙时期的肃反行动，跟建立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区别开来，捷尔任斯基去世较早，没有参与过后来的事。而且，不但是捷尔任斯基，还有早夭的斯维尔德洛夫，若是一直活到1930年代~1940年代，能不能逃脱主要针对老近卫军的屠戮都很难说。

斯大林时期的恐怖行动，应该说从1920年代反“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盟”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斗争已肇其端，到1937~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形成一次高潮，那两年里，以“反革命活动”罪逮捕了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96名代表中的半数以上(1108名)，逮捕和处决了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8名，达到70%。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以受审者百分之百的当场服罪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实际上所谓“清洗异己分子”没有就此煞车，更大规模地斩尽杀绝的行动指向了远不是什么反对派，而只是斯大林自己疑神疑鬼的，下面投机者告密的，更不用说多少表现出对其政策、做法有些异议的对象，几乎是所有他昔日的追随者、合作者。

即使是在他唆使下为制造恐怖出尽全力的人，例如在贝利亚之前，曾于1930年代~1940年代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亚戈达、叶若夫，也先后被斯大林除掉了。由此可见，何满子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就连“克格勃”也不能“自由呼吸”。

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门前有一座内森·黑尔的雕像，他是

200多年前独立战争中受华盛顿派遣，打入英军收集情报，身份暴露被处死的青年英烈，一向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间谍，受到人们的尊崇。我想，由于美国的政权稳定，总是按程序如期接替，从来没有翻天覆地颠覆历史的民变，加上内森·黑尔所标志的传统，是对外而非对内，为人们常情常理所能接受，因此，这座石像才得以屹立至今，安然无恙吧。

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反法西斯的隐秘战线上功勋卓著的佐尔格，虽是德国人，却属于苏联特工系统，由西欧转战东方，最先从日本军方获取了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尽管不幸牺牲，而他的大智大勇彪炳史册，赢得我们的尊敬。对中共特科的潘汉年，我亦作如是观。他们不是为金钱受雇于人，而是为理想而斗争，为理想而不惜赴死，尤其在二战中，不仅为本民族，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别，凡是称职的国际谍报人员，其智商和意志都必有过人之处。移之于其他的领域，也会另有所成。然而，在今天俄罗斯的高级公职当中，据说原克格勃人员占到1/4的比例，这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呢？

## 斯大林的阴影

赫鲁晓夫曾经建议在莫斯科树一座纪念碑，来纪念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这似是在1961年冬又一次为这些受害者平反的浪潮中说的。此后不到3年，他被同僚们逼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平反的工作大大放慢以至停顿；像布哈林这样的代表人物，是直到冤死整整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他的妻子加林娜才从“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里收到

了平反通知书。

这样，尽管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看到了各个时期多种多样的的宫殿、教堂、雕像和纪念碑，唯独没有看到斯大林时代受害者的纪念碑。

但在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建筑上，却看到了斯大林的阴影。

走出红场东头重建不久的伊维尔门(复活门)，不远有一座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莫斯科宾馆，乍一看也平常，经人指点，看出与平常的同类建筑不同之处：当时苏联的大型建筑都讲求对称，这个饭店偏不对称；原来，曾把外观设计图纸送给斯大林审查过——他管得真够宽的，不但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一张图纸上并列画着两座楼的图样，不料，斯大林在两图之间签了个名，他究竟中意哪一个呢？谁也拿不准，谁也不敢去问，结果，只好把两个图样彙合到一块儿施工，出了这么个折中的产物。幸好斯大林日理万机，没再过问，深居简出，也没看到，最后终于淡忘了吧。从这儿也可想见当时的工程师怕官员，官员怕斯大林的秘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个个都诚惶诚恐，免得惹祸上身。上有不测之威，下必有“全躯保妻子之臣”。

但要真的自保也颇不易，岂止不易，甚至很难。在莫斯科河边我们还看到一座大楼，跟前面那个宾馆一样，都是游览指南或风光明信片上见不着的。离有名的红十月巧克力厂不远，为纪念俄罗斯海军建军300周年，新竖了彼得大帝屹立军舰上招手的纪念雕塑，很别致的；两者之间，有一座老楼，主楼六层，两翼各有十一层(这回是对称的)，并在最上面加盖了望楼式的带顶露台，单是正面就有近三百面窗户，足见规模之大，整个看来，不说是庄肃巍峨，也算得敦实厚重。这就是有名的

“滨河街公寓”，住的尽是党政军的高官。尽管他们全都各有别墅，这里无疑是“党和国家”为他们安置的第一住宅，妻儿老小，聚居于此。所以如此集中，当然是为加强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同时，也便于封闭式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

这样说并不过分。事实很快就证明，在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这高级住宅里成百的家庭，恐怕无不惴惴不安，朝不保夕，担心随时会有什么不幸发生。这不用第六感觉，因为不断有人在家里被捕，押送出门，有去无回了。

1935年苏联册封的第一批元帅一共5人，有3位就此遭到肉体消灭。

首当其冲的，是1937年6月11日午夜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说起来他跟毛泽东同年，当时只有44岁，出身于革命前的军事世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曾任方面军司令，有勇有谋，能征惯战，1925年32岁时就曾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后来又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国防人民委员。其间，位置在他之上的“骑兵派”老将伏罗希洛夫，对这个贵族出身，战功卓著，却又锋芒毕露的年轻将领怀有敌意，多次向斯大林进言，说此人不可重用；后来围绕着国防现代化问题的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也白热化了，图哈切夫斯基研究新形势下的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和装备现代化，发表了许多理论著作，但是在具体实施上总是遇到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骑兵派”的顶牛，因为伏罗希洛夫断言“坦克大军是遥远的未来的事，目前用不着组建”，一来二去，势同水火。图哈切夫斯基跟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商量后，直接向政府提出：伏罗希洛夫不称职，应予撤换。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伏罗希洛夫对他的指责，从前些年说是“托洛茨基提拔”

的爱将，升级为“违法恐怖活动和叛国阴谋”了。这是图哈切夫斯基被害的国内背景，即他与“骑兵派”之间的斗争。

此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国际背景。过去流传的多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的说法：希特勒授意德国间谍机关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勾结德国将军的文件，然后故意让它落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出于好意向斯大林通报，而斯大林把假情报信以为真，下令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

据我国的苏联历史研究者徐克琬先生告诉我们：苏联解体后，原内务部档案曝光，发现这跟捷克总统没有关系。所谓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政变和充当间谍的情报，乃是“出口转内销”。简单地说，是苏联内务部特工部门，为了打进国外流亡组织“全俄军人大同盟”，并且迷惑外国间谍机关，早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精心策划了一场“秘密游戏”，编造说，苏联国内有一个秘密组织——俄罗斯中央保皇联合会，由在红军中服役的许多旧军官组成，包括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在内，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并有能力领导全俄反苏势力推翻它。为什么指名道姓利用图哈切夫斯基的名义呢？因为他祖先世代是沙俄近卫骑兵团军官，他本人在革命前的军队中还获得过沙皇颁发的勋章；以他为“诱饵”，可以增加假情报的迷惑力，使国外的白俄势力容易相信。其实，内务部的这一“创意”，也曲折反映了苏联党内军内对于来自旧军队的军官的不信任感。

这个“秘密游戏”自然只有内务部门极少数人知情。他们抛出的假情报，经过白俄流亡组织转告所在国的情报部门，又为一些新闻媒体获悉。一时，所谓图哈切夫斯基勾结德国，图谋政变之说，在柏林等地甚嚣尘上。苏联情报部门、驻德使馆

和记者，纷纷把这些情况报告国内。现已解密的斯大林私人收藏档案中，涉及图哈切夫斯基的，除了前此被捕人员屈打成招的供词以外，还有内务部有关“总参分子案”的综合汇报，以及大量驻外人员上报的外国报刊资料。这些成为斯大林下决心逮捕图哈切夫斯基的重要依据；不过，据说直到下逮捕令的前一周，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当间谍的情报也并不完全相信，促使他最后下决心以“托派军事阴谋集团”起诉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还是“反托”斗争和党内军内斗争的需要。

随之大开杀戒。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妻子和兄弟，跟他一起被捕，也都被枪毙（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关进了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杀戒一开，人人自危，怀疑一切，告密成风。在军队里，凡是曾经与托洛茨基有过接触、与图哈切夫斯基关系较好和对伏罗希洛夫不满的人，全都在劫难逃。这次大清洗，使 35000 多名军官成为牺牲品。其中包括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85 名委员中的 75 名，5 名元帅中的 3 名，15 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3 名；还有 85 名军长中的 57 名，196 名师长中的 110 名，406 名旅长中的 220 名。11 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军、空军总司令及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及其继任者全被处死。上校以下军官被杀的多达 3 万人。捎带说一句，这么多被处决的人当中，经最高当局授意的不到 1/10，属于自下而上的加码，有的是刑讯逼供乱咬出来，有的是由于告密，原因多种，挟嫌的有之，嫉妒的有之，眼红别人老婆漂亮的亦有之；谁说苏联搞大清洗只靠专门机关，它也有群众基础。

结果，希特勒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说：“苏军不堪一击了，他们没有统帅了。”于是加速了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进程。到 1941 年夏天德军入侵时，苏军指挥官近

3/4 任职不到一年，面对德国大规模机械化兵团的闪电战，几乎不知所措，被动挨打，大片国土被占，大批部队受损。时任西北方面军司令的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一线，不去发挥自己拥有的火炮优势组织有效的防御，一味热衷于组建只有猎枪、长矛和匕首的工人大队，以致这座名城险些沦陷。历史证明当时图哈切夫斯基要求撤换伏罗希洛夫的意见是有远见的。而在1957年初苏联总检察院决定撤销当年特别军事法庭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案的判决，苏共中央决定恢复此案中图哈切夫斯基等八人的政治名誉时，伏罗希洛夫还大发雷霆，坚决反对。

就在那年4月，正是我们访苏期间，伏罗希洛夫一行在中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毛泽东陪同这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乘车过街，途为之塞。老诗人田汉显然是出自真诚地写了长篇古风，歌颂“伏老不伏老，泽东真泽东”。这也不奇怪，当时谁能知道这个貌似忠厚的老头手上沾着自己同志和部下的鲜血呢？我记得一首颂扬《我们的伏罗希洛夫》的长歌：

联队光荣地骑着马过草原，  
白天黑夜跨过山和谷，  
我们的原野遍地开满鲜花，  
骑兵在歌唱我们的国家……

这是一首合唱曲，我不止一次听过也唱过。假如我们身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也会在诗人和作曲家的带领下，跟着“第一骑兵集团军”的统帅伏罗希洛夫，去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现代化”吗？

这座莫斯科河边的滨河街公寓，多年来被人们看作一所凶

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让一些“新贵”看中，一经豪华装修，身价立时见涨。乔迁来此的，显然都早成了“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但掌中有权有钱有产有物，还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信能避免厄运上身吧。

## 新贵和“老贵”

斯大林的阴影，对今天中年以下的俄罗斯人来说，似乎已经不成其为阴影。他们面对的是新的生活，新的矛盾。经过卢比扬卡监狱所在的广场，不会像过来人似的心有余悸，他们笑谈，听说克格勃机关大楼地下还有十几层秘密建筑：是真事，还是传言？

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巡礼市容的时候，就听人亲切地说起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他是在莫斯科上学、结婚、走上仕途的，人们对他知根知底，如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因在禁止游泳的莫斯科河里游泳，结果就那么赤身裸体地被抓到载重一吨半的警车上“游街”。当然，更主要的是他在市长任内作出的实绩，口碑不错，连选连任。俄罗斯人现在有了对政府负责官员以至国家领导人的选择权，不同于什么都以百分之百全票通过的“萨达姆模式”了；莫斯科市民不会滥投自己神圣的一票。

在各阶层的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和新贵之间，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不同收入的人们之间，依照宪法的原则协调社会关系，这是今天俄罗斯领导层所面对的课题。

关于“新贵”（据说在俄语中原是“新俄罗斯人”），到底指的哪些人，他们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以至怎样形成一个社会



群落的来历，不是我们蜻蜓点水的游客能弄清的。不知道俄罗斯有没有全面的调查报告，请我们的译者们介绍过来？

据译者国仁先生介绍，现在俄罗斯的新贵中流行一种时尚，就是拥有一套苏联时期高官政要的旧居。这样看，所谓新贵，不像我们中国语文里有“富”“贵”之分，因而单指弹冠相庆的新官，而似乎更近于我们所说的“大款”；即使其中有些是苏联时期的党政官员，但显然不是位居要津者。而他们热衷的除了显示自己拥有的财富以外，潜意识里怕也还要跟“老贵”们攀比或较量一下，殆亦石崇砸珊瑚树之流亚乎？

正如我们这里房地产开发走红一样，那边地平线上也冒出了大量的房产公司。一家本尼兰房产公司交易过一套库图佐夫大街上的公寓，就因为它是前苏共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旧居，房价就从40万美元一直叫到了数百万美元。而最近，一套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旧居已卖到了150万美元的天价。这套260平方米的住宅位于克里姆林宫和国防部之间的罗曼诺夫街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元帅区”。这位元帅，自然是在苏联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名元帅后登上帅位的了。冷战时期过来人都知道罗科索夫斯基的鼎鼎大名，1949年他被斯大林派到波兰当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元帅还是个多情种子，当年看上了作家、诗人西蒙诺夫的女演员的妻子，那时西蒙诺夫年轻位卑，战争开始后，随军上了前线，还写下一往情深的诗句：

等待着 我吧，我会回来的……  
当别人都已经不再等待的时候，  
是你的等待，拯救了我的生命。

这首诗，也像歌曲《喀秋莎》那样，传遍前方和后方。受到鼓舞的卫国战士们，也许就在诗歌转告他们的，他们深信不疑的爱人的等待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可那位同样还属少壮的罗科索夫斯基，也是痴情的，他竟能在每天下班后固定的时间，开车到西蒙诺夫家的楼下，凝望着那个固定的窗口。这也太无顾忌了，终于被无所不知的斯大林批评一顿，外派出去。这是研究苏俄文学的蓝英年先生告诉我们的。

在感情游戏中受伤最重的往往是女主角。西蒙诺夫的妻子瓦莲京娜·谢罗娃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后，又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过早地离开人世。诗人和元帅也都逝去。元帅的故居换了新主人。

健在的政要如叶利钦，1985年他调往莫斯科前担任州长时，在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小区住过一套五居室住宅，本来早已转手，2003年6月又由一家名为“艾斯托莫思罗科普”的房产经纪公司在网上求售。按市价每平方米大概应在1000美元上下，但因为跟叶利钦的名字联系起来，虽标榜“特价转让”，房价仍可能大大飙升。因为新的富豪们渴望拥有苏共或克格勃高官的旧居作“纪念品”，这就成为卖点。不过，这样的“纪念品”，到底要纪念什么呢？

叶利钦在他总统生涯画句号前，还没有得到对他的亲属不予追究的保证时，就在1997年以484号总统令规定：所有俄罗斯国家公务员，都有义务接受大众传媒的质询，向人民公布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

且看政府成员们2002年个人财产的数据吧（小数点后一

般保留一位数,余从略;又,人民币1元约合4卢布,1美元约合30卢布)。

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97.9万卢布(工资和俄银行存款利息);另称私人账户上有240万卢布(其中大约有他卖掉私宅所得的224万卢布),3.3万美元;2002年时只剩有一个18平方米的车库(因他在任总理一年前就将私人的一辆“尼桑-马克西姆”小轿车卖掉了);不过,进入2003年度,他有了一套90平方米的别墅和位于卡卢加州的600多平方米土地。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109.8万卢布;另有信用卡两个,一存4万卢布,一存外汇折合6.3万卢布;无有价证券,无私人住宅,无郊外房产(住市内公房,面积近200平方米)。

副总理加林娜·卡列洛娃(现负责社会事务,以下为原任社会发展部第一副部长时年薪):20.6万卢布;无私人住宅;另有作为副教授开课的副业收入5.5万卢布;有一辆新式9型日古利“拉达”小轿车。

原副总理伊利亚·克列巴诺夫(降为工业和科技部部长,工资高了一倍):42万卢布;银行存款利息44.9万卢布;在圣彼得堡有一套面积219.9平方米的住宅,在莫斯科州有一套面积210平方米、占地5800平方米的郊区房产;另据其本人申报,出售一家企业股份得300多万卢布,出售一座别墅得14万卢布。

副总理维克多·赫里斯坚科(负责国家能源事务,久居白宫):38.5万卢布;因经常到国内各地考察的出差补助共32万卢布;在莫斯科无私人住宅,但在车里雅宾斯克州有一所157平方米的住房和2300平方米的园地。

副总理兼农业部长阿列克谢·戈尔杰耶夫：39.4 万卢布；有一套 150 平方米的住宅；另有科研活动收入 1.9 万卢布；有一辆新式 9 型日古利“拉达”小轿车。

新任副总理的鲍里斯·阿廖申(接替克列巴诺夫)：18.42 万卢布(月薪 1.53 万卢布)；另有从事师范教育的收入 2.18 万卢布；无私人住宅。

新任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年薪 35.69 万卢布；在莫斯科市无私人住宅；在莫斯科州有一套别墅，在列宁格勒州有一个花园；另有一辆德产“大众”牌小轿车。

新任能源部部长伊戈尔·优素福：年薪 22.68 万卢布(他两年前的年薪是 18.86 万卢布，由此可见官员薪金的涨幅)；在莫斯科有一套面积 171 平方米的四室住宅，还有一套面积 645 平方米的位于莫斯科广场附近的住宅；另有一个空车库。

据研究者赵景林说，从俄罗斯高官的财经情况申报看，在特别多变的 2002 年，大多数国家执政者的不动产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个人收入在大幅度增加。我的所见也浅，只看出凡有公车可坐的，多半就不备私车了。

但在莫斯科，却有一位市民，连连庆幸自己在苏联解体前夕买了一辆小轿车，起到了保值的作用。这位今天的普通市民，就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吉里连科。据高秋福先生介绍，吉里连科昔日的月薪是 1000 卢布，按当时的官方比价，约合 1300 美元。苏联解体前夕，吉里连科有 1 万多卢布的积蓄，他花 10700 卢布买了辆国产轿车，至今还在使用。1 万卢布在今天，只合 300 多美元，不要说买轿车，连个大部件也买不来。“当时如果不是买下这辆车，那 1 万多卢布，只是一堆废纸了。”他不无自豪地说，“这完全归功于我的夫人。当时，

政府给我配备有专车，我不想自己买车。可是，夫人认为，物价不断上涨，存钱不保险，还是置办点东西好。听了她的，买了车。这真应了俄罗斯的古话：最聪明的办法是让女人掌权。”

这位夫人预见到货币贬值，却无从预测到党和政权忽焉瓦解。1990年代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发放退休金，只承认政府内的职务，不承认任何政党——包括苏共执政时期的苏共党内职务。昔日苏联政府的高官仍然可以享受比较优厚的退休金，也算是一种赎买吧。吉里连科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职级，显然在政府部长之上。但他一直干的是党务，没在政府内任职，就只能按一般职工的标准领取养老金了。现在吉里连科夫妇俩每人每月的养老金是500卢布(折合25美元左右)，在莫斯科生活贫困线(人均每月800卢布)以下。不过吉里连科在企业家协会“打工”，每月可以有1500卢布的收入，用他的话说“勉强糊口”。

今天的俄罗斯，退休的老人，“打工”以补养老金之不足的，到处都是。教师和律师的本职工资都比较低，但有第二职业甚至第三、第四、第五职业的收入贴补。这里说到吉里连科，只是因为他过去身属高层，今天与平民为伍，生活状况反差悬殊就是了。

也曾听说，现在俄罗斯政界和商界的活跃分子，除了年轻人外，上点岁数的，多半还是苏联时期各级有从政经验的人。他们或继续走仕途，或幡然下海经商，“懂国情”，有“关系”，这是区别于原先的“局外人”的优势。

## 吃和住

而莫斯科的普通居民，今天一般的生活怎么样呢？

假如在 1957 年的采访中提出这个问题，马上会有人拿来大堆的数字，并且领我们去看这样那样周密安排的样板。

但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政治笑话，说苏联时期的一个导游对游客介绍说：“相信到了 2000 年，莫斯科一半居民将拥有自己的飞机。”游客问：“他们要私人飞机干什么？”导游答：“这还不简单，比如你听说列宁格勒哪天有大量面包卖，就开飞机抢先去排队嘛。”

莫斯科人排队秩序好，不加塞儿，既是社会公德水平高，也得归功于训练有素。早在二战之前，捷克《红色权利报》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就写文章为苏联的排队现象辩护。购物需要排队，无论如何是物资匮乏的表现，硬要从这里看出前途光明的无限生机，怎么也是一种矫情。这大概可算伏契克的败笔。后来他英勇牺牲在纳粹集中营里，留下铁骨铮铮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而崇高的精神境界，不愧为反法西斯的英雄。几十年来为我所敬仰。这里重提他一篇旧文，只想说明上个世纪以“红色 30 年代”为标志的一个现象：不少渴望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惑于某些假象，天真地甚至盲目地说了一些关于苏联的过头的好话。

不过，这一回就我目测，莫斯科终于不必为买饮食和日用品而大排长队了。

诚然，民以食为天，能不能吃饱是首要的问题。1998 年一夜之间，又一次卢布贬值，加上银行倒闭，无数家庭突然

变成一无所有。学中文的古丽亚正从天津南开大学进修回来，一时非常后悔没留在中国工作。她妈妈在远东那个我们习称为赤塔的城市，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这时劝她说，窖里还有自留地收的土豆，够娘儿俩吃的，邻居又送来一些黄瓜，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关。现在她的户口还在老家，人回到母校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旅游专业教课。她对普京这几年的政绩，评价颇高，对现任总统寄托着信任和期望，看得出是由衷的，不是套话。

就在我离开莫斯科的9月4日，消息传来，俄罗斯自1997年以来，物价第一次停止上涨；差不多同时，莫斯科市政府决定把最低工资从1500卢布提高到1800卢布（从业人员占莫斯科人口30%的小型商业户也在内）。据说在俄罗斯有1/10的居民，人均月收入低于2000卢布；而在莫斯科，人均月收入低于2000卢布的人，根本感受不到生活的改善——因为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增速。现在把工资提高和物价不涨两条消息放在一起，才是叫人快慰的。

在莫斯科有一个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其首席专家伊戈尔·波利亚科夫说，收入的增长暂时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的，基本上是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也就是人均月收入在2000卢布以上的那部分人。而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中，今年第一季度销售的奶酪和香肠，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左右，这是好现象。

又听说，从今年2月和4月起，全俄退休金的基础部分和保险部分，分别上调了6%和12%；这一来，跟去年比，退休金的数额上涨了146卢布。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俄联邦副总理加林娜·卡列洛娃说，俄

罗斯上半年的平均工资达到 5600 卢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工资的增长，“这一趋势表明俄罗斯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她举出一串数字，这里只引用两个：在莫斯科市食不果腹的人减少了一半，在其他地区减少了近 34%。在这里没看到绝对数字，但我以为她把正面负面的情况都讲了，不是一味鼓吹“辉煌成就”、“大好形势”，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可信。

在莫斯科，据说市民人均实际月收入（不是工资，而包括本职之外的收入，不少人另打一两份工）达到 400 美元；告诉我们这个数字的非官方朋友说，自然，这是在“首善之区”，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略低于莫斯科，全国远不是都能达到这个水平，还有很低的。我以为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介绍。

我上次来莫斯科，除了排队以外，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住”的问题相当紧张。曾经安排我们参观一位老工人的新居，全家都上班上学了，只留下老工人自己接待来访，室内倒也窗明几净，家具全新，但一家老小，怎么没有一张床呢？原来或睡沙发，或索性睡在地板上。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一批公房，当时也还是可解燃眉之急的，今天看来的确落后了。

在莫斯科，以至圣彼得堡，都像中国一样，正在大兴土木盖新房。

据林莹、刘国宏两位说，最近的一次社会调查结果表明，近两年俄罗斯的富人数增加了一倍半，外地也并不逊于首都。这样说的实证之一是，两年前，能够轻而易举买下住房、别墅的莫斯科人不足 1%，如今这样的人已经达到 3%了。

但另一个数字告诉我们，工资只够吃穿的人，在俄罗斯大约占 38.3%。他们自然是顾不上买房置业的。许多老公房，类



似我们的“筒子楼”，尽管分单元，卫生间却是公用的，由于聚居的人口密度大，自有诸多不便。住户们渴望这个问题的解决，看来“房源”不成问题了，怎么去找“财源”呢？这38.3%的人怎么能逐渐向那3%的人靠近，恐怕还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

当我听着、想着这些的时候，总觉得事情的态势，人们的情绪，跟我们国内很有几分相似。也许都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而大刀阔斧破旧立新不惜牺牲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为时太长了，深入到整个社会机制和人们灵魂的肌理中去了，要改变它，真正建立规范有序的好的市场经济，就像要把一锅夹生饭重新煮熟一样，既要有时间，又得讲火候。搞不好，是不是就会从积重难返流于“拉(丁)美(洲)化”呢。

然而，不管是凭我良好的愿望，还是凭我短暂旅行中浮光掠影的感觉，我确定地看到，俄罗斯，这个像我们中国一样曾经苦难深重的民族，正坚忍地在新的路上一步一步走着。它有堪称雄厚的综合国力基础，又有基于教育普及的国民文化素质，说不定在哪一天，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飞跃出现在世人眼前。

至于莫斯科人的精神生活，那就不是我在浮光掠影短暂的旅行中所能窥见的了。

## 红场上的祝福

要告别俄罗斯的时候，我又一次彳亍在红场上。望着缀了红星的克里姆林宫塔顶，我忽然发现它又像王冠，又像僧帽。

红场之“红”(Красная),在俄文里和美丽是同一个字,车尔尼雪夫斯基解释“美在生活”,就举了农妇脸上健康的红颜色作例子。远在沙皇统治的时代,这片广场就叫红场了,那当然不是像后来那样,因革命所系的血与火都是红的,便把“红”当作革命的颜色。红场的本义,与克里姆林宫塔顶的红星不同。

中国诗人艾青,1950年来到这里,写了《宝石的红星》,是把它当作革命的象征:“让红星照耀得更远更远,照耀到每个黑暗的地方——”,亦即诗前所引莫洛托夫说的,“远射到我们的国境之外……”

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建成,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它顶上的每一颗红星,夜夜在高空闪耀着红色的光芒,其直径达3.5米,却是在开始大清洗的1937年才吊装上去的。1936年刚刚迎来了以斯大林命名的宪法,转过年来遭到逮捕和杀害的人们,看到过这闪闪的红星么?如果看到过,他们受刑后在黑暗的牢房里会想到它吗,如果想到,又会怎样理解它的意义?

可惜无从问讯了。

环视这个世界有名的红场,给我的感觉,用中国古老的套话说,是风景依稀似昔年,不但克里姆林宫城郭依旧,对面简称“古姆”的大百货商场百年老楼也还是老样子,红场周遭没有增添任何高楼大厦现代建筑物,就如圣彼得堡恪守旧规,所有建筑都不超过冬宫33米的高度,留出了大家熟悉的背衬蓝天的风景线。我在这里找回了1957年初来的感觉,只是红场上信步觅食的鸽子似乎少了。

我又望见了克里姆林宫那个列宁办公室的窗户。那年我参观时,室内是按原样布置的,写字台、电话机、地图都是旧

物，不像诺夫格罗德(下新城，当时改名高尔基城)的高尔基童年故居——他的外祖父家，是在拍影片《我的童年》时比照原状放大重“搭”的。那时还参观过列宁避居拉兹里夫湖边的草棚，他写《国家与革命》的地方，一切都跟同一题材的一幅油画一样，谁抄谁很难说，自然也是“布景”，但我们一样毕恭毕敬地瞻仰。我们就像那时和其后许多苏联人一样，对斯大林失望了，把原来分给了斯大林的那一半尊重和热爱收回，重又献给了列宁。典型的心理是设想如果有列宁在，后来的所有悲剧都不会发生了，典型的一句痛彻心肺而有余不尽的话是：“如果列宁还活着！……”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48年呼吁和平的长诗《让那伐木者醒来》，写斯大林办公室窗口的灯光彻夜不息，我也曾为之深深感动过。那个办公室肯定会亮着灯的，因为斯大林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但他会不会不加窗幔，让外面的人看到那灯光人影，还是问题，因为斯大林戒备多疑，他的办公室在哪儿，只有少数人知道，这种诡秘，确实胜过列宁多多了。

学者高放教授说，俄罗斯从1497年中央集权的农奴制建立，500年来，其社会发展经历了农奴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始终贯彻军事扩张性和封建专制性这样两位一体的主线。

这一回，在俄罗斯游览了许多有三几百年历史的宫殿和教堂，比上回翻了几番。那时候的接待，突出政治，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之外，多让我们看一些革命历史的遗存，如在克里姆林宫主要是看“第27号哨位”守护的列宁办公室，在冬宫则主要是看艾尔米达什博物馆里的藏画，但不限于当代，也总算是文物和古迹了。当时，像沙皇夏宫这些景点在战争中严重

破坏，还来不及修复；而各地教堂早已从上个世纪30年代大清洗后就都破败或移作它用，那时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以东正教为主的教会，遭遇了十月革命后又一次的也是毁灭性的冲击。这回我到北纬62度的基日岛上，看到了完全木结构的教堂，还有教士住的木楼，一打听，那里的最后一位教士，也是在1937年杀死的。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在国内外走访所谓古迹时发现，历代统治者内部争权夺位，剑拔弩张，“君不君，臣不臣”，以至弑父杀子，你死我活，乃是这个历史——文明史的核心。在俄罗斯自伊凡雷帝起，宫廷相斫，同样是史不绝书。从京城莫斯科到伏尔加河边小镇乌格里奇，都有所谓“喋血教堂”，铭刻着一代代皇家喋血旧事。一代代沙皇，也有窝囊的，止于昏庸荒淫，倒是为害小些，而凡在史书上轰轰烈烈的，无不专横强梁，阴险残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伏尔加河，在乌格里奇发现有10米高的城墙，命令立刻拆掉：不许有第二座“克里姆林”！比起她杀夫废子的作为来，这点霸道就是小菜一碟了。

彼得大帝，在俄罗斯人心目中，自是一代英主，“青铜骑士”。他拓土开疆，雄谋远略，使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至今为俄罗斯人尊崇称颂。但我以为，他对外也正是高放所指的沙皇政权的军事扩张性的代表人物。

在冬宫里，耳目所及，装了一脑袋攻城掠地和宫闱秘辛，却都有籍可考，不是随便的戏说。但也正像国内电视里连篇累牍的皇帝戏一样，让人不耐烦了。这时候，蓦地看到一幅中国织锦画，不由得眼前一亮。据说沙皇俄国在300年前就艳羨中

国的青花瓷，向中国讨教制瓷的技术。中国的官方文书不客气地拒绝了，或许是出于保护专利的考虑？但十分微妙的是，大清国皇帝却赠送给俄国沙皇一幅织锦，仔细看去，竟是制作瓷器的一整套工艺流程的散点长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此事出于哪一臣工，岂不有里通外国之嫌？怎么皇帝就可以私相授受呢？在冬宫里一走而过，来不及深究。这件馈赠不知道《清实录》有无记载。中国的臣民向来只是服从皇家的管束，却管不到皇家头上的。

中俄两国都有民族主义的传统。不过也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以为做外国人的奴隶，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俄国的民族主义，可就是要叫别国人做自己的奴隶了。列宁不止一次批判过大俄罗斯主义。但是，他关于废除沙俄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许诺迄未兑现；名为列宁继承者的斯大林，在多民族的国度，始于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毕其一生，他在苏联国内怎样处理民族问题且不说他了，在国际上，却总是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大行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之实，即在共产党的党际关系上，也是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号令其他各党，哪里是兄弟党，从来就是要当老子党。

不过，斯大林时代，毕竟成为历史了。

在结束了红色帝国的时候，人们把目光转向久远的过去。

1918年的5月，在乌拉尔山下的叶卡捷琳堡，一阵乱枪，把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就已退位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全家处决了。

在强调与传统观念(包括人道主义)彻底决裂的年代，这一切是顺理成章的，理所当然的。但在70多年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开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思，于是有了寻找和发掘沙

皇一家遗骨的事，甚至有了就地正式下葬，抑或移柩圣彼得堡之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圣彼得堡的喀山教堂里，已经立这位末代沙皇为“贤人”（再高一级便是东正教里的“圣人”了），据说理由是他“热爱自己的家庭”，这无可厚非，在追怀逝者的同时，也勉可当作一种劝善之举吧，作为宗教行为，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当我听说这位末代沙皇也有他的艳史时，越俎代庖替教会设想如何自圆其说，不免“浮想联翩”，以为此举不失为郑重其事的幽默了。

故意的搞笑，不能给人以幽默感。幽默的主体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逻辑办事。我们在圣彼得堡夏宫，遇见五七个人组成的小乐队，以铜管乐迎宾。见着我们一拨人，知道是北京来的，立即吹奏中国国歌。我们很高兴地投币为礼。走过没有50米，忽听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旋律，回头一看，原来是又一群来自台湾的游客进园了。我和文秀小时上学都唱过这首原是国民党党歌的《中华民国国歌》，此时此地听到它，不免惊诧于小乐队的反应之灵敏，变化之快捷，颇感幽默。再一想这是“有偿服务”，不足为奇。“市场化”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政治化”？但这样的事情，在莫斯科红场没有发生，这毕竟还是个政治色彩浓重的地方。在红场列宁墓的上方，克里姆林宫主楼一面蓝白红的俄罗斯国旗之下，普京办公室敞亮的窗户可以俯瞰整个红场，连同对面的“古姆”商场老楼。

普京继叶利钦任总统三年了吧，他所表现出的活力不仅是从年龄和健康的优势而来，现在信任度是较高的；而且听说俄罗斯共产党（自然已不是苏联时期的共产党）党员中，有不少“跳槽”归附到了普京的统一党的旗下，该是从普京身上看到了希望吧，其中多少人是为了某种政治理想，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

还有多少人只是为了想聊附骥尾以求飞黄腾达？局外人说不好，我这里不过是以中国人之心(!?)度俄国人之腹罢了。

年轻人表达对普京的好感，有的简单说因为他喜欢打球、游泳。这很像在一些自由主义国家就总统候选人进行民意调查时得到的率真的答案，倒也解释了普京的活力的一个方面，却颇有点“非政治化”的味道了。然而，在跟一些人特别是年长者的接触中，我隐隐感到，普京和他的选民心气相通的地方，除了以务实的态度改善经济以外，就是他在国际事务中力求恢复大国影响，在独联体内致力于同几个大国(白俄罗斯、哈萨克以至乌克兰)结成更密切的关系，这符合俄罗斯人传统的雄心勃勃的国家意识和潜意识。

元人小令有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兴也，不说了；其“亡”也，就是苏共和苏联政权之结束，如何评价，且交给历史；而这个大变动造成了社会转型的大阵痛，却是分明地落到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幸好，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阵痛已经或正在过去。

我站在红场一角，祝福此行所遇的人们，祝福生活在广袤俄罗斯大地上的几代人。他们属于一个跟我们一样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为了生活得好曾同样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们理应得到世世代代期望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

从“宏大叙事”回过头来，再罗嗦几句不那么“宏大”的话。莫斯科的一位导游姑娘，诚恳地说，她有工资，有小费，这就够了，因此她没必要像中国有些导游那样，把大家拉到这个店那个店，从中收取回扣；她甚至指给我们，哪家商店的东西贵，同样的商品在别的店里卖得便宜，我们亲自证实了。逛街逛商店时我想，刚刚进入市场经济，背负着因袭重担的人们

还有很多不适应之处，但我感到俄罗斯人一般还没学会偷工减料，没学会假冒伪劣，我希望我们贵国的行商走贩以至旅游者们，不要拿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把他们带坏了，污染了，我不知道这想法是不是太幼稚太天真？

2003年10月15日



## 新春漫笔

美国出兵伊拉克，转眼快一周年了。

当时美国声称要抓萨达姆；国际上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支声音，就是抨击美国搞霸权主义。

美国抓住了萨达姆；这支声音弱了下来，有的转而向美国示好，当然也许是为了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也许是承认并接受既成的事实。

只有在美国国内，除去为了竞选的言论不计，一直有一支民间社会的力量，仍然坚持不懈地对布什政府的决策持批评态度甚至有点揪住不放的样子。

这在今天，可谓算后账了。

而在战争进行期间(须知那是战时啊)，参众两院的议员也好，街头游行的群众也好，不少人那么肆无忌惮地反对出兵，干扰政府的决策于前，破坏战时后方的社会稳定于后，不顾大局，不顾影响，不仅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还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从总体到细节批评政府甚至指责布什总统，这不是长伊拉

克的志气，灭美国的威风吗？这些美国人的爱国心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美国的“公检法”如此软弱无力，对这些涉嫌对抗既定国策、破坏国家安全（还有例如泄露了“情报可能不准确”这类重大国家机密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是从快从严加以打击，反而任其混淆视听、进行煽动呢？为什么以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竟也无视其司法部门的失职呢？这就是美国在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我只读过三年英语，且都已还给老师了。至今只能以中国之心度美国之腹。因此搞不懂：如人们所说，美国要在全球称霸，为什么对国内的一小撮反对派，却一点霸气也没有？也许真如国内一些报纸报道过的，某一位或某几位美总统的案头放着毛泽东的大作，经常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也许他们真的学会了区别两类矛盾，而认为那些人的反战是“认识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没忙着把他们打成“里通外国”或“卖国主义”吧？

2004年1月30日

## 你爱唱《国际歌》吗

听说某地某部门传出一条禁令，不让唱《国际歌》了。  
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爱说，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  
不让唱《国际歌》，这该是谣言吧？

列宁写过《纪念鲍狄埃》，鲍狄埃是《国际歌》歌词作者、巴黎公社社员。列宁说，一个无产者，无论被命运抛到天涯还是海角，都可以凭着《国际歌》找到自己的同志。

我相信列宁的话。我出生于1933年，那时《国际歌》早已流传到中国，当时的革命者一般唱的是瞿秋白从俄文译过来的歌词。有些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包括瞿秋白本人在内，在刑场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

我在1940年代学会唱这首歌，也是早期的译词，与后来规范的译文不尽一致。例如开头两句，后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原来译为：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又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原来译为：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是全世界的主人！

当时每一唱这首歌，都几乎有泪盈眶，满怀着悲壮感，就像小时候吟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无辜的“罪人”，这不是一般的受苦受累，而且有极大的冤屈不平；被视为“一钱不值”，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而且是精神上遭到践踏：这样唱着，我便与全世界受压迫受盘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并且是跟全世界的奴隶和罪人一起，从沉默中发出吼声。

我相信，原先的译文，如果不是更传神的译笔，也是心有灵犀引申了原词的精神。我也相信，作为共产党人的田汉，在写《义勇军进行曲》（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心中必定默念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不过，当年在入党宣誓仪式、党员大会和其他庄严隆重的群众集会上唱这首歌，往往只唱第一节。其实译词共有三节，在上世纪5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颁发的定稿，也是这样。我读沈宝基译《巴黎公社诗选》，才知道原诗共有五节。随

着阅历的增长，历史感也加强了，对于这首不朽的歌诗，体会到更多的内涵，不仅是“要消灭那些毒蛇猛兽”，“哪能容得寄生虫”，而且“思想要冲破牢笼”，思想不摆脱奴隶主义束缚，就永远只能是奴隶。

这是一首辉耀着 100 多年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精神的歌，这是一首熔铸着共产主义政党宗旨和价值观的歌，这是号召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奋斗的歌。它早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标志性歌曲。

这首歌，如果真像传言所说，竟为某些擅作威福的官员所禁止，而且禁止的理由，竟是它“过时了”以至“有煽动性”云云，岂不是数典忘祖？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传言，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么，我们就还可以唱《国际歌》，不愿唱它的人有不唱的自由，但有人愿意在《国际歌》声中重温革命传统和向往美好明天，这一份自由也不该被剥夺吧。

2004 年 3 月 11 日

## 无题有感

2003年是苏联共产党诞生100周年纪念年。整整一年仿佛没有听人提起。偌大世界上，又有几人想起来？

我是读了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政治学教师发表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见《社会科学报》)，才记起来的。论者提出“党内民主是执政党的生命线”，认为苏共亡党的多方面原因中，主要是没有实行党内民主。他说，党内民主体现为全体党员享有“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对这个问题我很生疏，不能判断此论是否准确周全，但我想总归不失为一家之言。

似乎在一年多以前，听说党刊《求是》刊登一篇讲党内民主的文章。我的朋友中没有订阅这份刊物的，没借到，也就无从拜读。

我想，如果苏共确因没有实行党内民主而亡党，那是应该引为鉴戒的；即使苏共并不是因此而失败，或说这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妨碍我们实行党内民主。

但我看了这“四权”，其实不仅是党内民主的内容，该也是整个国内政治生活应有的民主的内容。那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从原则到细部，从思想到组织，谈何容易？

我也不知从何谈起。不过，我忽然想到，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切入的。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还知有经济民主之说，例如在军队中，从按月公布“伙食尾子”，到士兵代表协助（不是超越）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等等。

党内民主，是不是可以先从经济民主着手？

当然不是帮助支部书记管伙食。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总要有有关政府部门作预决算的报告。不管怎么样，这是从周恩来当总理的时代起行之多年，形成制度的一项议程了。

但据我所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由党委向大会报告本届任内对党费收支、党产经营的管理情况。在这方面，是不是忽略了党员（通过党代会代表）所应享有的知情权？

也许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是不是曾有哪次党代会上作过这方面的报告，尊重了大会代表以至普通党员在这方面的知情权，体现了党内的经济民主呢？我不知道。至少在党报上没有读到过，党代会代表在会后也没传达过。我不知情。

半个世纪以来，我只记得支部有几次，应该也是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让党员自主买些书，从支部党费中报销。此外，党内发过一些公开发行的学习文件，该是用党费买的。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党费开支，不会仅限于这样的两项吧？

“没有公开性而谈党内民主是可笑的。”此语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31~132页。

2004年3月12日

## 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

——夜读抄

他们是在断头台上被斩首处死的。真真正正的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为世界上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死的。

看着他们炽热殷红的鲜血在阳光中一路洒满历史，41岁的我眼中溅满了1943年的泪。

2月22日，那是个春天触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还远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

这是《永远的白玫瑰》篇末激情的诉说。原作刊于《当代》2004年第3期，作者虎头，是北京的一位德语副教授，在这里叙述的是他不曾亲历的往事。往事并不遥远，距今61年，在纳粹统治的德国。

那“为我们而死的”是一对年轻的兄妹：舒和家的汉斯和索菲。从来没有听说过，作者也是去冬旅居柏林时才知道的。



2003年11月28日，德国电视二台(ZDF)的专题节目“德意志俊杰”，评选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十大名人。当场由观众电话评选(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给同一个人投两票)。

结果，在只有9000万左右人口的德国，舒和兄妹得了500万张票；按得票数排名第四。当选的前三名是：一手领导了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一手创建了在全球拥有7亿信徒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一手奠定了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伟人马克思。

在舒和兄妹——汉斯、索菲之后，依次是：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的代表)，巴赫(创立了辉煌赋格王朝的乐坛领袖)，歌德(无论按什么划分都是当仁不让的世界文豪)，约翰内斯·古丁堡(被视为德国现代印刷术发明者)，俾斯麦(德国历史上首次统一全国的普鲁士帝国铁血宰相)，爱因斯坦(公认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科学奇才)。

兄妹二人都是慕尼黑大学学生：哥哥学医，妹妹学生物与哲学。

哥哥死时24岁，妹妹死时22岁。

他们是在1943年2月22日被处决的。

索菲在临刑之夜睡得很香，她被叫醒的时候，坐在监铺上讲她刚做完一个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去做洗礼。婴儿穿着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通过一座险峻的山。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在身边放下，就坠入了深渊。”她向同监号的犯人解释自己的梦，“那个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他成长。我们是他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他成人之

前死去。”

下午4~5点，在慕尼黑的斯塔德海姆的盖世太保监狱执行对她们兄妹的死刑。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明显地瘦了，但步履庄重，越过隔离线和父亲拥抱，和每个人握手，嘱咐问候所有的朋友，最后说到一个姑娘的名字，一滴泪出现在他的脸上，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一样镇静。

在行刑的一刹那，汉斯高喊一声“自由万岁！”

妹妹索菲被看守带来，她腰杆挺得像标枪一样直。她满脸洒满阳光微笑着品尝家里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她说，“多么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么多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不过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加重了语气，“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妈妈再次对她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有点像下命令似地说：“还有你，妈妈。”然后她也面带微笑，无所畏惧地走了。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视死如归呢？

他们是在4天以前，2月18日被捕的。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这个美丽而弱小的女孩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也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

岱尔的那句话吧，‘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冒险。’”

他们对于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早已有了精神准备。

《永远的白玫瑰》作者由此想起了中国的文天祥、谭嗣同，以及“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的渣滓洞的烈士们：“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要有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让舒和兄妹超越这种植根于基因中的(对死亡的)恐惧？”作者回答“那是信仰。——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纳粹这样的暴政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

他们与纳粹不共戴天，这种憎恨之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希特勒 1933 年上台以来的 10 年，正是他们的成长期；汉斯 15 岁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索菲 12 岁时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因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先后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佼佼者。

但戈培尔式的欺骗，能够蒙蔽人于一时，却终要在事实面前露出破绽而破产。许多纳粹的倒行逆施本来已经使汉斯对纳粹的信念开始动摇；1942 年假期，汉斯奉命去俄罗斯战线的德军野战医院实习 3 个月，横飞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使他彻底认清了纳粹的实质。

回国后，面对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还有发生在身边的一系列事件：以吉他伴奏弹唱俄罗斯和挪威民歌被禁；读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也被禁；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老师失踪……这促使他从思考中得到了一个严重的结论：沉默服从纳粹，就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思考之后，他又感到了胸中块

垒不吐不快。

汉斯决心不做“沉默的胁从犯”。于是在1942年夏，盟军大规模轰炸科隆之后，就有了亚历山大·施摩莱尔和汉斯·舒和第一次印发的传单，亮明自己的立场，反抗纳粹暴政和争取个人自由！

第二号传单揭露纳粹屠杀30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

第四号传单：“从希特勒嘴里说出的每个字都是谎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纳粹邪恶存在的人，他们远远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的背景……我们必须在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攻击它，这个最强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权力！”

这些挑战希特勒权力的年轻人，成立了自己的反法西斯小组：白玫瑰。

第六号，也是最后一期传单，是由库特·胡伯教授执笔，舒和兄妹散发的：

“‘自由与尊严！’

“10年了……（希特勒及其同伙）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在期待着我们！我们要……摧毁希特勒的暴政！”

在他们的传单中，他们甚至预言了当今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60年之后，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

1943年2月18日，从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一样的传单时，慕尼黑大学的守门人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连同他

们包里没有撒完的传单。

2月23日，舒和兄妹被押上断头台的次日，纳粹喉舌《慕尼黑新闻》幸灾乐祸地写道：“这些不知改悔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的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不知羞耻地对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

纳粹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在舒和一案中还株连了80多人。他们或是小组的中坚，或是外围，有的只不过是熟人而已。这些人都会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甚至也被处死。然而没见任何文字材料表明他们中有人反咬舒和兄妹以图减轻自己的痛苦。

《永远的白玫瑰》作者由衷地赞扬说：“这就是 *Zivil Courage* ——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在纳粹杀害舒和兄妹和他们的同志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以后的八百天，仅仅八百天，希特勒走到了他的末日。在呼唤德国人民觉醒，清算纳粹罪行，特别是在战后废墟上重建一个繁荣德国的日子里，人们会发现汉斯、索菲及其同伴们的血没有白流。

读到作者对这件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实的激越的复述和思辨时，我忽然想起鲁迅在为刘和珍跟她的年轻同学们喋血而写的一系列出离愤怒的文字。他曾这样说到死尸的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死地”》）

鲁迅这话，说了80年了。今天依然令人感到沉重，也许仅次于死尸的沉重吧。抄书至此，恍然而叹。还是请读者亲自去读《当代》上的新篇和《华盖集续编》里的旧文。

2004年5月17日

## 那遥远的磨坊

你知道我为什么忽然想起那遥远的磨坊吗？

那磨坊在德国的波茨坦，现在有许多中国游客去过，知道那是二战胜利前夕通过《波茨坦宣言》的地方，宣言确定了中国在战后的权益，至今常常被引用；人们想必还都逛了18世纪腓特烈大帝建的无忧宫，捎带着无忧宫前不远的一座老磨坊。

磨坊的故事说来也简单，19世纪时，威廉一世继承这座宫殿以后，发现前面那个磨坊碍他的眼，传话给磨坊主人，打算花钱买下来；不料(首先该是国王不料，而我们熟知君主脾气的中国人自然也不料)那磨坊主不干(似乎不是售价没谈妥，而是压根儿就不想卖)，惹恼了国王，强行拆除。不料(也该是国王不料，同时我们现代中国人也依然不料，“太出格了”)那磨坊主竟把威廉一世告上法庭。又是不料(反正我是不料，不知威廉一世料到否)法庭依法判决威廉一世把那磨坊重建起来，并赔偿磨坊主的损失。最后一个不料(光剩下我不料了)，

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竟服从法庭所判，且称赞法官的公正和胆识，说“此吾国最可喜之事也。”在我们这里要“戏说”才有的情节，100多年前在他们那儿发生了；按我们的习惯，是批判这国王故做姿态，就跟批判某国搞“假民主”似的；其实掉过头来想想，做个姿态也好嘛，看他做的是什么姿态，“假民主”未必就比真专制还残酷？如果一直把“姿态”做下去，不是就弄假成真了吗？试想，倘若威廉一世他一抹脸，没等磨坊主告状，先就把人抓起来，或在诉讼过程中给法庭打个“招呼”，判那倒霉的原告一个“不予支持”，乃至“破坏秩序”什么的，至少“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就很现成；再如果法庭竟敢违旨，那就把法庭整个换班，把法官、磨坊主，还有辩护律师(如果有的话)通通抓起来，一个也不能少！那不也是一种“姿态”吗？

这后一种姿态，并不是我仅仅按“自己”的经验设想的。威廉一世是谁？是难得的闻过就改，又懂得以法治国的“明君”吗？请注意，他就是打了一场普法战争，从外部引起巴黎公社起义的那一位普鲁士国王。

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我由那遥远的老磨坊想起了他。

对，你猜得不错，我是因为不断地不断地听到看到看到听到，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地产热”和“城市化热”当中，普通的城乡居民遭到强制拆迁，不但身外的产权得不到保障，甚至挨打挨轰，连起码的人身权利也横遭侵犯，且不少地方法院都不受理，应了诉告无门那句古话。

难道我们这里的房地产公司开发商及其下属人员，政府相应职权部门直到最基层拆迁办公室工作人员，竟还不如100多年前反动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一世遵守法律，从而表现得通情达



理吗？

我已经兜出了这个国王的老底，没有替他涂脂抹粉的意思；也不是说外国例如德国的月亮比我们中国的圆；不，圆过一次不等于老圆，过去圆过也不是后来就一定还圆。就是了。威廉一世之后，不到 100 年，德国换了希特勒执政，他把条约当成了骗人的废纸，他指使法庭公然制造冤案，他视人民生命如粪土……在他恶魔的一生中，你再也找不出像威廉一世和磨坊这样的佳话。

我想到这里，不禁暗暗吃惊：原来历史是会倒退的，人类社会是会倒退的，倒退 100 年，甚至更多。而我从小受的教育：未来永远是美好的，一切都会一天比一天好，人类也会一代比一代强。说到底，还是“进化论”的影响。

但是，鲁迅先生其实早在 1927 年，就告诉我们，他头脑里的进化论是怎样被现实给打碎的。他原来以为，青年人一定比老年人好，不幸的是，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后，他在广州亲眼看见，“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竟大抵都是青年！

我曾经以为，鲁迅的书我不止读过一遍，鲁迅这从鲜血得出的教训，我也几乎能够背诵了。然而，事实上是我心目中还深埋着以为青年一定就好过老年的……不说是偏见，也有其片面性吧。由于我亲身经历了直到 1970 年代末的各次政治运动，饱览了运动中暴露的人性阴暗面，以致我对经历过这些“风雨”和“世面”的几代人，似已不抱多大希望了，尽管我也看到不少坚守人性的善良，道德的底线，以至堪称“民族脊梁”“纯粹的人”的典范。因此，我曾以为，等到我们的社会中坚、精英人物多数是没有经过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整

人的经验也没有挨整的教训的一代人时，他们的灵魂不曾被强大的外力——物质和精神两重暴力——所扭曲，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国的面貌就会一天天好起来。我真诚地这样期待过，这样祈愿过。但是，我终于发现，我的头脑过于简单了，我的希望是虚妄的；我如果还有一点所谓思维能力，也不够分析中国当前的各种现象的。

虽这么说，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只是发现自己乐观过了头，而我还没有绝望。鲁迅转述的西哲之言，早就告诫我们：“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戒绝绝望，删除幻想，切切实实地面对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话扯远了，我喜欢磨坊这个形象，法国 19 世纪作家都德（《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作者）写过《磨坊文札》，也是我喜欢的一本书。我现在所住的社区原属一个“南磨坊”乡的地界，我暗暗想，让我也能写出我的“磨坊文札”吧。

2004 年 6 月 2 日

## 遥望诺曼底

6月6日，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盛典纪念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

对远在东方的我们中国读者，这是一次回顾二战往事的机会。在历史面前，在成百上千万二战牺牲者面前，所有良知的弦都为人类的和平而颤动，这时夹杂着一声两声不谐和音，却让我又想起冷战时期的宣传。

战后不久，就听说一则谜语：问什么是打败日本的决定因素？打一人名，谜底却有两个，一是“屈原”，指美国投掷原子弹，一是“苏武”，就是说苏联红军在东线出兵参战。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使猜谜的人各执一词。但为什么不设想，在各国军民抗战的最后一刻，是这两者双管齐下，给予日本侵略者致命的一击，促令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呢？

这则谜语带着中国特色。在随后的冷战格局中，涉及二战历史时，对诺曼底登陆这一战役的评价，就往往以更具学术化的面目出现了，那就是：举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来贬低诺曼底

登陆的意义，从而宣传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贡献最为巨大，是反法西斯的“头功”，是世界的解放者，而别的国家好像都只是被解放者，美国则不过是伺机在战争中大捞好处罢了。

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儿曾经占统治地位。

战后出生的人会觉得那一页历史过于遥远了，除非应付考试，不想深究。我并没有亲历战争，但毕竟保持着童年的记忆：那时在沦陷区，似懂非懂地跟着长辈念叨斯大林格勒和诺曼底，对在远方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而浴血奋战，而献出生命的各国军民，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对国内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军民的感情完全一样。

后来多少涉猎历史教科书，知道苏联在1941年夏天以前，盲目认定希特勒会信守互不侵犯条约，而对西线战事采取静观态度；待遭受纳粹德国突然袭击，深陷困境，当年秋天便呼吁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因日本在东线发动太平洋战争，大大牵制了盟军的兵力，第二战场迟迟未能开辟。1942年夏，纳粹德国在苏联发动新的攻势，集中主力进攻伏尔加河畔名城斯大林格勒，企图由此南下高加索，掠夺石油资源，同时北上包抄莫斯科。德军在城内巷战中遭到逐屋的抵抗，同时遭到红军重兵的包围，1943年春，33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全部被歼。最终阻止了德军的东进。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是盟军经过长期准备，“只准胜，不准败”的背水一战，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登陆战役，盟军伤亡122万人，共歼敌人45万；此役开辟了从西线长驱直入结束战争的胜利道路。这就是历史。但苏联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更是二战的转折点；却不承认诺曼底登陆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认为仅仅是一个局部性的行动。这不能不说是意识

形态遮蔽下的偏见。

这种偏见的影响，不能说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完全澄清了。

卡昂纪念馆历史学家斯特凡·西莫内认为：苏联以前一直认为盟军是“故意”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认为苏联在对法西斯“单独作战”中取得的胜利已决定了战争进程，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没有多大意义了。他说“两年前，卡昂纪念馆在莫斯科举办诺曼底登陆展，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苏联红军在二战中牺牲了900多万，仅斯大林格勒一役就死了50万平民！”斯特凡·西莫内博士以平常心说，“不可否认，诺曼底登陆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役，但它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只是‘一滴水’。”（按：说是“一滴水”又未免过谦了吧。）

有一个传说，在10年前，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时，曾拟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最终却由于上述的歧见而取消了。

法国这次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盛典，普京欣然前来，意味着俄罗斯对诺曼底登陆意义的肯定；而东道主的姿态也表明，欧洲同样看重二战中苏联军民的贡献和牺牲。

这是对冷战思维的告别。

偏偏就在这时，我国的个别专家不是在学术争鸣的讲坛，而是在大众传媒上，面对多数缺少二战史常识的受众，说什么从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作用来看，“倒是难以排除‘出场打死老虎’、‘抢夺胜利果实’的嫌疑”。这样的老调，是应该由历史学者来重弹的吗？

2004年6月10日

## 从“购买奥运会”说起

不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要价高不高，如果我们的电视台在经济上能够承担得起，我建议把他们8月4日“全景”栏目播出的“购买奥运会”买来，向中国观众播放；其中曝光了国际奥委会委员涉嫌受贿的录相带。这有助于中国人了解世界，不要总是误以为贪污受贿是中国特色，好像“国际”的官员就都是多么干净似的。

当然，外国的记者可能比中国记者更讨厌，以至更可恨。中国记者有时还能顾全大局，勿为已甚，顶多搞点暗访什么的；外国记者鬼点子就多了。这回他们有几个人乔装成“新伦敦投资公司”的顾问，诡称他们的部分客户在伦敦有业务，热切希望伦敦主办2012年夏季运动会，而明年7月6日国际奥委会就要在6个人围城市中投票表决了；经过试探，有4名奥委会专设为申办城市提供咨询的代理人，听他们说的像真事一样，就分别表示可以去当说客，并且承诺为伦敦赢获总共54张选票——他们估计在124名有投票权的奥委会委员中至少有

30人可以被“说服”，另外一些人可以拿钱搞定。这4个人各自提出了自己干这个勾当的价码，索价最狠的一个，要求“额外游说费”约250万~300万美元；至于委员们各自的要求另议。录相带中唯一“露脸”的有投票权的奥委会委员，是保加利亚奥委会主席伊万·斯拉夫科夫。

这个斯拉夫科夫在事发后申辩自己的清白，说他乃将计就计，意在弄清幕后的意图。但他当时对记者描述了“如何对有投票权的委员施加影响”，早已一五一十摄录在案。看来此人未必是傻，而是还“嫩”，毕竟来自开放不久的国度，有点“初出茅庐”的味道，一下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又被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玩之于股掌之上了。跟西方资产阶级打交道，可不慎乎！？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国际奥委会的道德委员会已经对此丑闻展开调查。怎样调查，怎样处理，那是他们的事了。

之所以建议我们这里的电视台也播放一下这个节目，固然出于思维定势，想要多暴露一下西方世界的阴暗面，但并不是简单的幸灾乐祸，而是为了在反衬之下，加强我国公众对我们制度的热爱和信心；因此，还应该借此契机，宣传我们申办奥运三年来如何“节俭办奥运”并“廉洁办奥运”的举措和成效，让那些在历次奥运会前后有过蝇营狗苟记录的人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在“三个代表”理论指引下）是怎么干的！要让国际上对我国说三道四的人们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在我们的正面宣传中，应该理直气壮地树立我们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而不断涌现的好人好事，特别是上上下下“拒腐蚀，永不沾”的典范事例；不用等2008年奥运会后再搞“离任审计”，现在就可以及时公布账目，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

人民看到，我们中国的有关官员，不仅在执行禁止因私使用办公电话打长途、严格限制大型活动规模和经费等决定方面，雷厉风行，绝不多吃多占；而且在项目招投标、考察、交际诸多方面，一笔一笔，清清楚楚，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我相信，中国的记者用不着效仿“狗仔队”之所为，削尖脑袋，费尽心机，设圈下套去“探底”，他们会一如既往从奥组委或国家体育总局一类有关单位拿到有关的新闻素材，必要的数字，共同做好对于我国“节俭办奥运”、“廉洁办奥运”的正面宣传。

2004年8月7日